

《皇朝禮器圖式》的滿蒙西域西洋等因素探究

林士鉉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提 要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為了實踐崇儒重道，即命纂修禮書，並且陸續規範各種儀典及器用。乾隆十三年（1748）正式著手製訂祀典祭器，繪圖備覽，便逐步完成包括祭器、冠服、樂器、儀器、鹵簿、武備等六大門類的圖譜、圖說；其後進一步諭令將各類彙為一帙，纂修刻本《皇朝禮器圖式》，廣傳這一部內容完備的禮圖。雖然，乾隆朝的禮樂新制仍是以古為範、則古考文之舉，若細究《皇朝禮器圖式》的內容，可知除了加入儀器、武備如此不同於古典禮樂的門類及器樣，更包括諸如滿、蒙、西域、西洋等「非漢」因素。尤其乾隆皇帝特別指出衣冠服儀仍依本朝之舊，而不改行漢式衣冠，又把整部《皇朝禮器圖式》視為滿洲傳統的實踐。《皇朝禮器圖式》歷時多年纂修，還與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宣諭中外平定回部告成有密切關係，從《皇朝禮器圖式》的內容即可發現大量的西域因素。是故，本文主要重點說明《皇朝禮器圖式》的修纂過程中，有關滿、蒙、西域、西洋等因素及現象，除提供理解《皇朝禮器圖式》的多元角度，亦應有助於認識乾隆朝禮樂政治文化之面貌。

關鍵詞：《皇朝禮器圖式》、滿洲、蒙古、西域、西洋

一、前言

乾隆三十一年（1766）五月十三日，乾隆皇帝（1711-1799；1736-1795 在位）發現皇子們居然以藝文風雅為尚，仿效漢人文士取用名號，為此大表不滿，頒佈諭旨重申滿洲傳統的淳樸之風，「習國書、學騎射」才是務本之道。¹此番論調是我們熟知的，乾隆皇帝多次強調以滿洲舊俗及清語（滿洲語文）騎射之文化政策為立國根本。而此次針對皇子們以虛名相尚，有礙養成教育而發；其中最特別的，還在於乾隆皇帝曾以〈御製皇朝禮器圖式序〉，令皇子們課誦，強調應以北魏、金、元諸朝改易衣冠不久即亡為鑑戒。乾隆皇帝的這篇序文寫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其重點卻不只是說明製訂標準化禮器的緣由，還在於「改易衣冠，變更舊俗，所關於國運人心，良非淺鮮，不可不知儆惕」。²

因此，乾隆年間編纂的《皇朝禮器圖式》其收錄的禮器無論數量、種類、版本均前所未有，還注明該器用的使用場合及材質、尺寸等細節，這就不只是以古為範的仿古，或者折衷再現古典理想的禮器，如此看似和滿洲傳統無關的儒家禮樂、禮器圖傳統，卻是可以代表「滿洲精神」、「滿洲傳統」的作品。這樣的「非漢因素」為何被特別提出？這不只是當代學界討論的議題，也是乾隆年間就關注的焦點。

本文首先討論當時強調滿洲冠服傳統訴求，說明為何禮制改革與滿洲精神有關；其次，討論乾隆初元即進行《三禮義疏》、《日講禮記解義》等禮經纂輯，奠定滿洲本位及禮器改革的體用論基礎。再次，說明《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與《皇朝禮器圖式》代表二大祭祀及其器用系統，而對於整理滿洲禮制和禮器的需求則更為迫切，禮器形制的選用及其意涵亦需二書相互參照。其後，舉例說明《皇朝禮器圖式》的滿洲、蒙古、西域、西洋因素，分析《皇朝禮器圖式》收入與古例不合的儀器、武備門類禮器和西洋、西域因素的關係。

1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收入「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login.html>，檢索日期：2020年6月30日），卷760，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上辛巳（十三日），頁366-367。事件主角是皇十一子成親王永理（1752-1823），而皇十五子，即日後的嘉慶皇帝（1760-1820；1796-1820 在位），愛新覺羅氏·顥琰。《實錄》原文：「朕昨見十五阿哥所執扇頭，有題畫詩句，文理字畫，尚覺可觀，詢之知出十一阿哥之手，幼齡所學如此，自屬可教。但落款作兄鏡泉三字，則非皇子所宜。此蓋師傅輩書生習氣，以別號為美稱，妄與取字，而不知其鄙俗可憎，且於蒙養之道，甚有關係。皇子讀書，惟當講求大義，期有裨於立身行己，至於尋章摘句，已為末務，矧以虛名相尚耶？皇子中或年齒已長，間有書齋名字，見之圖章，尚無大礙，若十一阿哥，方在童年，正宜涵養德性，尊聞行知，又豈可以此種浮偽之事，淆其見識耶？……。」這段往事日後還被嘉慶皇帝再次提起，重申國語騎射政策。見《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126，嘉慶九年二月丁卯（七日），頁697。

2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760，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上辛巳（十三日），頁367。

二、夏收殷尋，本不相襲

〈皇朝禮器圖式序〉之末段，乾隆皇帝特別說明哪些部分是必須依古遵行的，以及哪些部分是必須因時制宜，而因時制宜的考量，正是其中的族群因素，尤其是所謂的滿洲傳統：

夫籩豆簠簋，所以事神明也，前代以盤盂充數，朕則依古改之。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尋，本不相襲，朕則依我朝之舊而不敢改焉，恐後之人執朕此舉而議及衣冠，則朕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遼、金以及有元，凡改漢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後之子孫能以朕志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於以綿國祚，承天祐，於萬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是為序。³

此段應是他特別要皇子們謹記在心的，事神明者應依古改正，當朝的衣服則不可改，特別強調不可改行漢式衣冠。這裡提出「夏收殷尋，本不相襲」以為核心的理論基礎，各代之禮不同，以三代貴族祭祀時所戴的帽子、冠來看，收是夏代冠名，尋是殷朝的冠名，周朝稱為弁，各有其制其名。此論汲取自《禮記·郊特牲》：「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尋，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此部經典還曾於乾隆年間進一步仔細審訂滿文譯本，收入《四庫全書》。⁴

惟可以留意的是，「夏收殷尋，本不相襲」固然引自經典，然而也是被特別挑出加以應用的，藉以表現滿洲傳統的獨立性。因為雖然周弁、殷尋、夏收各有其名其制，但原典接著說「三王共皮弁素積」，即指三代之王都是穿戴白鹿皮的束髮帽冠、白色衣袂的男裙，也就是三代之禮具有共同性。《禮記》表達三代之禮具有共

3 清高宗，〈皇朝禮器圖式序〉，收入（清）允祿、蔣溥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頁4-6。

4 清高宗敕譯，《御製繙譯禮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冊186，卷11，郊特牲，頁330。此譯本之御製序文題寫日期為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尋，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此段滿文譯文拼音如下：fulhutu serengge, jeo gurun i doro, (委貌，周道也) doroi mahatun serengge, yen gurun i doro, (章甫，殷道也) lenggetu serengge, hiya gurun i doro, (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jeo gurun de oci šošonggo mahala sembi (周弁), yen gurun de oci elbetu sembi, (殷尋) hiya gurun de oci imiyantu sembi (夏收), ilan jalan i han (三王) uhei (共) suk i šošonggo mahala (皮弁，譯注：〔白鹿〕皮的束髮帽冠) šayan bosoi sibiya sindaha dushi (素積，譯注：置放白色衣袂的男裙) etumbi. (譯注：穿戴)。滿文譯本顯然是特別考量過的，以較為容易理解的語體文表達，而其中所涉及的文義表達、專有名詞如何翻譯，構詞由來及有何考量等問題，值得未來另以專題討論。

同精神之處還有不少。⁵

追溯乾隆皇帝關滿洲本位服儀的重要宣示，其實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十月十九日，即提出考定衣冠的必要性。他一方面認為，目前皇族、百官所用的衣冠已遵行超過百年，因此想要了解過去如何定制，尤其必須分晰滿、蒙、漢名色，即區別三者異同；另一方面，要將考定結果繪成「圖式」，目的在於傳示時人後代，以便遵守，這也是歷時多年的「皇朝禮器圖式」計畫的早期階段：

朕惟繪繡山龍，垂於《虞典》；鞠衣掄翟，載在《周官》；服色品章，昭一代之典則，朝祭所御，禮法攸關，所繫尤重，既已定為成憲，遵守百有餘年，尤宜繪成圖式，傳示法守。

自朕之朝冠、朝服、常冠、吉服，以至王公大臣，九品以上官員之朝帽、朝衣，自皇太后、皇后、皇貴妃、妃嬪等之朝冠、朝服，以至王妃、命婦之朝帽、朝衣，向來如何定制之處，著三和會同汪由敦、旺札勒、阿岱，詳細商酌，考定章程，遵照式樣，分晰滿、漢、蒙古名色，繪圖呈覽，俟朕酌定，以垂永久。欽此。⁶

藉此尚可探知乾隆皇帝認為滿、漢、蒙古衣冠特色是有所區別的，也應該要進行區別。受命官員主要有四位：旺札勒（?-1762），蒙古正白旗，理藩院右侍郎，曾暫攝鑾儀衛事、兼管武備院事等職；⁷阿岱（生卒年不詳），以右翼前鋒統領兼都統銜，曾兼管滿洲火器營大臣事務，乾隆皇帝除了十分肯定其滿洲語文能力，也肯定他深諳舊俗；⁸汪由敦（?-1758），時任三禮館副總裁、軍機大臣、平定金川方略副總裁等職，可謂滿蒙漢成員均有代表。⁹

關於前引諭旨究竟如何執行，值得進一步考察，目前可知依照此旨進行衣冠考定分晰，繪圖呈覽，確實已落實執行。據清宮《各作成作活計清檔》（活計檔）記載，主事者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和（?-1773），於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十三日，

5 例如，「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清高宗敕譯，《御製繙譯禮記》，冊186，卷10，禮器，頁305、306。

6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327，乾隆十三年十月下庚子（十九日），頁403-404。

7 （圖伯特）汪扎爾，「人名權威資料庫」，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檢索日期：2020年6月30日。

8 阿岱，生卒年及相關履歷待考；事蹟可參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90，乾隆十二年五月上庚寅（一日），頁792；卷1088，乾隆四十四年八月上甲寅（三日），頁612。

9 汪由敦，「人名權威資料庫」，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檢索日期：2020年6月30日。

繕寫奏片交待衛轉奏乾隆皇帝，該奏即先引據上述諭旨，再就諭旨所列各種身分之衣冠業已完成繪圖六冊，呈請領用銀兩：

奴才等謹按章程，詳細商酌，上自皇上朝冠、朝服、吉服、常服圖式，共一百七頁，作為一冊；又自東宮以至伯之朝帽、朝衣圖式，共八十六頁，作為一冊；一品官至九品官之朝帽、朝衣圖式，八十七頁，作為一冊；上自皇太后、皇后、皇貴妃之朝冠、朝服、吉服圖式，共一百二十頁，作為一冊；貴妃、妃嬪之朝冠、朝服、吉服圖式，共一百二頁，作為一冊；王妃以至六品官、命婦之朝帽、朝衣圖式，共五十七頁，作為一冊，共為六冊，具繪圖。¹⁰

以上按此諭旨章程所製作的各類各色冠服，應可視為最合乎時宜，以及所謂的滿洲標準。

「夏收殷尋，本不相襲」作為上諭主旨，也是一種「禮不忘本」的譬喻，並沒有在《皇朝禮器圖式》完成後，就束之高閣，反而利用有關典章制度的各種史著的編修機會，再度出現，並形成更完整的理論論述。例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二十二日，諭令三通館仔細彙整自宋至明各代的典章制度，對於正在編纂中的《皇朝續通典》，其中《禮典》之「嘉禮」，有關遼、金、元各代冠服之制，特別關注：

朕閱三通館進呈所纂〈嘉禮考〉內，於遼金元各代冠服之制，敘次殊未明晰，遼金元衣冠，初未嘗不循其國俗，後乃改用漢唐儀式，……自應詳考詮次，以徵蔑棄舊典之由，並酌入按語，俾後人知所鑒戒。於輯書關鍵，方為有當。若遼及元，可例推矣。

前因編訂《皇朝禮器圖（式）》，曾親製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輕言改易；及批《通鑑輯覽》，又一一發明其義。誠以衣冠為一代昭度，夏收殷尋，本不相沿襲。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謂禮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

10 「中研院近史所藏內務府奏銷檔案全文資料庫」，檢索日期：2020.06.30。乾隆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冊數 221，微捲頁數 138-141。該奏片包括前引《清實錄》乾隆十三年十月下庚子（十九日）上諭；後半部有關經費部分：「所需工價、飯食、顏料、紙筆等項之費，奴才詳細酌核，通共用銀二千九百八十餘兩，內請領過銀五百兩，今因不敷用，再請向廣儲司銀庫暫領銀一千兩，派員監看，樽[樽]節辦理，如不敷用，陸續向廣儲司領取，以備應用，通俟繪畫完竣之日，將用過銀兩數目詳細核銷，據實奏聞。為此謹奏等因，繕寫摺片，交與御前二等侍衛安泰轉奏，奉旨：知道了。欽此。」

易服之說，……盡失其淳樸素風，傳之未久，……蓋變本忘先……甚可畏也。……如本朝所定朝祀之服，……悉皆義本禮經，……。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推原其義，實天遠而祖近。設使輕言改服，即已先忘祖宗，將何以上祀天地。……朕確然有見於此，是以不憚諄復教戒，俾後世子孫，知所法守。……毋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訓。……其〈嘉禮考〉仍交館臣、悉心確覈。遼金元改制，時代先後，逐一臚載，再加擬按語證明，改繕進呈，候朕鑒定，昭示來許，並將此申諭中外，仍錄一通，懸勒尚書房。¹¹

《皇朝續通典》為延續著名唐代杜佑《通典》之作，此諭以「禮不忘本」為訴求，可見乾隆年間禮器的革新，一再強調敬祖所代表的滿洲特殊性，而敬祖即敬天，這也是把禮不忘本視為古今之禮的共通本質。此諭復要求八旗子弟「深維根本之計，毋為流言所惑」，還另繕諭令，懸勒於教習皇子讀書的「尚書房」。

《皇朝禮器圖式》內容的多元族群文化因素現象，僅翻檢《圖式》目錄，很容易發現諸如境內「蒙古」、「回部」、「厄魯特」、「番部」等各族群，以及朝鮮、瓦爾喀、回部等等外國及部族名目的器具，也包括大量的西洋儀器。¹²事實上，多方面關注多元族群因素，可說是和乾隆年間的禮制改革計畫交織並行。有關禮器改革的正式諭令可以追溯至乾隆十三年正月，要求重新更換祭器材質，十月要求更新鹵簿，應用於是年十一月冬至的南郊祀天。¹³而值此乾隆十三年之際，尚進行的多種關於宗教、語言文字範圍的大規模改訂，其間有關滿、蒙、藏等非漢因素頗多。例如，乾隆十三年九月，對四譯館所存外裔、番字諸書，進行訂正。¹⁴同年亦創造各體滿文篆字，協同漢字，改制寶璽印章之印文，以區別身分等級。¹⁵還同時進行《諸佛菩薩聖像贊》計畫，並啟動興建宮中新式佛教建築雨花閣；¹⁶乾隆十五年，出

11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19，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下癸未（二十二日），頁 320-321。

12 例如，樂器之各種燕饗樂，包括筚吹樂、番部合樂、朝鮮國俳樂、瓦爾喀部舞樂、回部樂等，見《皇朝禮器圖式》，目錄，樂器，頁 8-9。筚吹樂、番部合樂是清宮奏蒙古樂的代表作，其樂章在乾隆朝呈現滿洲化現象，參見林士鉉，《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頁 103-143。

13 《乾隆帝起居注》亦將該條上諭，繫於乾隆十三年正月初二日丁亥，同《實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冊 7，頁 1-2。參見賴毓芝，〈「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2 期（2020.4），頁 3-8，「乾隆皇帝從乾隆十三年正月決定對於禮器進行改革，製作新的祭器，十月並更定鹵簿，一開始都是為了乾隆十三年冬至的南郊祀天……」。

14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24，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壬戌，頁 352。

15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24，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二日，癸亥，頁 355。

16 羅文華，《龍袍與袈裟（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 68-72、77。

版《同文韻統》，規範梵、藏、滿、蒙、漢文字之於印度梵音的轉寫字母等等；同一年也有《職貢圖》、《鳥譜》、《獸譜》等諸多圖譜計畫展開執行。¹⁷

又約於乾隆十五年成立禮器館，¹⁸是直接和「皇朝禮器圖計畫」有關的新機構。數年後，復歷經征討準噶爾蒙古、回部等重要大戰役，或許是為了一時的「偃武修文」政治目的，以及因功成而興發的「持盈保泰」心態，¹⁹乾隆皇帝刻意地於乾隆二十四年撰寫前引〈皇朝禮器圖式序〉，又於乾隆三十一年，由廷臣重加校補完成。²⁰其間，大約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將此前蒐集整理的祭器圖、武備圖、樂器圖、冠服圖等成果，重新以祭器、儀器、冠服、樂器、鹵簿、武備六大

17 參見賴毓芝，〈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0期（2013.6），頁1-75。

18 根據郭福祥利用《乾隆朝上諭檔》的記載（乾隆十五年四月初五日、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乾隆十五年四月下令繪圖，以及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上諭述及「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內，經禮器館將祭器內凡形色大小稍有不同者，自應照式繪圖。其相同各祭器，統於目錄內注明，自可無庸繪畫，以省重複等因，具奏。」由此判定禮器館成立於乾隆十五年五月至十二月之間，見郭福祥，〈《皇朝禮器圖式》編纂與乾隆朝科學儀器的禮制化〉，《故宮學術季刊》，37卷3期（2020.5），頁9。又據賴惠敏利用〈乾隆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至三十日，記載乾隆二十三年，禮器館辦理為了乾隆十六年二月起至二十三年九月繪畫各圖給發工價辦買顏料、飯食以及辦事人員公費飯食，陸續領用過銀6,300兩。據此可知禮器館至少在乾隆十六年已運作，參見賴惠敏，〈崇慶皇太后萬壽盛典〉，《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8期（2016.12），頁17。又據賴毓芝的研究，可知造辦處如意館、畫院處等單位，和武英殿禮器館在活計檔中的紀錄，參見賴毓芝，〈「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頁22-29。

19 感謝某審查人提供此觀點。此外，乾隆年間的文、武關係及論證實為一複雜問題，此修文之舉，卻未必宣告偃武，其後仍有不少重要戰爭，乃至於出現「十全武功」。

20 此據（清）永瑤、紀昀等奉敕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欽定皇朝禮器圖式二十八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卷82，頁707，該篇〈提要〉：「乾隆二十四年奉敕撰，乾隆三十一年又命廷臣重加校補，勒為此編。」

筆者另根據刻本內附福隆安、于敏中、王際華奉敕校勘後的進表，繫年於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初五日，與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該書提要記載「乾隆三十一年又命廷臣重加校補，勒為此編」的說法，稍有不同，是年完成校勘，應非提要所說的是年敕命校勘；但又或許是年校勘進呈後又有若干修訂。值得注意的是，福隆安等人的進表還提到「例仍其舊，事增于前，彙全部以上呈，間二年而卒業」，此應指將之前各類彩繪本禮器圖加以彙整成書；以刻本全書告竣進表的日期乾隆三十一年向前推二年，即是乾隆二十九年。參見《皇朝禮器圖式》，福隆安、于敏中、王際華進表，頁1-4。

關於「皇朝禮器圖式」計畫、彩繪本、武英殿內府刻本成立時間問題，學界似乎尚未形成共識，例如，郭福祥認為「《皇朝禮器圖式》的編纂經歷了初纂和重加校補兩個過程。初纂於乾隆二十四年完成，重加校補則於乾隆三十一年完成，形成了《皇朝禮器圖式》的最後定本。」見郭福祥，〈《皇朝禮器圖式》編纂與乾隆朝科學儀器的禮制化〉，頁6-7。又該文頁15，「據現在所知，《皇朝禮器圖式》的補纂開始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全部完成於乾隆三十七年，以後又有少量增補。」此完成版本應指彩繪本。又頁23，「乾隆三十年，補纂《皇朝禮器圖式》「儀器」卷完成選目。到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刻本《皇朝禮器圖式》亦完成付梓。」然而，乾隆三十一年命廷臣重加校補，是否即於是年完成付梓，亦有待進一步查證。賴惠敏另據《內務府來文》，認為「《皇朝禮器圖式》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二月書冊完竣，議敘有功人員。」見賴惠敏，〈乾隆皇帝製作金屬祭器的意義〉，《故宮學術季刊》，37卷3期（2020.5），頁47。惟是年進行的議敘，不等於《皇朝禮器圖式》刊本完成的時間點，只能說完竣時間不晚於乾隆三十九年，也可能是就彩繪本而言。

門類，以「皇朝禮器圖」之名，集成成書，²¹ 藉以完整表達皇朝禮器的全貌。這些滿、蒙、西域、西洋因素還是必須和禮經傳統連結，也透過乾隆朝君臣的整合，使之「包裝」在皇清的架構下，運用滿洲傳統之名義，共組為整體，因此〈皇朝禮器圖式序〉也才能代表滿洲精神。以下舉例討論這些族群因素是如何在處理禮學經典、禮器的過程中實踐。

三、禮樂經學政治的滿洲因素：從滿漢文《日講禮記解義》談起

經，是天下公理。²² 有關經學之於清代皇權的強化和政治文化的作用，可以從清朝前期各君主的崇儒重道政策明顯看出。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 在位）長期推廣儒學聖教。此處討論的滿漢文《日講禮記解義》正是康熙、雍正年間未能完成的殿堂經學之作，²³ 即使康熙皇帝早預先為序，卻因為解義工作難度太高，還曾計畫將之進行滿文翻譯；直到乾隆皇帝即位之後，以超過十年的時間，決意梳理「三禮」經典（《周禮》、《儀禮》、《禮記》），才連帶完成《日講禮記解義》，成為「日講解義」系列的最後一部作品。

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初一日，乾隆皇帝為《日講禮記解義》作序。序言首先提到康熙皇帝曾將日講官的講義，及當時君臣討論思辨之成果，彙編刊出，「命儒臣日值講筵，《五經》、《通鑑》以次進講，蒼萃羣言，發明旨要，臚為解義，積有成編，譯以國書，頒示中外，各製序言，弁其端而授諸梓。」²⁴ 序中還特別提及如何處理滿漢文《日講禮記解義》的歷程：

《易》、《書》、《詩》三經先竣，《春秋》若干卷，刻於雍正年間。惟《禮

21 根據賴毓芝的考察，目前所見《活計檔·記事錄》記載，第一次出現皇朝禮器圖的字樣，是乾隆二十九年十月，之前所有相關製作都是以祭器圖、武備圖、樂器圖、冠服圖等六門名稱稱呼。見賴毓芝，〈「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頁 24-26。

22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卷 1，易類一，頁 54。

23 清初理學家擔任經筵日講講官為帝王進行聖學經典及應用之講授，以及御門聽政時和儒臣進行的性理學談論，可視為殿堂經學，參見楊自平，〈從《日講易經解義》論康熙殿堂《易》學的特色〉，《臺大中文學報》，28 期（2008.6），頁 93-138；簡承禾，〈康熙日講書經解義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歐修梅，〈《日講春秋解義》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

24 清高宗，〈御製日講禮記解義序〉，乾隆十二年二月初一日，收入康熙年間敕編、乾隆元年敕校，（清）弘晷、鄂爾泰等奉敕纂，《日講禮記解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3，頁 1。該書完成時間，據開載監理、總裁、提調、纂修等諸臣名銜之奉旨日期，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可知當於是年完成。名銜清單見頁 3-4；惟清單內並無翻譯人員。

記》卷帙浩繁，藁本存繙書房久之未竟厥業。朕御極之初，允儒臣請纂修《三禮義疏》，因取《日講禮記解義》原本，參校異同，歸於一是，并命翻譯授梓，以備《五經》之全……。²⁵

由此可知，早在乾隆元年（1736）六月，命纂《三禮義疏》，而在纂修《三禮義疏》的過程，亦校訂、翻譯《日講禮記解義》；正式出版時亦敬刊康熙皇帝序文於帙前。終於彌補康熙年間未及折衷《禮記》、取其精粹，頒行學校的缺憾；又鑑於長期以來，《儀禮》、《周禮》二經，因無關科舉而少有關注，此舉正可提升知識圈對《禮記》的關注。²⁶

乾隆皇帝本人的言論被轉化到禮學經典討論中，還有其他表現。乾隆十年（1745）十二月，《三禮義疏》即將告成，三禮館館臣奏請將乾隆皇帝《御製日知薈說》、《樂善堂文集》內論及三禮的部分，彙為「聖制」一門，冠於卷首。²⁷《御製日知薈說》彙編於乾隆元年，是乾隆皇帝早年的讀書筆記，其中即有專卷「論禮樂法度之用」。²⁸是月，繼進呈《周禮義疏》之後，三禮館恭進《儀禮、禮記義疏》，奉旨交張廷玉等閱看，互加校正。²⁹乾隆皇帝為《三禮義疏》書序於乾隆十三年十月初一日，該序收入《欽定周官義疏》。前一年，《日講禮記解義》亦完成，終於完備日講經典系列。³⁰

滿文翻譯經典實為審慎且具創新性的學術工作，直接反映滿洲因素。上述滿文本《日講禮記解義》並非當時以滿文翻譯禮經的完結篇，乾隆四十八年（1783），《繙譯禮記》告成，這是繼《易》、《書》、《詩》三經之後完成的滿文譯作，通過周密的事前考證工作，在《三禮義疏》的基礎之下，「《禮記》則名物度數，考訂必詳，精理名言，推求必當，尤足破講家之聚訟」；³¹此部滿文譯本的特色在於：「國書繙譯，則文因本文，義因本義，不疏不注，惟就本文雜誦」；乾隆皇帝對於通過譯本讀經、解經的正面效果充滿自信心，認為「章解句釋，初學者讀之即可了然其義」。³²

25 清高宗，〈御製日講禮記解義序〉，頁1。

26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1，乾隆元年六月己卯（十六日），頁501。

27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54，乾隆十年十二月庚戌（十三日），頁291。

28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御製日知薈說四卷》，冊3，卷94，子部四，儒家類四，頁63-64。

29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55，乾隆十年十二月甲子（二十七日），頁308。

30 清高宗，〈御製日講禮記解義序〉，乾隆十二年二月初一日。

31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繙譯五經五十八卷、四書二十九卷》，冊1，卷33，經部，五經總義類，頁673。

32 清高宗，〈御製繙譯禮記序〉，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七日，收入《御製繙譯禮記》，頁2-3。

乾隆皇帝御極之初即著手重訂自先帝順治、康熙以來持續進行不斷的儒家聖學經典翻譯，《四書》、《五經》尤為重點。³³ 乾隆六年（1741）完成校刊繙譯《四書》；二十年（1755），再次重訂繙譯《四書》；滿文譯本《五經》亦陸續審訂，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才全部完成。³⁴ 滿文本《禮記》完成後，隨即連同其他經書及《四書》，改以合訂本《欽定繙譯五經四書》之名，收入《欽定四庫全書》之「經部·五經總義類」，將諸家訓詁解經之作，列入此類，亦反映清朝譯滿文譯本經典的定位。³⁵

整理禮經經典和重訂禮器是否有直接關係？《日講禮記解義》和《三禮義疏》進入校正刊印階段時，儒家禮制經典的整理亦告段落，而接續進行的重點，是禮制改革，尤其是釐訂、繪製禮樂圖，以及纂修後來四庫館臣列入史部政書類，包括《皇朝禮器圖式》、《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等各種典制禮書。

經典提供禮器改革的理論基礎，前述「夏收殷尋，本不相襲」已是一例；康熙皇帝〈日講禮記解義序〉，首句：「朕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把禮樂視為六經之用；³⁶ 乾隆皇帝尤其發揮「體用論」：「夫禮之體以敬為本，禮之用以和為貴，百世不易也，而節文損益則從宜」；「夫禮之不變者，敬也、和也，其不得不從宜者，時也。」³⁷ 他強調禮以敬為體，以和為用，故而將禮經的應用以《大清會典》、《皇朝禮器圖式》為具體事例。³⁸

33 據《清實錄》記載，順治皇帝於順治十年（1653）二月間，即親臨內院披閱繙譯《五經》；現存最早的經典譯本為滿文本《詩經》；康熙十六年（1677），將儒臣先前按日進講之四書講章，刪潤刊刻，滿漢文本同時進呈，題為《日講四書解義》，依此模式陸續完成日講系列之諸經解義，其中《日講詩經解義》，並未出版，而《日講禮記解義》如內文所述，至乾隆十二年（1747）左右完成，惟雖有翻譯滿文之記錄，卻似乎未刊行滿文本，筆者推測可能是因為《御製繙譯禮記》已經足以涵蓋其內容；至於諸經之講章，滿文部分至仍尚存《四書講章》、《書經講章》、《易經講章》、《詩經講章》等四種。參見葉高樹，〈滿漢合璧《欽定繙譯五經四書》的文化意涵：從「因國書以通經義」到「因經義以通國書」〉，《經學研究論叢（第十三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頁1-42。

34 清高宗，〈御製繙譯四書序〉，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收入《欽定繙譯五經四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89，頁282-284。另參見莊吉發，〈繙譯四書——四書滿文譯本與清代考證學的發展〉，《故宮文物月刊》，412期（2017.7），頁18-27。清高宗〈御製翻譯春秋序〉寫於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收入《欽定繙譯五經四書·御製翻譯春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87，頁5。葉高樹，〈滿漢合璧《欽定繙譯五經四書》的文化意涵：從「因國書以通經義」到「因經義以通國書」〉，頁8-14。

35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繙譯五經五十八卷、四書二十九卷》，卷33，經部，五經總義類，冊1，頁673。

36 清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序〉，收入《日講禮記解義》，頁2-3。

37 清高宗，〈御製繙譯禮記序〉，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七日，頁1-2。

38 除了以《禮記》經典為體，而以相關典制政書為用，乾隆皇帝還有類似的表達，例如，以《春秋》為體，以律法政書為用，《御製繙譯春秋》，冊187，頁26，引用程子：「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也是一種體用之論。

乾隆年間對於如何將禮樂經典及相關器用制度發揮實用效果，還有諸多表現，正是以此「體用論」，建構可連結多種官方禮制政書體系。例如，《皇朝禮器圖式》樂器門，理應對於《樂經》，歷來說法是《樂經》已亡佚不存，然而反映在《四庫全書》經部的論述，則定調為所謂《樂經》並非曾存在以「樂經」為名的某部經書，「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緒。非別有一經，為聖人手定也。」因此，「後代鐘律之書，得遂得著錄於經部，不與藝術同科」；然而如何處理樂類典籍？「以辨律呂、明雅樂者，仍列於經；其謳歌末技，絃管繁聲，均退列雜藝、詞曲兩類中」。³⁹是故，包括康熙年間《御定律呂正義》（五卷）、乾隆年間《御製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均列入經部樂類。

如此一來，《皇朝禮器圖式》裡的諸多傳統樂器，以及非漢的四裔各族的樂器，其樂曲樂章、典儀用樂，多數收入《御製律呂正義後編》，是書乃乾隆六年十一月奉敕接續《御製律呂正義》而成。⁴⁰《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呈現康熙年間未及釐定的樂器、樂章，其中「《樂器考》，器各有圖，圖各有說，而御製諸銘具載焉。」⁴¹乾隆七年（1742）十一月，宮廷所用樂器，著「律呂正義館」成造，於乾隆十一年（1746）閏三月纂修告成。⁴²除了記載清朝前期宮廷典禮音樂的盛況，及外國之樂曲和樂器圖。更收錄、保存當時滿、蒙、回部等樂章；回部樂章應是征服之後才增補的，總之《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和其後編繪的《皇朝禮器圖式》裡的樂器有直接關係；那些多元族群、多種語文的唱辭，竟也類似《詩經》，具有重要地位。⁴³

正式著手禮器的規範化並調整禮儀機構，當然也是禮經禮制最具體的應用。乾隆十三年正月諭定祀典祭器，此舉被視為是當時具體改制禮器的開端，「著大學

39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樂類（分敘）》，冊1，經部，卷38，頁776。

40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54，乾隆六年十一月丙寅（五日），頁1197。約完成於乾隆十二年，「三《禮》及《律呂正義》二書已成，校對將竣。」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82，乾隆十二年正月上丙申（六日），頁679。惟《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則記為乾隆十一年奉敕撰，參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御製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經部，卷38，樂類，冊1，頁789。

41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御製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冊1，經部，卷38，樂類，頁789。

42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62，乾隆十一年閏三月丁酉（1日），頁394。

43 列於燕饗中和韶樂、丹陛大樂、清樂之後的慶隆舞樂，其實正是滿洲樂曲，見於（清）允祿等奉敕纂，《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冊216，卷46，頁369-377；另參見余慧君，〈遵律度於無疆：《皇朝禮器圖式》樂器卷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7卷3期（2020.5），頁111-117。乾隆皇帝後來又著意處理《詩經》的樂譜，乾隆五十三年奉敕撰《欽定詩經樂譜》，參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詩經樂譜三十卷》，冊1，卷38，經部，頁790。

士會同該部，稽核經圖，審其名物度數，制作款式，折衷至當，詳議繪圖以聞，朕將親為審定」，其後即依議改定禮器材質。⁴⁴ 此處所謂「稽核經圖」，應是利用剛剛纂修告成的《三禮義疏》及其禮圖。⁴⁵ 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又諭定改定鹵簿五輅之制，鹵簿儀仗其名參用宋明以來之舊制；「五輅酌仿《周官》及唐宋遺制」；並於十一月冬至圓丘祀天典禮中，正式使用新制祭器。⁴⁶

在調整機構方面，不只於乾隆十五年（1750）設立禮器館，負責繪製禮器圖；⁴⁷ 樂部是管理祭祀朝會，演樂及審定樂器音律事務的機關，成立於乾隆七年，原由禮部滿尚書兼管；⁴⁸ 乾隆十四年五月，禮部滿尚書再兼太常寺、鴻臚寺事務，統籌禮儀，此後滿尚書職銜內，即加兼管樂部、太常寺、鴻臚寺字樣。⁴⁹

乾隆年間把史部史籍視為經部的事例應用，⁵⁰ 當時所編纂出版的禮制典籍在整體的史部政典類的狀況，也值得探究。例如，《欽定大清通禮》與上述《三禮義疏》同時敕纂於乾隆元年六月，卻至二十一年（1756）始告成，其間乾隆十二年正月，還敕命續修《大清會典》；⁵¹ 後來四庫館臣將《欽定大清通禮》與《大清會典則例》、《皇朝禮器圖式》視為相互搭配，各有重點的典籍，均列入《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欽定大清通禮》）首紀朝廟大典及欽頒儀式，其餘五禮之序，悉准《周官》，而體例則依仿《儀禮》。惟載貴賤之等差，節目之先後，而不及其沿革；惟載器物之名數，陳設之方隅，而不及其形制。蓋沿革具於《會典則

44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06，乾隆十三年正月丁亥（二日），頁 1-2。

45 《周官義疏》計 48 卷，末四卷為《周官圖》；《儀禮義疏》計 48 卷，卷 41-44《禮器圖》，卷 45-48《禮節圖》，卷末又附卷 45《士冠禮》四圖、卷 47《喪服》十圖、卷 48《特牲饋食禮》七圖；《禮記義疏》計 82 卷，卷 78-82 為《禮記圖》。參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冊 1，經部，卷 19，頁 403；卷 20，頁 418；卷 21，頁 441。另參見林存陽，《三禮館：清代學術與政治互動的鏈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頁 123-149。

46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26，乾隆十三年十月甲午（十三日），頁 397。

47 「禮器館」一詞收入《御製增訂清文鑑》，禮器館（dorolon i tetun i bithei kuren），意為禮器書之書之館，強調做作書本的性質，或許這是它被歸屬在武英殿的原因。滿文釋文：musei gurun i eiten wecen i dorolon de baitalara tetun（我朝一切祭禮所用之器具）etuku i durun（服式）boco faidan hacin i jergi jaka i nirugan（顏色、儀仗等物件圖像）nirure ba（繪製之處）be dorolon i tetun i kuren sembi（稱之禮器館）。見（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2，卷 20，部院類第十一，頁 687。

48 張德澤，《清代國家機構考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頁 66-67。

49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40，乾隆十四年五月戊申（1 日），頁 697。

50 當時將著史的途徑及理想性原則，訴諸經書《春秋》、《左傳》，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冊 2，卷 45，史部，史部總敘，頁 1，「史之為道，撰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莫詳於《春秋》，莫詳於《左傳》。」

51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82，乾隆十二年正月丙申（六日），頁 679。

例》，形制具於《禮器圖式》，各有明文，足資考証。⁵²

關於禮經、禮制的體用關係，還在《皇朝通典·禮典》得到進一步確認：

我朝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規模隆盛，載在冊府，垂法萬世。有《大清會典則例》，以詳其制度；有《皇朝禮器圖式》，以著其形模，悉經審裁訂定，損益折衷，至為賅備。至於儀文秩序，條理燦然，則《大清通禮》一書，準彝章而垂定式，並非前代禮書所能及其萬一焉。⁵³

《四庫全書總目》概括整體史部典制最為核心的幾部著作：

今則謨烈昭垂。各成完帙。禮有《大清通禮》、《皇朝禮器圖式》；樂有聖祖《御製律呂正義》、皇上《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刑有《大清律例》；兵有《中樞政考》；地理有《皇輿表》、《大清一統志》、《欽定日下舊聞考》、《盛京通志》、《熱河志》、《滿洲源流考》、《皇輿西域圖志》。又有《大清會典》及《則例》總其綱領，八旗及六部《則例》具其條目。故縷分條繫，端委詳明，用以昭示萬年，誠足媲美乎《官》、《禮》。⁵⁴

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刊刻《大清會典》告成；⁵⁵ 乾隆三十二年（1767）二月，敕增纂本朝《（皇朝）通典》、《（皇朝）通志》，⁵⁶ 以接續乾隆十二年命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上述諸多政書，是禮的實踐，即乾隆皇帝禮經禮制之體用論表現。他把當朝的禮制系統政典視之為「經」，至少是本朝的「經」，進一步認為這些政典足以和《周禮》、《禮記》媲美。顯然是把禮制政典的價值不僅向三代傳統看齊，也從當下望向未來，當下的典制，即是未來的「經」典。

又例如，《皇朝禮器圖式》還將儀器、武備二類器用併歸於禮器之列，與從前作法不同，當時已自知「與古例稍殊」，今人看來也應該覺得十分新奇，此二門類

52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大清通禮五十卷》，冊2，卷82，史部38，政書類二，頁707。

53 （清）嵇璜奉敕撰，《欽定皇朝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42，卷41，禮（古一），臣工案語，頁469-470。

54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皇朝通典一百卷》，冊2，卷81，史部37，政書類一，頁691-692。這段描述和《皇朝通典》〈凡例〉第一條的內容相近：「我朝制度典章，因革損益，盡美盡善，載在《大清會典》者，實有以酌時會之宜，立質文之準，若禮制則有《大清通禮》、《皇朝禮器圖式》，樂制則有聖祖《御製律呂正義》、皇上《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兵制則八旗，兵部有《中樞政考》，刑制則有《大清律集解》、《大清律例》，地理則有《皇輿表》、《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熱河志》、《皇輿西域圖志》諸書，煌煌乎經國之良模[謨]，足以垂憲萬世，今宜以類編次。」見（清）嵇璜奉敕撰，《欽定皇朝通典》，凡例，冊642，頁3-4。

55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775，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辛酉（二十五日），頁509。

56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778，乾隆三十二年二月丙申（二日），頁546。

本文稍後還會有申論，此處先分析當時的官方說法，可知其立論依據亦直接訴諸研究三禮經典，不離「托古改制」之體用論。《四庫總目》：

儀器、武備二類舊皆別自為書，今乃列之於禮器，與古例稍殊。然周代眡祿、保章、馮相所職皆天象，而隸於春官。禮有五目，軍禮居三，而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者，戰陣之令，乃載於《曲禮》。

蓋禮者，理也，其義至大，其所包者亦至廣，故凡有制而不可越者，皆謂之禮。《周官》所述皆政典，而兼得《周禮》之名，蓋由於此。今以儀器、武備併歸禮樂，正三代之古義，未可以不類疑也。⁵⁷

周代職掌天文官吏曾有眡祿、保章、馮相氏之說，而三禮之一的《周禮》即《周官》，將天文官列於春官，春官即指禮部。清代欽天監原隸禮部，順治十五年（1658）由禮部分出，康熙二年（1663）仍隸禮部，到了雍正三年（1725），改以西洋人為監正。⁵⁸

此外，五禮中本有軍禮，也見載於《周禮》，據李訓詳的研究，軍禮概念的形成大約在周、秦之際，至漢初才較成熟，這代表著儒家學者對於武力在政治社會中應具有何種地位的歷史性反思。⁵⁹ 乾隆年間回溯典籍，亦反思皇朝武功及其器物，各種武備之於當時及未來，有何歷史意義。《禮記·曲禮》也記錄了指揮軍陣時，所用之旗令，⁶⁰ 是故，乾隆年間修纂的《欽定續通典》，其中收錄的軍禮，做為吉、嘉、賓、軍、凶五禮之一，也確實包括武備器用，以合乎禮經所載。⁶¹ 又像是天子、諸侯、將帥出征應於駐紮地敬祀（即所謂的禡祭），並祭所過山川、輶祭所過路神、四時田獵、大閱、命將出征等等，均屬軍禮。顯示《皇朝禮器圖式》將天文

57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皇朝禮器圖式二十八卷》，冊2，卷82，史部38，政書類二，頁707-708。

58 參見張德澤，《清代國家機構考略》，頁75。乾隆十五年，增設管理監事大臣一人，這時才算獨立單位。

59 李訓詳，〈納兵於禮——中國古代軍禮的形成〉，收入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編，《溝通與協作：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成立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學術出版部，2020），頁341-372；另參見該書蔣義斌，〈序〉，頁xiii。

60 參見《御製繙譯禮記·曲禮上》，冊186，卷1，頁37-38，「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61 〈清〉嵇璜奉敕撰，《欽定續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40，禮（軍），卷72-73，頁425-450。

儀器、軍需武備劃入禮的範疇，雖不合古例，卻也於經典有據。

以下接續介紹最具滿洲特色的禮書《滿洲祭神祭天典禮》，雖然它的內容不在《皇朝禮器圖式》之內，卻和《皇朝禮器圖式》共構成完整的祭祀及祭祀器用的二大類項。

四、滿洲本位的禮器圖譜——滿文本《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三禮義疏》完成後，今人看來非常巧合的是滿文本《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接續於乾隆十二年七月纂修完成，此書是滿洲專用的祭禮典籍。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編印計畫的完成，早於乾隆十三年重訂相對來說是「漢式」的禮器圖。據葉高樹的研究，該書和乾隆八年，乾隆皇帝首次東巡盛京祭祖有關，當年計畫在盛京舉行傳統的薩滿祭祀，籌備此事的盛京內務府佐領根柱（genju）發現，盛京地方祭司和祭器皆不足，尚缺職掌打鼓和彈三絃、琵琶的司胙太監，乃至於掌儀司送來的禱辭，只是平常跳神禱祝之語，全無大祭、報祭專用之辭，故緊急請求京城內務府支援，反映祖先根本重地的傳統祀典荒廢已久，而這應是直接促使乾隆皇帝興起整理滿洲舊俗的想法。⁶²

乾隆初年即不斷舉行大型典禮，隨之而來的是制定相應的祭祀禮儀。諸如乾隆四年（1739）十一月，初行大閱禮；⁶³ 六年七月，初舉木蘭秋獮；⁶⁴ 八年（1743）七月，首次東巡盛京，祭祖陵。⁶⁵ 雖然對祭禮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似乎得再過幾年才有所行動，即上述乾隆十三年正月議准改定祭器材質，或許是對於漢式祭典傳統的更新、調整，得要在仔細研究禮經禮制之後，才有所動作。但就在前一年，卻已完成《滿洲祭神天典禮》的各種禮器，維繫乾隆皇帝所謂的滿洲傳統，可能更為迫切。

乾隆十二年七月九日，乾隆皇帝以上諭說明編纂完成《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上諭內容重點為：愛新覺羅皇室及王公之傳統祭祀「皆以祝辭為重」，「凡祭神、祭天、背鐙、獻神、報祭、求福，及以麋豬祭天、去祟、祭田苗神、祭馬神，無不斟酌事體，編為吉祥之語，以禱祝之」；⁶⁶ 祝辭也可稱為神歌，然而由於年代愈久，滿

62 葉高樹，〈乾隆皇帝與滿洲傳統的重建——以薩滿祭祀儀式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8期（2017.11）月，頁43-94。

63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04，乾隆四年十一月上丙午（三日），頁563-564。

64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47，乾隆六年七月下戊子（二十六日），頁1120-1121。

65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96，乾隆八年七月上戊子（八日），頁521。

66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94，乾隆十二年七月丁酉（九日），頁853。

語文贊祝之原字原音已出現漸致淆舛的現象，因此，乾隆皇帝特別諭令蒐集整理舊有滿洲語祝辭。(圖 1)

和禮器主題有直接關聯的，是這部滿洲祭祀經典特別「繪祭器形式」，且重新確認滿洲所用祭器之材質、形制、數目和尺寸，繪編《祭神祭天供獻器用數目》、《祭神祭天供獻陳設器用形式圖》各一篇。針對滿人以滿文紀錄、保存祝辭文化傳統尚可理解，但是將這些器用及所需祭品均有細節描述，開列需用數目，又以漢族傳統的禮器圖形式繪圖，如此之於所謂滿洲舊俗的表達，絕對是創新的形式。

此書後來被視為與《大清通禮》相輔而行，代表旗民兩種體制的典制政書。⁶⁷《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較《大清通禮》早完成近十年，多年後譯作漢文，於乾隆四十五年收入《四庫全書》。乾隆初年也曾接續雍正年間未完成的滿漢文《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及《八旗通志初集》，均陸續完成，並且翻譯作滿文；乾隆十二年亦進行頒賜。⁶⁸《八旗通志初集》日後續輯為《欽定八旗通志》，便將漢譯本《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收入其中的《典禮志》，以期為旗人永久遵行的典制。

值得注意的是，當乾隆四十二年（1777）諭令阿桂、于敏中共同譯漢之時，據阿桂等奏疏，可知他們翻譯的主要部分是卷一至卷四有關各種祭典的儀注和祝辭，目的是為了收入《四庫全書》；而卷五、卷六禮器之繪圖及圖說（器用數目、器用形式圖），其實早已譯出：

臣等業將卷一至卷四敬謹譯出進呈，荷蒙睿鑒，其卷五係器用造作之法，卷六係器用形式圖，久經譯出，今復加詳細校對、繪圖，恭呈御覽……。⁶⁹

滿文本《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後二卷於何時及何種目的先進行漢譯，目前尚不可知，但很可能是編纂八旗史志圖書時參考之用，更可能是執行「皇朝禮器圖式」計畫期間蒐集的多種禮器繪圖之一。

67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六卷》，卷 82，史部 38，政書類二，冊 2，頁 708-709，「乾隆四十二年，復詔依文音釋，譯為此帙，與《大清通禮》相輔而行，用彰聖朝之令典。未有大學士阿桂等恭跋，具述致誠迓福之義。而於崇祀諸神不知其緣起者，引《禮記》舍菜先師，鄭玄注不著先師名姓之例為証；於《祝詞》、《贊詞》僅傳其聲者，引《漢樂府》鐸舞曲，有音無義之例為証。」

68 例如，直隸總督那蘇圖，〈奏為欽賜《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滿漢文《八旗通志》謝恩事〉，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內閣全宗》，檔號 02-2-006-000801-001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69 （清）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7，卷 4 末，奏一，頁 712-713，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二日，「奉旨：知道了。跋語即行繕出清文。欽此。」

有意思的是，因為「非滿」因素亦不少，且因以滿文編纂刊行，對於器用之中並非滿洲傳統所用之物產，固無滿語者，原本不得不以漢語讀念，「今悉取其意，譯為國語」。即使是將所謂的滿洲禮俗文獻譯作漢文，仍然不能脫離傳統經典的理解及應用。乾隆君臣採取闕疑傳信之策，處理滿洲祭祝儀式裡不能詳溯緣起的，以及祝贊之詞無法尋繹文義的部分。前者有如鄭玄注《禮記·文王世子》不能指出先師為誰之例，後者則仿漢代樂府、《宋書·樂志》，將有聲而無義者，取其對音之法。⁷⁰

上述乾隆十二年七月九日諭旨中，還定下了遇到並非源自滿洲傳統之物產、器用應如何翻譯的原則：「今悉取其意，譯為國語」，祭典裡廣泛使用的楠木器具即是一個代表性例子。使用楠木的情況大致有：

獻酒楠木低桌。長二尺八寸，寬一尺七寸，高一尺一寸。

亭式殿內，供香鑪、饌、酒楠木高桌。長二尺六寸，寬一尺六寸五分，高三尺八寸。

尚錫神亭內，供香鑪、饌、酒楠木高案。長四尺七寸，寬三尺二寸，五分之高三尺八寸五分。

楠木神桿，連楠木圓斗、立神桿楠木夾柱、立神桿之石。神桿長一丈三尺；斗圍徑七寸，高六寸；柱長五尺，方五寸。

供肉銀裏楠木大槽盆。長三尺一寸五分，寬一尺八寸，高七寸。

盛血銀裏楠木小槽盆。長二尺二寸五分，寬一尺五寸，高七寸。⁷¹

其中的「神桿」，正式名稱為「還願神杆」，⁷²（圖2）祭天祭神時不可或缺的祭器，立於滿洲人家之場院，是普遍的滿洲風俗習慣。《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規定使用楠木，以楠木為材質，（圖3）其實是一種新禮制，因為東北地區並非楠木產區。其他木料用的不多，像祭天切肉絲椴木案板所用的椴木，東北地方也生產；切肉絲花

70 阿桂等人的翻譯策略見《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4末，奏一，跋語。此闕疑傳信的策略研究，參見葉高樹，《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22。

71 見《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57，頁734-765。

72（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32，卷6，禮部，祭祀器用類第二，頁195。somo，還願神杆，滿文釋文：medere de（還願時）ilibuha moo（所立的木料）be somo sembi（稱之還願神杆）。

梨木方盤桌的花梨木也很特別，因為雖然新制以楠木為祭器胎，但有時也選用花梨木，其質地堅硬適合雕刻，價格比楠木貴得多。⁷³

楠木神杆，滿文讀如 anahūn (楠) moo (木) i (的) somo (桿)。⁷⁴ 此外，當時如何解釋楠木？究竟如何「今悉取其意，譯為國語」？乾隆年間出現了一批類似楠木這種需求而新造的滿洲語文，當時稱之「新清語」，成為改制過程中的新興現象，實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因應需要而新造的滿文詞彙，可見於乾隆年間編纂的《御製增訂清文鑑》，該書對楠木的解釋：生於外省，莖幹直，樹冠高、美觀，葉似牛耳；若製大樑柱，經年久長；木質細，可分條雕刻。⁷⁵

至於不用漢語音譯造字，改以取義造字之法，也是當時滿洲文化的新發展，值得稍作考察。據《康熙字典》，楠是俗字，本作枏，或作桡；還引述任昉《述異記》：「黃金山有枏木，一年東榮西枯，一年西榮東枯，張華謂之交讓木。」⁷⁶ 應是以此「交讓」之義，選用滿文 anahūnjan，讓、謙讓，遜讓，造新字「楠，anahūn」；又皇帝的棺木稱之「梓宮」，亦以楠木為質，故亦以同樣的詞彙稍作變化：anahūnga (楠木的) gurung (宮殿)。⁷⁷

此處無法細述各種滿文禮器新詞如何依原義而造滿文新字，但這些禮制類的滿文新詞彙，以及收錄並解釋這些詞彙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對於我們理解禮制改制過程中的滿洲因素有一定的幫助。

《御製增訂清文鑑》是官方纂修的大型滿文分類字典，滿洲文化的重要表現。該書體例以部類分卷次，以滿文解釋滿文，可說是表現滿洲視角的重點文獻。不僅將大量禮器詞彙進行分類，禮器之名亦同時注明滿漢文，還有簡要滿文釋文，而且還是《皇朝禮器圖式》取材的來源，《皇朝禮器圖式》即說明武備各器的取材：「臣等校勘舊圖，自大閱甲冑、弓刀而外，闕焉未詳，謹本之會典、通禮、清文鑑、八旗通志，及內廷制勝鴻寶、武功良具、昭功紀獲諸編、工部則例、圖冊，條具類

73 參見賴惠敏，〈乾隆皇帝製作金屬祭器的意義〉，頁 53。

74 葉高樹，〈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頁 454。

75 (清) 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 233，卷 29，樹木部，樹木類第二，頁 190。anahūn moo，楠木；滿文釋文：tulergi golo de banjimbi (生於外省)，cikten tob (莖幹直) sihin den saikan (樹冠高、美觀)，abdaha ihan i šan i gese (葉似牛耳)，amba taibu tura araci aniya goidambi (若製大樑柱，經年久長)，yali jun narhūn (木質細) hacilame colici foloci ombi (可分條雕刻)。

76 (清) 張玉書奉敕纂，《御定康熙字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0，枏，頁 32。

77 安雙成，〈滿漢大辭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頁 12；胡增益，〈新滿漢大辭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頁 42。

輯。」⁷⁸ 其中就有《清文鑑》。

《皇朝禮器圖式》內容的六大分類與《御製增訂清文鑑》的部類如何搭配？就目錄來看，《御製增訂清文鑑》第六卷禮部，即分作禮儀類、鹵簿器用類、朝集類、禮拜類、筵宴類、祭祀類、祭祀器用類、喪服類、灑掃類等；第七卷，分作樂部、樂類、樂器類、文學部、書類、文學類、文學什物類、儀器類、數目類；第九卷武功部之二，分作畋獵類、頑鷹犬類、軍器類、製造軍器類、撒袋弓類、鞍轡類等項，第二十四卷衣飾部，分作冠帽類、衣服類、巾帶類、靴襪類、皮革類、熟皮類、穿脫類、鋪蓋類、梳粧類、飾用物件類、剪縫類、屋帳房類、包裹類。如此看來，鹵簿器用類、祭祀器用類、樂器類、儀器類、軍器類、冠帽類和衣服類可以完全對應於《皇朝禮器圖式》目錄的鹵簿、祭器、樂器、武備（軍器）、儀器、冠服六大門類。至於收錄詞彙之異同、範圍，本文無法全面討論，以下將以若干代表性例子說明。

《御製增訂清文鑑》做為大型分類詞典，收入面向較為全面，以祭器而言，《御製增訂清文鑑》設立禮部祭祀器用類，此類之前有祭祀類，很合理地將祭祀器用置於祭祀類之後。《御製增訂清文鑑》的祭祀類分作二則，其一是有關郊、禘、祫祭、類、禴、嘗、蒸、禡祭、常雩禮等等祭祝種類；其二，則是滿洲特色的薩滿祭祀，包括背燈祭、樹柳枝祭、痘後還願、祭馬神、夜祭七星、念神歌、跳神等詞彙。⁷⁹（圖4）

而其後的祭祀器用類，亦分二則，其一為祝版、祭文，以及蒼璧、黃琮、赤璋、白琥、珪、璧、簋、簠、簠、豆、筐、俎、五供、爵，及檀香、沉香、制帛等器用；其二，則主要為薩滿祭祀所用，諸如還願神杆、換索繩、神箭、神刀、扎皮、神帽、腰鈴、神帽上飄帶、神鏡等等；（圖5）這些也是祭神、祭天的範圍，載入《滿洲祭神祭天典禮》。⁸⁰顯然，從滿洲的角度來看，祭祀和其器用可具體分成兩個系統，其一主要是所謂的三代以降的禮制傳統，兼攝佛道特色的五供、用

78（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目錄，卷18，武備六，廬帳，臣工按語，頁19-20。此處所謂的清文鑑，很可能是指康熙年間的《御製清文鑑》，而序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御製增訂清文鑑》，此增訂版本詞彙更豐富，但成書較《皇朝禮器圖式》晚，《文淵閣四庫全書》繫年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皇朝禮器圖式》也可能已經參閱了尚在編輯中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參見〈御製增訂清文鑑提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32，頁1-2。

79（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232，卷6，禮部，祭祀類第一至二，頁190-193。

80（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232，卷6，禮部，祭祀器用類第一至二，頁193-197。

香，另一則是滿洲薩滿祭祀傳統。

《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的祭器規模雖然遠遠不及《皇朝禮器圖式》由六大門類組合成的龐大禮器體系，但除了西洋儀器之外，《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一如《御製增訂清文鑑》也列出的祭祀陳設所需器用，其中祭器是主要項目。滿洲特色祭器甚多，包括：神幔、點香銅香碟、供酒銀瓊、供饌銀盤、瓷缸、瓷碗、槽盆等等，而圍繞祭器的相關器用，也有類似於衣冠、樂器、鹵簿、武備的項目。薩滿跳神專用的服儀，諸如閃緞裙、神帽、神帽飄帶，及繫於身上的大腰鈴、神鏡等；也有可等同於樂器的三絃、琵琶、手鼓、鼓椎、神鈴、扎板等；乃至於由武器演化的神箭、拴紙條箭桿、神刀等；另外，滿洲祭典中大量使用盛放祭器的桌、櫃、架、漆匣、杌、亭等等，乃至蠹鐙、還願用神杆、杆上頂骨和草把，雖不若鹵簿需使人執掌，於滿洲祭禮中也都是不可或缺的陳設。⁸¹

再進一步對比《皇朝禮器圖式》和《御製增訂清文鑑》收錄的祭祀器具，以《皇朝禮器圖式》卷一祭器，天壇正位、配位所開列的祭器為例：蒼璧、匏爵、登、簠、簋、籩、豆、筐、俎、尊，以及陶爵、瓊等禮器，匏爵、陶爵的理解，甚有特殊性，詳後討論。又包括匏爵、陶爵，和筐、尊、瓊等並沒有收入《御製增訂清文鑑》，其原因應和當時如何認知、選定此器有關。尊（罇）、瓊在《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中卻是可見的祭器，對照滿漢文，及其器形圖像，不失作為理解當時看待這類禮器的參照資料。《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有數種瓊、罇，像是供酒銀瓊、獻酒銀瓊，查對滿漢文可知，瓊，就是杯子；（圖6）對照彩繪本夕月壇正位瓊，形制略同上述《典禮》銀瓊。而從盛清酒小黃磁罇、盛清酒大藍花磁罇可知，罇是酒瓶。（圖8）這些罇和《皇朝禮器圖式》的尊雖都是罐型，但滿洲用的酒瓶罇均有蓋，而且兩邊沒有加上獸耳。⁸² 滿文原義是杯、酒瓶對譯漢文的瓊、罇，彷彿滿洲祭器也具有流傳久遠的古雅性質。

《皇朝禮器圖式》的「俎」是一種新式祭器，（圖9）也是和滿洲祭器有所關聯的代表性例子。天壇正位俎圖說：

81 葉高樹，《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卷6，頁432-473；（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6，禮部，祭祀器用類第二，冊232，頁195-197。

82 對照滿漢文器名：供酒銀瓊，nure doboro menggun i hūntahan；獻酒銀瓊，nure gingnere menggun i hūntahan；盛清酒小黃磁罇 gocime nure tebure suwayan yeherei ajige malu，盛清酒大藍花磁罇 gocime nure tebure lamun ilhangga amba malu，可知瓊，是杯子 hūntahan；罇，是酒瓶 malu，清酒非燒酒 arki，而是指黃酒 nure。見葉高樹，《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頁439、462、472。

謹按，《禮記·祭統》：三牲之俎；〈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巵，殷以楮，周以房俎；鄭康成注：梲形足四，如案，巵為之距，楮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上下兩間有似於房。乾隆十三年欽定祭器，天壇正位俎，以木為之，髹以漆青色，中虛錫裏，外四周各銅環二，四足有跗，縱二尺三寸，橫三尺二寸，通高二尺三寸，實以特牲。⁸³

此處圖說引據《禮記》及鄭玄注說，以「房謂足下跗，上下兩間有似於房」為型範，跗是指物體的足部，類似腳背，對照《皇朝禮器圖式》的俎，確實做出有如上下二層，四足皆有跗連接的方型盛器；但也增加了上漆、錫內裡、銅環等新成分；而這些新成分還可彈性施用，像是放在太廟西廡，做為在太廟正殿、東廡之後置於西廡的唯一祭器，就和天壇用俎略有不同：

謹按，乾隆十三年欽定祭器，太廟西廡俎，以木為之，髹以漆紅色，中區為二，錫裏，加蓋，外左右各銅環二，六足有跗，縱三尺九寸，橫二尺八寸，通高二尺七寸有奇，實以少牢。⁸⁴

太廟西廡俎同是木質，但改用漆紅色、加蓋，銅環僅於左右側施用，並改四足為六足。此處的「實以少牢」，應是使用羊、豬為牲禮。

有意思的是，三代之俎雖見載於經典，也見於宋人聶崇義《新定三禮圖》，而明代俎的器形據《大明集禮》所示，整體仍如桌案，案面一如《新定三禮圖》，惟其四足設計添加兩列跗（圖 10-1、圖 10-2），乾隆十三年的新製可能參考了明制又更進一步推陳出新。⁸⁵ 此新制也許曾參考《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其中同是方型的祭品槽盆，像是供肉銀裏楠木大槽盆、盛血銀裏楠木小槽盆等，⁸⁶（圖 11）如此把俎直接和滿洲傳統器用相比擬，再加上經典的說法，創新而成。《御製增訂清文鑑》對於俎的定義十分清楚，說明這是一種和盛置祭品的槽盆相似的器具；可細分作整木槽盆、有把槽盆，⁸⁷ 而整木槽盆就是滿洲祭祀傳統用來盛置祭肉、整理豬隻臟器

83（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1，祭器，天壇正位俎，頁 10；地壇正位俎，頁 29，後者形制同前，惟改漆以黃色。

84（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2，祭器，太廟西廡，頁 23。

85（宋）聶崇義集注，《新定三禮圖》（通志堂藏板康熙丙辰（十五年）納蘭成德序，柏林國家圖書館藏），卷 13，頁 7-8；（明）徐一夔等奉勅撰，《大明集禮》，嘉靖九年六月望日御製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刻本，卷 7，頁 18-19。

86 這些滿洲器用及尺寸。見葉高樹，《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注》，頁 456-457、466-467，除了淘米所用有柄大木槽盆，據滿文器名可知是一種 yalhū（有把槽盆），其他均屬 oton（整木槽盆）。

87（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 232，卷 6，禮部，祭祀器用類第一，頁 194，

之用的方型器。⁸⁸這和有把槽盆一樣，也是滿人的日用器冊。

事實上，分析乾隆年間如何新造滿文俎 *amtun* 一詞，即可知道當時怎麼看待俎，它的構詞由來正是以滿語祭品 *amsun*，加上器 *tetun* 而成的。⁸⁹

五、《皇朝禮器圖式》的滿洲蒙古因素

何謂因素？不一定是指該禮器可追溯至時代更早的女真、滿洲，或契丹、蒙古等北亞部族之慣習傳統，而是可以用以區別特色由來的元素（elements），更多是指某種特別的情感取向（sentiments）。⁹⁰上述《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的編纂動機，可追至乾隆八年東巡盛京，反映刻不容緩的禮制需求。這種和滿洲舊俗連結的情感取向，尤其強烈。東巡的重點在於追思祖先，祭祀活動和表達滿洲意識有直接關係。可以確知當時就關注滿洲風俗的存續問題：

諭王公宗室等，爾等得與朕在清寧宮內祭祀，皆祖宗所賜之福，亦係滿洲之舊例也。今觀滿洲舊例，漸至廢弛，且如怡親王弘曉，不佩小刀，是何道理！⁹¹

盛京清寧宮亦是滿洲宮廷祭神祭天場所，乾隆皇帝卻直接表示祭祀舊例荒廢，又斥責怡親王行裝不配戴小刀、不合禮俗。乾隆八年之時，清朝入關幾近百年，這是否使他產生「禮樂百年而後興」之慨，雖不得而知，但乾隆皇帝首次東巡對於禮樂確實進行了特別的安排，還將此禮樂儀注收入《律呂正義後編》。禮儀中特別設計《世德舞》，故而亦有搭配使用的《御製世德舞樂章》、《御製世德舞樂章清漢文合

amtun，俎，滿文釋文：*amsun tebare*（盛置祭品）*mooi araha*（木製的）*oton*（整木槽盆）*i gese tetun*（相似的器具）*be amtun sembi*（稱之俎）。

88（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233，卷25，器冊部，器用類第六，頁52。*oton*，整木槽盆，滿文釋文：*gulhun moo be*（把整木）*yalhū ci*（比起有把有腳的槽盆）*asikan*（略小），*jafakū bethe akū*（無把、腳）*muheliyeken korime weilehengge*（中心挖空而製作者）*be, otun sembi*（稱之整木槽盆）。

89（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233，卷25，器冊部，器用類第六，頁52。*yalhū*，有把槽盆，滿文釋文：*gulhun moo be*（把整木）*oton ci*（比起整木槽盆）*ambakan bime*（略大而且）*duin jafakū sulabume*（保留四足）*weilehengge*（製作）*be yalhū sembi*（稱之有把槽盆），*undehen be acabume*（拼合木板）*fan i adali*（和方盤相同）*weilefi*（製作）*duin bethe jafakū sindahangge*（放上四足、手把者）*be inu yalhū sembi*。（亦稱之有把槽盆）。整木槽盆和有把槽盆，均是康熙年間已使用的滿文詞彙，參見（清）清聖祖敕纂，《御製清文鑑》（康熙四十七年，柏林國家圖書館藏），卷16，器用類第四，頁18。

90 林士鉉，《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頁12-13。

91《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02，乾隆八年十月上庚戌（一日），頁595。

譜》、《舞詞清漢文合譜》。

又如當時東巡重要的政治文化產品是著名的滿漢文《御製盛京賦》，廣泛傳播，成為表彰龍興之地、清朝根本重地的文學作品。也可和上述脫胎改編自傳統莽式舞而來的慶隆舞樂章兩相呼應，同樣是追思祖先事功，《盛京賦》尤其強調祀典，序言：

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宗廟禘嘗之典，固先王繼志述事之大經也。然自聖人象〈大過〉、肇封樹以來，上陵之制，漢代已然，我國家肇興盛京，邠岐之地，橋山在焉……⁹²

郊社之祭是指祭天祭地之典儀，禘嘗之祭是夏秋二季之祭祖大典。引用孔子之言，增加說服力，又引經典說明陵寢祭祖由來已久，《易經》也顯示禮俗，原本埋葬不堆墳墓、不立標誌，服喪也沒有定期的舊習，後來聖人改變為以棺槨殮葬，這大概是取象於〈大過卦〉。封樹之舉亦有《禮記·王制》為據，指古代貴族的葬禮堆土為墳，植樹為飾。漢代以來，已有去會見陵墓之規制。乾隆皇帝還特別將盛京地方比擬為周代先祖所居的邠（豳）、岐之地，黃帝所葬之橋山。

乾隆皇帝為了首次巡幸盛京祭祖，也直接扮演制禮作樂的角色。此舉開創其後凡遇有重大的戰役，即有武成凱旋之禮及宴饗之樂，像是《平定金川凱旋》（乾隆十四年，1749）、《平定西陲凱歌》（乾隆二十五年，1760）。⁹³ 由此亦可推知當時所謂的滿洲傳統祭祀典章，也同步形成各種樂章，置入有著經書地位的《律呂正義後編》之中。

92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02，乾隆八年十月上庚戌（一日），頁596，《御製盛京賦·并序》。其中「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引自《中庸》第十九章。該段滿文譯本如下：kungdz i henduhengge（孔子曰），ten i wecen, boihoju wecen i dorolon, juwari wecen, bolori wecen i jurgan be getukelehe de（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gurun be dasarangge falanggū be tuwara adali kai sehebi（治國其如示諸掌乎）。mafari juktehen, juwari wecen, bolori wecen i kooli serengge（宗廟禘嘗之典），yargiyan i nenehe han sai mujin be siraha baita be fisebuhe amba enteheme（固先王繼志述事之大經也），tuttu seme, enduringge niyalma amba daban i jijuha be dursuleme, eifu arara moo tebure be deribuhe ci ebsi（然自聖人象大過、肇封樹以來），mungan de acanara kooli（上陵之制），han gurun i fon ci aifini uttu bihebi（漢代已然），musei gurun booi fukjin deribuhe mukden i ba（我國家肇興盛京），uthai jeo gurun i bin, ki i ba（邠岐之地），hūwang di forgon i kiyoo šan alin i adali（橋山在焉）。參見（清）清高宗，《御製盛京賦·并序》，中央民族大學藏滿文刻本。

93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51，宴饗樂七，皇帝幸盛京，冊216，儀式說明見頁460-462；禮儀樂節具、樂章、樂譜，見頁463-472；禮儀中特別設計《世德舞》，故亦有《御製世德舞樂章》、《御製世德舞樂章清漢文合譜》、《舞詞清漢文合譜》，見頁473-482；卷52，宴饗樂八，另有《平定金川凱旋》（乾隆十四年）、《平定西陲凱歌》（乾隆二十五年）。

滿人祭祝祖先所用祭器自然特別考慮加入滿洲因素，例如，為了維持滿洲舊俗，在陵寢祭器中置有銅束刀子項目，以及對應飲茶風尚的茶桶等。⁹⁴ 又根據陳芳妹教授指出，乾隆九年（1744），始建先蠶壇告成，在先蠶典禮中，滿洲親貴婦女扮演角色重要。藏於國立臺北故宮的《孝賢皇后親蠶圖》卷，描繪皇后主持先蠶禮的相關流程。⁹⁵ 總之，乾隆前期已在各種典儀實踐中，完備實用的禮制，並且不時呈現滿洲特色。

回到《皇朝禮器圖式》，壇廟供奉所使用的新式祭器，似乎沒有納入滿洲祭器，雖看似不存在滿洲特色，但仍有跡可尋。祭天祭地之重器「匏爵」是個相當有代表的例子。（圖 12～14）

近來已有學者注意到祭天所用天壇正位匏爵的特殊性，此處接續前文以滿文翻譯禮經經典的角度，探究當時如何詮釋及再現三代禮制傳統的禮器，這確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而上述收入許多祭祀及有關器用詞彙的《御製增訂清文鑑》正可提供若干線索。乾隆十三年所規範的新式匏爵，雖以匏爵之名，卻是多種材質的組合，包括半個椰殼、金質內裡，搭架在檀香木製象徵爵形的三足器上，⁹⁶ 吳曉筠分析以椰子為材質的匏爵，「由粵海關以南方邊境特有的材料製作天壇匏爵杯，不論在材質及地域空間的想像的作法，均是相當顛覆傳統」。⁹⁷ 賴毓芝則指出，其造型和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常於奇品收藏室（Kunstkammer）中常見的「椰殼高腳杯」相近，這類奇品是藉以現神創造世界之縮微展示，且「這類來自遠方異國原始原料的加工物通常是作為實現神作與人作完美結合的典範，而清宮對此傳統並不陌生。」（圖 15）⁹⁸ 新制匏爵和多種域外因素連結的可能性確實是存在的，清宮也確實利用椰

94 參見賴惠敏，〈乾隆皇帝製作金屬祭器的意義〉，頁 45-94。

95 陳芳妹教授專題演講：「《皇朝禮器圖式》的歷史脈絡——乾隆帝的制禮作樂」，「《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 年 8 月 23 日；亦見「《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明清研究通訊》，75 期（2019.1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780（檢索日期：2020 年 5 月 1 日）。另參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72，乾隆七年八月上辛卯（五日），頁 192-194，定親蠶典禮；卷 214，乾隆九年四月上戊申（一日），頁 744，始建先蠶壇告成，議敘官員。

96（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1，祭器，頁 2。地壇正位匏爵因形制同天壇匏爵，內府刻本及四庫本均不另繪，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備物昭誠·祭器圖》，48 冊 6 函。彩繪本冊頁裝式，與《皇朝禮器圖式·祭器》圖序基本相同，但圖繪比例不同，圖說文字間有出入。見 <https://img.dpm.org.cn/ancient/mingqing/158682.html?hl=%E7%A5%AD%E5%99%A8>（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97 吳曉筠，〈孔廟與乾隆朝祭器的設置〉，《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2 期（2020.4），頁 93-134。該文認為，《皇朝禮器圖式》所載乾隆朝改革的祭器，延續若干明代祭器，及雍正年間的新式孔廟祭器，還有一些孔廟脈絡以外的類別，包括沿襲明代的皇朝祭禮器，以及當朝的創新祭器。

98 賴毓芝，〈「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頁 18。

子進行可供飲食和收納之工藝器用，例如，樹泡椰瓢、銀裡椰子圓盒，及商銀裡椰瓢碗、椰瓢盃、椰瓢盃盤（圖 16）；⁹⁹ 而國立故宮博物院也收藏數件椰子念珠，這類應屬佛教用具（圖 17）。¹⁰⁰

《皇朝禮器圖式》匏爵圖說：

謹按，《禮記·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宋《開寶禮》：郊祀初獻以玉斚玉瓚，亞獻以金斚，終獻以匏斚。慶曆中，太常請皇帝獻天地，配帝以匏爵。本朝舊制，園丘用蒼玉爵。乾隆十三年，欽定祭器，皇天上帝、列聖配位，俱用匏爵，剝椰實之半，不雕刻，取尚質之義，高一寸八分，深一寸三分，口徑三寸七分，金裏，承以旃檀香為之，其下岐出為三足，象爵形，高二寸九分。¹⁰¹

可知匏爵以《禮記·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為核心製器理論，究竟當時如何理解陶匏之器的性質，匏和椰子有沒有關係可尋呢？滿文文獻仍可提供理解角度。「器用陶匏」，乾隆年間滿文直譯作：使用瓦器、葫蘆器；瓦器即指陶。¹⁰²（圖 18）匏、葫蘆和椰子當然是不一樣的物種，雖然如此，匏的滿文讀如 hoto，椰子的滿文讀如 hotoci，它們共同使用一個核心詞（hoto），而滿文 hotoci（椰子）一詞在乾隆朝之前似尚未出現，當是乾隆年間的新造滿文，（圖 19）據此可以推知椰子的性質和匏是有共性的，並非全然無關。¹⁰³ 至於滿文對於爵的解釋，即是具有三足的杯子，¹⁰⁴ 故新制匏爵當是以椰子製的，帶有三足的杯子，¹⁰⁵ 所以滿文

9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 7，乾隆二年十月，匣作，頁 807-810；冊 19，乾隆十七年十月，鍍金作，頁 617-620

100 包括，（清）椰子嵌銀絲梵文數珠、（清）椰子珠、（清）椰子念珠、（清）椰子念珠，資料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https://antiquities.npm.gov.tw>（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101（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1，祭器，頁 2。

102「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滿文譯作 wase（瓦）hoto（匏）tetun（器）be baitalarangge（使用），abka na i banin（天地之性）be dursulerengge（模仿），參見《御製繙譯禮記》，卷 11，郊特牲，冊 186，頁 323。胡增益，《新滿漢大辭典》，頁 805，陶器，wasei（瓦之）tetun（器）。

103（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27，食物部一，菜穀類，冊 233，頁 129；卷 28，雜果部，果品類，冊 233，頁 174。hotoci 當是乾隆年間才固定使用的新字，此字從葫蘆 hoto 延伸而來，因為 -ci 做為滿洲語文的名詞附加成分，應該是表達外皮、殼的意思。

104（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6，禮部，祭祀器用類，冊 232，頁 195。爵，ilan bethenge hūntahan，滿文釋文：aisin gu i araha（用金、玉做的）nure tebure tetun i gebu（盛酒的器名），ilan bethe（三足），dalba de jafakū arahabi（於旁做把）。

105 新制匏爵就是三足椰子杯，不同於傳統對於匏爵、匏樽以葫蘆製的理解。雖然《御製增訂清文鑑》沒有收入匏爵一詞，早期的滿文字書尚有匏樽一詞，hoto i hūntaha，即葫蘆杯，參見（清）沈啟亮，《大清全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康熙二十二年京師宛羽齋刻本），

文獻顯示的，基本上也符合《皇朝禮器圖式》的圖說。

匏、葫蘆其滿文 *hoto* 其實也有頭蓋骨的意思，它們都有十分類似的外觀，如此一來，則和西藏佛教的嘎布拉（*kapāla*）供碗這種法器些有相似，即由人的頭蓋骨製成，且安置在臺座上（圖 21）；又如七政寶，一組七件，除了做為佛堂供器，也是帝王藉以祈福的吉祥物，七政寶托置在盛開的蓮花上，蓮花梗立在蓮座上，亦頗似高腳杯造型（圖 20）。¹⁰⁶

雖然為何使用椰子做為新樣匏爵祭器的原因，尚無史料可直接證明，但無論從西洋角度，或是從滿文文獻理解匏（葫蘆）、頭蓋骨，和椰子的關係，以及清宮使用椰子材料之器用及宗教法器，都有助於理解當時改制禮器利用非漢因素的可能性脈絡。

祭器中不少壇廟應用陶爵，以陶爵之名，材質並非用陶，一如匏爵不用匏，又像是天壇從位陶爵，用青色；地壇從位陶爵，用黃色；朝日壇陶爵，用紅色；（圖 22、23）夕月壇正位陶爵，用月白色；太廟東廡陶爵，用白色；又有用玉、金、銅等材質的爵，太廟正殿用玉爵、社稷壇位玉爵乃以玉為材質等等，且都有特選的紋樣。其形式也不完全按照古籍考證所得進行複製。¹⁰⁷ 奉先殿金爵，當可反映喜歡用金質器的族群傳統，故於太廟、奉先殿等屬於皇家體系的廟宇，祭器用純金或鍍金；而文廟正位所用禮器，包括銅爵，均範銅為之，則是自雍正年間的禮器改革，即曾以內府所製銅五供，及銅簠簋等頒賞曲阜孔廟，此舉對乾隆年間改革祭器及《皇朝禮器圖式》的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¹⁰⁸ 而五供與佛道系統淵源較深，雖不見於《皇朝禮器圖式》，卻收入《御製增訂清文鑑》祭祀器用類，同時也還收入許多種香，例如降香、速香、檀香等，這些不見於《皇朝禮器圖式》的祭祀器用，正是整體禮制體系裡的非漢因素。

透過《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文詞彙、釋文可分析當時對於這些器用的構詞想

頁 105。另據收入《御製增訂清文鑑》的爵墊 *hūntahan i tokton*（杯子的固定物）一詞，爵就是杯子；釋文：*hūntahan sindara alihan*（放杯子的邊上加縫的布）*be hūntahan i tokton sembi*（稱之爵墊）。

106 蔡玫芬，《皇權與佛法：藏傳佛教法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七政寶，頁 171；嘎布拉供碗，頁 191。

107（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1，頁 12、31、36、40、52；卷 2，頁 1、15。

108（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2，頁 24-25；賴惠敏，〈乾隆皇帝製作金屬祭器的意義〉，頁 65；陳芳妹，〈雍正帝贈送曲阜孔廟的祭器——畫琺瑯五供與銅簠簋〉，《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1 期（2020.3），頁 73-142。

法、定義和知識分類系統，可謂整合了多種來源不同的概念，統合在《御製增訂清文鑑》裡，也把由來可謂是非漢、非滿的因素，整合為滿洲的。

除了器形和材質俱呈現創新，新制禮器對於顏色的選用，也有其考究之處。例如，夕月壇正位所用祭器，除了首列白璧以玉為材質，以白色作為器名的一部分外，其他在器名未直接顯示顏色者，《皇朝禮器圖式》圖說對於材質、尺寸、顏色等訊息，均予以清楚說明，其中籩、筐則編竹而成，而其他諸如陶爵、琖、登、銅、簠、簋、俎、尊等，則是瓷器，且一體使用月白色。¹⁰⁹ 對比現存瓷器及《皇朝禮器圖式》彩繪本，對於月白色的實際特徵，或可進行一定程度的分析，若參考《御製增訂清文鑑》的滿文釋文：「月白色是比起灰色而略帶淺藍色」，定義十分明確。¹¹⁰（圖 24）事實上，就連所謂的玉質白璧這樣的白色應如何理解，也值得進一步討論。據《皇朝禮器圖式》夕月壇正位白璧圖說：

謹按，《考工記·玉人》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舊制，夕月壇用白琥。考《周禮·大宗伯》以白琥禮西方；《注》琥，猛，象秋嚴。聶崇義引《嚴鄭圖》云：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形制不符且非以祀月。乾隆十三年，欽定祭器夕月壇用白璧，圓徑三寸六分好，方徑二分有奇，通厚三分有奇。¹¹¹

圖說提及舊制使用白琥，此名出自《周禮》，但對於傳統禮圖的權威之作，宋人聶崇義《三禮圖》所考釋的白琥形象則不以為然，僅取白璧之名（圖 25、26）。¹¹² 而對照《御製增訂清文鑑》則使用經典中的白琥，意即淡白色有威武的玉；釋文還說明這是祭月用玉之名，圓形且扁平，中間有個有角的孔，顏色微帶白。不但清楚表示最核心的器形特徵，其色也不是純然似雪的白色，而是淡白色；¹¹³ 重要的是，滿

109(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1，祭器，頁 51-61。

110(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 232，卷 23，布帛部，采色類第三，頁 785；guweciheri，月白；滿文釋文：fulenggi boco ci（比灰色）majige lamukan（稍微淺藍）be guweciheri sembi（稱之月白）卷一，祭器，頁 51-61。另參柏林國家圖書館藏，內府刻本，卷 23，頁 30。關於「月白色」瓷器的特色與定義的討論，參見 Dr. Iain Clark, "A Question of Colour: the Attribution of Huang chao li qi tu shi Ceramic Ritual Vessels"（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 年 8 月 22 日）。

111(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1，祭器，頁 51。相較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備物昭誠·祭器圖》，二者器名與圖說都稍有差異，後者器名為「夕月壇正位玉白璧繪圖十分之四」。

112(宋)聶崇義集注，《新定三禮圖》，卷 11，頁 2。

113(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 232，卷 6，禮部，祭祀器用類，頁 193。šahūn horonggo gu（白琥），釋文：biya wecere de（祭月時）baitalara gu i gebu（用玉之名）mulfiyen bime necin（圓且平）dulimbade（在中央）hošonggo sangga（有角的孔）bi（有）boco（色）šahūkan（微帶白）。

文淡白色也可延伸為月白色。¹¹⁴是故，從滿文對色彩的定義來看，夕月壇祭器的用色實際上具有一致性表現。

《皇朝禮器圖式》中的蒙古因素主要表現冠服、樂器，及有關八旗武備等範圍，品類看似不多，但也十分醒目，有些器具便直接以蒙古、索倫、厄魯特為名。只是《皇朝禮器圖式》裡沒有說明它們的由來，本文受限於史料，暫且簡介若干特徵。

在冠服方面，我們無法就目錄所列直接挑出所謂的蒙古名色，但討論蒙古因素，或許可由冠服施用於外部對象進行觀察。乾隆年間改定禮制，不只對內，也對外邦使臣，就目前史料所見，尤其針對準噶爾汗國。在乾隆二十年（1755）平準戰爭之前，清準雙方定期派遣使臣，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賜準噶爾使臣瑪木特等，緞布、銀兩、冠服有差，¹¹⁵賞賜中出現「冠服」是之前少見的現象。¹¹⁶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三日，賜準噶爾使臣噶集等物，亦同樣出現冠服。¹¹⁷為何此刻賞賜準噶爾使臣的禮物開始出現不同於以往的特色，此處無法深究，而是年年底恰為明確重訂、繪製各項禮器圖計畫正啟動之時，是否因而重視冠服的意義且及於部分外邦之人？

對於率領部眾主動前來投誠的準噶爾汗國（厄魯特）貴族，經評估接納後，清方亦多加封賞，在宴會場合他們也穿戴的清朝冠服也相應於所受品級，例如，乾隆十八年（1753）十一月，準噶爾汗國的杜爾伯特部其中台吉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孟克等，率所部三千餘戶來降；隨後安排彼等至熱河朝覲，編旗分佐領，賜給封號，於乾隆十九年（1754）五月十五日，舉辦重大筵宴慶典。¹¹⁸郎世寧等繪製

114 安雙成，《滿漢大辭典》，頁 548。另據筆者初步考察，康熙年間清聖祖敕纂《御製清文鑑》（康熙四十七年，1708）並沒有收入月白一詞，但民間刊行的字書如（清）沈啟亮，《大清全書》（康熙二十二年，1683，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清）劉順、桑格編《廣彙全書》（康熙四十一年，1702，柏林國家圖書館藏），以及（清）屯圖，《一學三貫清文鑑》（乾隆十一年，1746，柏林國家圖書館藏）卻收入此詞，而這些滿文字書裡的月白，和乾隆年間指標作用的《御製增訂清文鑑》月白的滿文表示法也不盡相同，可見這個詞彙使用已久，且歷經規範化歷程。

115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82，乾隆十二年正月丙申（六日），頁 680。

116 就目前所見記錄，康熙年間已有賞賜厄魯特貴族衣冠，見《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09，康熙四十一年七月至九月，八月庚辰朔（一日），頁 123，「上駐蹕瑚爾希勒昂阿地方。來降厄魯特台吉丹津阿拉布坦遣使請安，賜丹津阿拉布坦御用冠服，並烏鎗一桿；賞來使各蟒衣一襲，白金五十兩。」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主持西藏藏內事務的郡王頗羅鼐（1689-1747），也接受過清朝中央賞賜的衣冠，是乾隆年間較早的紀錄，見駐藏大臣傅清，〈奏郡王頗羅鼐謝賞衣冠等物恩摺〉，乾隆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軍機處全宗》，檔號 03-0173-0962-00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117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12，乾隆十三年四月丙寅（十三日），頁 120。

118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451，乾隆十八年十一月下甲戌（二十三日），頁 874；卷

的《萬樹園賜宴圖》即是當時的紀實畫作。重要的是，圖中所示在一群蒙古部眾之前，排列的受賞外邦人員，（圖 27）為何他們必須改著清朝衣冠？《皇朝禮器圖式》對於賞賜衣冠的看法如下：

臣等伏以禮之大者，昭名分，辨等威，莫備乎冠服。自觀象作服，文明漸啟，夏收殷尋，損益不同，所以成一代之制度而垂法守也。我朝冠服之制，夏涼冬煖，各因其時；而品節燦然，觀瞻有秩，蓋列聖相承，準宜定，美備乃克臻。此我皇上慎守成憲，治協垂衣，要荒之外，至于二萬里，咸襲冠帶，今所編摩，儀式具在，洵矣放之四海而大同，昭茲來許而勿替者也。¹¹⁹

據臣工案語可知，將冠服用於賞賜外邦，正可展示職貢關係的名分區別，尤其上述前來投誠的杜爾伯特部眾，他們已經被納入藩部體系裡，不完全是外國人，具有內部成員性質。在征服準噶爾部、回部之後，包括歸降、內附的許多西域的蒙古部族、回部、哈薩克、巴（拔）達克山、土爾扈特部等，他們有些也接受清朝賜給的王公爵位。¹²⁰

在樂器方面，充滿滿洲和域外因素，其中蒙古因素有較突出的表現。¹²¹雖然只列載樂器形制，卻應用於各種燕饗場合，演奏不同樂曲。燕饗朝鮮國俳樂是屬國的代表；燕饗瓦爾喀部舞樂是東北部族的代表；源自滿洲本身傳的舞樂，則有燕饗慶隆舞樂，使用樂器「節十六、箏一、琵琶八、三絃八、奚琴一、拍板十六」，¹²²而搭配的滿漢文詞章〈慶隆舞樂章清漢文合譜〉，亦收入於《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內容

455，乾隆十九年正月下己卯（二十九日），頁 930；卷 462，乾隆十九年閏四月上甲子（十五日），頁 1002；卷 464，乾隆十九年五月庚寅（十二日），頁 1021；卷 464，乾隆十九年五月上癸巳（十五日），頁 1023。

119（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目錄三，卷 4，冠服一，臣工案語，頁 41-42。

120 相關記錄甚多，參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記載，例如：卷 496，乾隆二十年九月上癸未（十二日），頁 237，「上御澹泊敬誠殿。受綽羅斯台吉噶勒藏多爾濟等朝，各賜冠服。」卷 627，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下癸巳（二十三日），頁 1043，「上御西廡幄次。賜朝正外藩蒙古王公，及回部郡王霍集斯等、葉爾羌諸回城伯克薩里等宴，并費冠服、幣、帛有差。」卷 654，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上丁丑（十三日），頁 325，「哈薩克使臣策伯克等入覲，上召見，賜冠服有差。」卷 677，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下丁巳（二十九日），頁 576，「愛烏罕使人和卓密爾哈、巴達克山使人阿布都爾阿木咱、霍罕使人巴巴什克、西哈薩克烏爾根齊部使人塞德克勒、奇齊玉斯部使人烏克巴什頗拉特、回部喀什噶爾諸城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等入覲，於午門前，恭迎聖駕；御重華宮，召見愛烏罕使人等。賜茶，費冠服有差。」卷 892，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上乙巳（八日），頁 963，「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以歸順入覲，上御行幄受朝，賞頂帶、冠服有差。」卷 1353，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下癸酉（二十三日），頁 125，「敕諭安南國王阮光平曰，……俟入覲時，頒發敕書，並賞給冠服……」。

121（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9，樂器二，頁 39-63。

122（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目錄，卷 9，樂器二，頁 8。

為清朝開國以及清初諸帝的功績。至於燕饗回部樂，明顯為了表彰乾隆年間征服回部之戰功，¹²³ 容後再敘。

蒙古樂在哪裡？除了蒙古角之外，似乎沒有發現，但事實上，樂器演奏的燕饗筭吹樂、燕饗番部合樂其實是蒙古樂。¹²⁴ 前者使用著口琴、箏、胡琴、胡筭等樂器；後者樂團頗有規模，需用雲鑼、箏、琵琶、三絃、胡琴、月琴、二絃、提琴、火不思、軋箏、管、簫、笛、笙、拍板等樂器。¹²⁵ 這些樂曲其實部分也配有詞、譜，且詞章以滿蒙漢文字書寫，另載於上述的《御製律呂正義後編》。¹²⁶ 燕饗筭吹樂還搭配《筭吹樂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曲目六十七篇，以滿、蒙、漢三文寫成，並在蒙古詞章旁標注工尺譜。¹²⁷（圖 28）燕饗番部合樂則搭配《番部合奏樂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曲目三十一篇，部分以滿、蒙、漢三體文詞者，亦在蒙古詞章旁標注工尺譜。（圖 29）¹²⁸ 這種形式或許表示真正吟唱的是蒙古語唱辭。清宮特別使用滿語 *cordombi* 一詞，表示奏蒙古樂，即是配合蒙古歌曲，演奏胡筭、口琴等器物之樂。雖然不以蒙古之名，卻是十足的蒙古因素。¹²⁹

至於以蒙古之名的蒙古角，使用於巡幸鑾吹樂，根據《皇朝禮器圖式》的說明，是十分有特色的樂器：

按本朝定制，巡幸鑾吹樂蒙古角，規木為之，中虛末哆，上長四尺七寸三分，下長三尺五寸二分，金口長一尺六寸七分，徑七寸二分九釐，內徑微大而聲濁者雄，微小而聲清者雌，長短若一，以角哨入管端吹之，通繫以黃繪雲龍，以銅束之，凡銅飾皆塗金，結黃絨紉，垂紅黃粧緞小幡各一。¹³⁰

蒙古角做為巡幸鑾吹樂所需樂器之一，（圖 30）製作時可控制內徑大小，決定發聲之清濁，且和金、雲鑼、銅鼓、銅點、正鈸、金口角、大銅角、小銅角、管等，

123 整體清朝的宮廷禮樂狀況以及樂器器名的滿蒙文特色，參見邱源媛，《清前期宮廷禮樂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124《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 46，頁 370-377。

125（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目錄，卷 9，樂器二，頁 8-9。

126 清宮演奏蒙古樂曲的曲目及樂器特色，參見林士鉉，《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頁 103-145。

127《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 47，頁 380-419。

128《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 48，頁 439-420。

129（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 232，卷 7，樂部，樂類第三，頁 207。*cordombi*，奏蒙古樂，或音譯作撥爾多密，滿文釋文：*monggoi ucun de acabume*（配合蒙古歌曲）*coron mekeni i jergi jaka i kumun deribure*（演奏胡筭、口琴等器物之樂）*be cordombi sembi*（稱之奏蒙古樂）。*cordombi* 的詞源也是來自蒙古語。

130（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9，樂器，頁 14。

組成規模不小的樂團。¹³¹ 蒙古角在滿文辭書中，譯作 *monggo* (蒙古) *buren* (大號角、海螺)，它的基本形式是中間置木，邊緣置銅，和喇叭相同，而做得非常長。¹³² 但這和《皇朝禮器圖式》的蒙古角，邊緣開口較小，特徵不太相同，並不似喇叭、海螺。事實上，這類的鼓、號角等樂器，是蒙古傳統的宗教類樂器，(圖 31) 經過改造，特別列入巡幸饒樂，似是一種新制樂器。冠上蒙古之名，或許是表示外來的性質。

《皇朝禮器圖式》武備類也出現名為蒙古花大交鎗、蒙古花小交鎗的火器各二種。¹³³ 雖然圖說顯示為本朝製，但這或許是和俄羅斯貿易而來的商品；¹³⁴ 如何從外國商品變成本朝所製，且留下蒙古之名，是否又是一個具有域外性質的例證，有待進一步考察。

另外有關武備旗纛之禮器，其中有一種名為「皇帝行圍蒙古纛」。皇帝離開宮城，行營戒備嚴肅，以八旗軍護衛，也配用各種旗纛，諸如皇帝行營內旌門纛、皇帝行營內城旗、皇帝行營外旌門纛、皇帝行營外城旗、皇帝行營吉爾丹纛、皇帝行圍後護旗、皇帝行圍纛、皇帝行圍蒙古纛。¹³⁵ 前四種定制於乾隆二十年，後四種為本朝定制，其中除了皇帝行營內城旗、皇帝行圍吉爾丹纛之外，均配合八旗之制。所謂吉爾丹是滿語 *girdan* 的音譯，即指幡，或專指蜈蚣纛、薩滿巫師身上的飄帶等等；它做為旗纛的基本特徵是旗幅週邊飾以鋸齒狀布條。¹³⁶ 北京故宮所藏明黃色緞繡雲金龍戲珠紋三角纛十分近似吉爾丹纛，也和《皇朝禮器圖式》規範的八旗護軍統領纛相近，同樣都是週邊飾以鋸齒狀布條(圖 32)。

行圍是皇帝到圍場進行圍獵，是維繫滿洲騎射傳統的重要活動。為何在行圍時要使用以蒙古之名的不加緣、不施繪繡的蒙古纛，據圖說所述：

131(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目錄，卷 9，樂器，頁 4。

132(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 232，卷 7，樂部，樂器類第二，頁 211。*monggo buren*，蒙古角，滿文釋文：*dulimbade moo, ujan de teišun sindame* (中間置木，邊緣置銅)，*buleri i adali* (和喇叭相同) *umesi golmin obume arahange* (做得非常長) *be monggo buren sembi* (稱之蒙古角)。蒙古角，*monggo buren* 對應的蒙古文：*mongyol būriy_e*，參見清高宗敕纂，《五體清文鑑》(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頁 716。

133(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16，武備四，火器，頁 53-56。

134 感謝某位審查人惠告卓見。

135(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17，武備五，旗纛，頁 1-8。

136(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 232，卷 9，武功部二，軍器類第七，頁 301，*girdan*，蜈蚣纛，釋文：*turun kiru i debsibuku i šurdeme* (旗幅週邊) *argan i adali weilehengge* (製作和鋸齒相同者) *be girdan sembi* (稱之蜈蚣纛)。另參見《滿漢大辭典》，頁 554，*šešeri umiyaha*，蜈蚣；頁 628，*tuktarhan*，蜈蚣梯，即一根木的梯子。

謹按本朝定制，皇帝行圍，蒙古纛五，正黃、正白、正紅各一，正藍二，俱以綢為之，各如旗色，不加緣，正幅不施繪繡，皆絳徑六尺四寸，旂徑六尺，杆以竹繫朱束藤，長一丈四尺五寸，圍六寸三分，首冠鍍銀鐵輪，頂注黑旒，末鐵鐏長四寸，旁施鐵鐶，穿革植纛中，正黃兩協，正白、正紅兩末，正藍環行，相遇則圍合，木蘭行圍用之。¹³⁷

可知這是清朝前期長年在木蘭圍場進行圍獵時所用，或許是蒙古王公經常參與木蘭行圍之故。類似這種不加緣，正幅不施繪繡的旗纛者，尚有皇帝行圍纛，這是在南苑行圍使用的，其餘旗纛正幅均施以繪繡。¹³⁸

六、從滿蒙到西域西洋——兼論收入儀器、武備之創舉

前文已討論乾隆皇帝將儀器及武備二類加入《皇朝禮器圖式》，找出經典依據，也是將禮經禮制以體用論進行詮釋演繹的表現。此番不尋常、不合古例的作為，可從「托古改制」的角度分析當時的現實條件，也反映當時的政治文化特色。

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初五日，福隆安、于敏中、王際華為校勘《皇朝禮器圖式》告竣進表，其中一段十分突出的說明，概括了《皇朝禮器圖式》的重點內容：「測量新製，遠訖流沙；奏凱和聲，升歌樂府；鞬韉所掌，廣回部之方音；武庫攸藏，著天山之俘獲。」¹³⁹ 這直接指涉的是儀器、樂器、武備。透過儀器測量，曆象輿圖才有精確的可能；鞬韉是指周代掌管外邦樂的機構，類比於乾隆年間新設的樂部；武庫應指紫光閣，攸藏平定天山南北準部、回部的重要武器及旗幟，這些全都在訴說平定西域之於《皇朝禮器圖式》的重要性。把平準平回的成果透過官方圖籍增修出版，包括《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等志書系列，新制輿圖，乃至於製作戰圖銅版畫，也包括本文討論的《皇朝禮器圖式》、《皇清職貢圖》等諸多文獻，均將西域因素進行全方位展示，意圖使其無所不在。

（一）平定西域與《皇朝禮器圖式》

平定西域是指乾隆二十至二十四年（1755-1759），二次平定準噶爾部，以及回

137（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17，武備五，旗纛，頁8。

138（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17，武備五，旗纛，頁7。

139（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福隆安、于敏中、王際華進表，頁3。

部之役。¹⁴⁰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乾隆皇帝以平定回部宣諭中外。¹⁴¹ 而禮器革新行動始於乾隆十三年、禮器館約成立於十五年，計畫之初，新訂禮器圖式的規模或許不致於已預知未來，納入龐大的西域因素。

在樂器門類裡，看似與西域無關的朝會樂器，中和韶樂鐃鐘第一黃鍾，是十二鐃鐘之一，卻特別與西域因素連繫。乾隆二十四年，「江西臨江府得古鐃鐘，撫臣以獻於朝，適當西師奏凱之時，功成樂作，式彰瑞應。上既考古制，釐定其名，復詔樂部，仿鑄鐃鐘十二，以備宮懸。」¹⁴² 又以西域所產和闐玉料，製特磬與鐃鐘相配，此瑞應鐃鐘的意義，透過《皇朝禮器圖式》樂器目錄的臣工案語，再次強調「大武告成之會，天貺地符不期自集」、「用彰始終條理之盛」。¹⁴³

為慶賀平定回部功成凱旋，相關禮樂需求又有所增加，設計了《凱旋鐃歌》與《凱旋凱歌》，¹⁴⁴ 及其相應使用的樂器，做為樂器門類最後兩組樂器群，均是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皇帝親行郊勞禮時所奏。¹⁴⁵ 而燕饗樂曲所用樂器，也以回部樂器做為壓軸，採自回部當地樂器包括：巴拉滿、蘇爾奈、哈爾扎克、喀爾奈、塞他爾、喇巴卜、達卜、那噶喇。¹⁴⁶

因應平定西域而新添的樂章，還包括《平西慶隆舞樂章清漢文合譜》、《平西笛吹樂章清漢合譜》，此舉乃在舊有的慶隆樂章、笛吹樂章之後，編寫新樂，冠以平西之名，並列滿漢文唱辭；前者唱辭主要概述二次平定準噶爾之役的過程，像是：「鬼域阿酋匍匐帝庭，寵以藩服秉鉞專征」；「俘達瓦齊再生曲宥，念彼軍勞崇封晉授」；「阿酋狡獪將伏天誅，妄冀非分叛於中途」；「似彼狂酋徒然自燬，竄俄羅斯疫

140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頁9-107。

141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599，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下庚子（二十三日），頁699-701。除了通諭之外，另諭軍機大臣，「併將大功告成，傳諭章嘉呼圖克圖，及駐藏大臣，俾衛藏，及阿哩、拉達克等處知之。」頁702。

142 《皇朝禮器圖式》，卷8，樂器一，朝會，頁3-4。因回部戰役功成而新增的宮廷音樂，面向甚多，至少包括：乾隆二十四年，江西臨江府得古鐃鐘，乃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特設「韻古堂」典藏，並據以鑄鐃鐘編入中和韶樂；以西域所產和闐玉料，製特磬與鐃鐘相配；乾隆二十五年新增《凱旋鐃歌》與《凱旋凱歌》，收入《律呂正義後編》；獲回部樂器與表演樂工回部樂納為宮廷燕饗部樂之一，其樂器收入《皇朝禮器圖式》。參見余慧君，〈遵律度於無疆：《皇朝禮器圖式》樂器卷研究〉，頁95-133。

143（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目錄，樂器二，頁12。案語：「迺者西江得古鐃鐘，獻之闕下，適當西師耆定，大武告成之會，天貺地符，不期自集；爰詔所司，稽古做鑄，復俞廷工，請以和闐貢玉琢為特磬，用彰始終條理之盛。」

144《律呂正義後編》，卷41，凱旋儀注見頁279-283；鐃歌樂章見頁281-283；鐃歌樂譜見頁283-295；凱歌部分，見頁296-305。

145（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9，樂器二，頁64-74。

146（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9，樂器二，頁56-63。筆者按，《御製增訂清文鑑》卷7樂器類並未收錄番部合奏的火不思，以及回部樂器，也是一個特別的現象，留待未來考察。

戕其命」。¹⁴⁷ 這樣的唱辭，十分赤裸宣洩未能親獲戰犯阿睦爾撒納的情緒，似乎只是為了紀功，不具有定期、重覆演出的價值，我們也無法確知它的演出紀錄，但卻立基於禮樂政治文化，以工麗的詞曲樂章形式，編入官方文獻，發揮傳述官方歷史意識的作用，確實成為整體論述西域戰功的一環。

事實上，清宮除了燕饗回部樂及樂器之外，尚有燕饗安南國樂、緬甸國樂、廓爾喀部樂器，均與乾隆年間十全武功有關，因戰事發生出版《皇朝禮器圖式》之後，故刻本並未收錄，然而全部收入四庫本，置於回部樂器之後，凱旋饒歌樂之前（圖 33～35）；安南國樂勘定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緬甸國樂為乾隆五十三年（1788）所獻，廓爾喀部樂為乾隆五十七年（1792）戰後進表所獻。¹⁴⁸ 使用這些新增的樂器演奏的樂章除有滿、蒙、漢文唱詞，也並列各該國、部族語文（圖 34～36）。¹⁴⁹ 而樂器也涉及《皇朝禮器圖式》彩繪本和刻本、四庫本的形成過程問題，刻本《皇朝禮器圖式》雖止於回部樂，四庫本因編寫歷程較久，且可以抽頁更換內容。總之，回部樂開啟帝國宴樂的新增成員，也可由此確立。

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皇帝判斷征討回部戰事結束、宣諭中外的是根據「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等奏到，巴達克山素勒坦沙，獻逆賊霍集占首級，全部納款捷音。」¹⁵⁰ 針對巴（拔）達克山的配合清朝軍事行動，並安排派遣使臣朝覲，乾隆皇帝稍後又下諭旨，「應大閱八旗官兵，俾知天朝武備」，¹⁵¹ 其實去年甫舉行大閱，也是為了西域屬邦哈薩克遣使朝覲之事。¹⁵² 觀察《皇朝禮器圖式》武備門類，可謂是以大閱為核心所開列的各種服儀用具。武備首列甲冑，即以皇帝大閱冑甲展開；其次

147《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冊 216，卷 52，頁 507-513。

148（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6，頁 515-530。此部分描繪樂器的線條和圖說的抄寫字跡與前後明顯不同，亦是後來添入補述的證據。

149 此等外藩、諸部、外國樂曲仍見於清宮，包括蒙古樂曲、朝鮮國俳樂、瓦爾喀部樂、回部樂、番子樂、廓爾喀部樂、（安南）越南國樂、緬甸國樂等，參見（清）崑岡、徐桐等修，《（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樂部一，卷 527，樂部四，樂制三，陳設，頁 1085。樂章另參見清高宗敕纂，《笳吹番部合奏樂章滿漢合譜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冊 728。例如：〈緬甸獻琛抒悃樂章〉，頁 201-203；〈安南國王阮光平恭進獻琛抒悃樂章〉，頁 204-217；〈廓爾喀王拉特納巴都爾恭頌歌詞〉，頁 217-224，此內府精抄本，亦有複本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150《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599，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下庚子（二十三日），頁 699。

151《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599，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下庚子（二十三日），頁 702。「巴達克山遣使入覲，應大閱八旗官兵，俾知天朝武備，此時豫為操演方覺嫻熟，著派色布騰巴勒珠爾、扎拉豐阿管理。」

152《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570，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上壬辰（九日），頁 232。「又諭，適年久未閱兵，現右部哈薩克降服，俟來使到時，朕親大閱，示以軍容。所有應行豫備之處，著即辦理。」

開列各種武具，也是以大閱之橐鞬、弓、鈇箭、梅鍼箭、佩刀等展開。將武備劃入禮器門類，可謂是為了西域因素之於皇朝武功而設立的。

武備門類明顯地凸顯帝王之軍禮角色而存在，這點還可反映在《皇朝禮器圖式》武備門類收錄頗多乾隆皇帝御製、御用的器具。包括御用射侯箭、御用馬射靶箭、御用布侯、御用皮鵠、御用布鵠、御用馬射地球、佩刀等等。而火器之屬，除了御用火器，諸如御用虎神鎗、御用舊神鎗、御用花準鎗、御用大準鎗等等；更有諸多御製火器，御製金龍礮、御製制勝將軍礮、御製威遠將軍礮，以及御製自來火大鎗、御製自來火二號鎗、御製自來火小鎗、御製禽鎗、御製小禽鎗、御製奇準神鎗、御製準正神鎗、御製純正神鎗、御製連中鎗、御製應手鎗、御製威赫鎗、御製威捷鎗等等，數量相當驚人。御用武備應可反映乾隆皇帝個人的使用愛好，以及研發新式火器的興趣。

除此之外，武備門類還有不少族群特色可尋。在武備武具方面，則有厄魯特梅鍼箭、索倫鈇箭、索倫哨箭等。¹⁵³（圖 37）為何以厄魯特蒙古、索倫為名，圖說沒有特別說明；均視為「本朝定制」，介紹其形制。北京故宮博物院現存鐵簇白擋索倫長鈇箭，或為皇帝御用，惟此名不見於《皇朝禮器圖式》；¹⁵⁴（圖 38）回子鈇（披）箭數枝，長 102 公分，楊木杆，杆首飾黑桃皮，雕羽；附黃紙簽條：「高宗純皇帝御用回子鈇箭」。¹⁵⁵（圖 39）或許這些御用鈇箭是《皇朝禮器圖式》編纂過程中的漏網之魚。據北京故宮提供的展件介紹，認為厄魯特梅鍼箭、索倫鈇箭、回子鈇箭等都是仿自該部族的武器，此說尚待進一步考證。不過，這些名號鮮明的武備，也確有其象徵意義，除了八旗、綠營，東北勁旅的索倫部、天山北部伊犁地區的厄魯特、天山南部的回部，都是皇朝武備不可或缺的成員。應可反映清朝利用厄魯特、索倫兵丁在多次戰役效力甚多。清初以來即陸續出現厄魯特降人前來歸附，平準、平回戰役過程，清軍陣營也有許多厄魯特兵。¹⁵⁶

153《皇朝禮器圖式》，卷 14，武備二，武具一，頁 34、39、51。

154 引自 Ding Meng and Mae Anna Pang, *Golden Age of China: Qianlong Emperor, 1736–1795* (Melbourne, Australia: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2015), 20. 鐵簇白擋索倫長鈇箭的形制近似皇帝大閱鈇箭，惟仍有若干細節不同，例如箭簇部分，前者呈現六個鏤空小孔，後者則「金藻文」，見《皇朝禮器圖式》，卷 14，武備二，武具一，頁 11。

155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故宮博物院清代新疆文物珍藏展》（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頁 207。

156 鄭秋華，《清代索倫部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林士鉉，〈清乾隆年間厄魯特降人在內地——兼述琿春的厄魯特〉，收入藍美華主編，《邊民在內地》（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頁 135-188。

在武備火器方面，回礮是乾隆二十四年平定西域過程中俘獲的武器，「西師深入，屢得茲器，即用以擊賊」。¹⁵⁷ 這些俘獲軍器，後來收藏於紫光閣，以紀武成。另外，尚有回部花套鎗、新回部花套鎗，圖說注明「本朝制」，未說明由來。¹⁵⁸ 可能是回部進貢，或是戰事過程收剿的戰利品，這些標注回部的武器，確實是清朝將統治的範圍延伸至該地部族的證物。這正是上述臣工進表標舉的，「武庫攸藏，著天山之俘獲」。

在武備旗纛方面，首列皇帝行營所用，其次以得勝為題，開列靈纛共七種，全都是平定回部之役，卓有功勳的將領所配用。旗纛確實是軍禮的必須用品。首列定邊將軍兆惠「得勝靈纛一」，乾隆皇帝命尊藏紫光閣，特以香楠木盒盛裝，此櫃高二尺四寸縱二尺五寸 二尺一寸，「上鐫〈得勝靈纛周鑄御製詩並序〉，皆清、漢、蒙古、西番文，承以白石趺」。（圖 40）¹⁵⁹ 七種得勝靈纛之後，緊接著是八旗都統纛，依序開列八旗都統、佐領等成員所用，乃至健銳營、火器營、藤牌營，及駐防將軍、綠營等各級官員所用旗纛。這些旗纛和上述武具，包括皇帝大閱及行在駐蹕所用廬帳，從皇帝的至高角色到等差有別的整體武職，武備門類凸顯帝國軍禮的龐大陣容。

《御製增訂清文鑑》則把禮器、武功視為不同門類的知識系統，故旗纛、武具用詞並非併置一處。旗纛全部列入禮部鹵簿器用類，首先開列拂塵，及各種金質器，如金提爐、金香盒、金盆、金交椅等等詞彙，其後包括大刀、撒袋、豹尾鎗，各種傘、蓋、扇、幢、幡、旌、纛、旗，以及輅、輦、輜等等，¹⁶⁰ 基本上對應《皇朝禮器圖式》卷十至十二鹵簿門類的內容。

皇帝大駕鹵簿儀式需用數量龐大的旗幟，《皇朝禮器圖式》鹵簿門類以八旗驍騎纛、八旗護軍纛、八旗前鋒纛、青銷金龍纛四種為首，這和收入《御製增訂清文鑑》鹵簿器用類的八旗大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青銷金龍纛，名稱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內容對應。惟《皇朝禮器圖式》武備門類內，自皇帝及八旗各級武職於行營行圍所用的各種旗纛、靈纛，並不見於《御製增訂清文鑑》，後者只有纛、旗、蜈蚣旗等這類表示物品種類的基本詞彙。¹⁶¹ 可見區別身分、等差品級是《皇朝

157(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16，武備四，火器，頁 25。

158(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16，武備四，火器，頁 57、58。

159(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17，武備五，旗纛，頁 9-10。

160(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 232，卷 6，禮部，鹵簿器用類第一至第五，頁 173-184。

161(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 233，卷 9，軍器類第七，頁 301。

禮器圖式》所強調的，也是全書的基本理念。

倒是《御製增訂清文鑑》的〈補編〉，往往收入一些並非日用、僅出現在經典裡的特別用詞，均是乾隆年間新造的滿文專有詞彙，是為新時代的新詞彙。和本文主題有關的，像是〈補編〉軍器類也加入了制勝礮、金龍礮、沖天礮、發煩礮、神威礮、神功礮、神威無敵礮、德勝礮、子母砲等等，¹⁶² 重點挑選九種基本上可對應於《皇朝禮器圖式》武備門類最重視的幾種火器，即首先開列的，康熙皇帝御製金龍礮、御製制勝將軍礮、御製威遠將軍礮，崇德八年（1643）造神威大將軍礮，以及康熙十五年（1676）造神威敵大將軍礮等。¹⁶³《御製增訂清文鑑》的滿文釋文字數有限，仍刻意標注其尺寸、重量及火藥、彈丸重量，只是沒有明確說明使用目的，以及戰功記錄。省略歷史背景的描述，可以讓詞彙具有較為中性、近乎普遍存在的效果，但仍可視為受到《皇朝禮器圖式》的影響才出現的新式軍器詞彙。

《御製增訂清文鑑》的詞彙分類和目錄順序乃先文後武，接續卷七樂部、文學部之後，為卷八、九武功部。武功部的內容十分龐大，但是分項類目中並沒有武備類，但軍器類是武功部的重要組成，品種繁多，這部分主要對應《皇朝禮器圖式》的武備門類的武具。《皇朝禮器圖式》中的甲冑、弓、鈚箭（披箭）、梅鍼（針）箭、砲箭、哨箭、刀、長槍、籐牌、鹿角、自來火鎗等等武具，¹⁶⁴ 均可見於《御製增訂清文鑑》軍器類；¹⁶⁵《皇朝禮器圖式》首列的是皇帝大閱冑，冑，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也是首列的軍器，惟不寫冑，寫盔。相應的現象是，《皇朝禮器圖式》冠上御用之名的武備禮器，例如一系列的皇帝御用射侯箭、御用射鵠砲箭、御用馬射砲箭等等，都不在收錄範圍。推測原因和上述御製火器並不冠上御製之全名，也不提及戰功記錄相同。

說到武備一般容易連想到內務府的武備院，專門負責製作各種甲冑、弓矢、鞍轡、帳房等物件。¹⁶⁶ 武備院，滿文武備之意實指百工匠人之工巧，¹⁶⁷ 這也可說是內務府的重要特徵。因此，《御製增訂清文鑑》在軍器類之後，還有製造軍器類，開

162(清) 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補編)，冊 233，卷 1，軍器類第二，頁 346-347。

163(清) 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16，武備四，火器，頁 1-25。

164《皇朝禮器圖式》，目錄，卷 14，武備二，武具一，頁 5-9；卷 15，武備三，武具二，頁 9-13。

165(清) 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 233，卷 9，軍器類第一至第七，頁 289-301。

166 張德澤，《清代國家機關考略》，頁 186。

167(清) 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 232，卷 20，居處部二，部院類第七，頁 674。武備院，滿文讀如 faksi (巧工) jurgan (部院)；滿文釋文：uksin saca beri niru enggemu hadala maikan cacari i jergi jaka be weilere arara baita be alifi icihiyara ba be faksi jurgan sembi。

列軍器製作過程中所需的工具及相關術語，其後的撒袋弓韃類、鞍轡類，也是更為集中地收錄主題相關的詞彙，¹⁶⁸ 它們並不在禮器的範圍。

（二）儀器與西洋西域因素

由《皇朝禮器圖式》目錄裡記錄臣工對儀器門類的案語，可知原先僅收儀器十件，後來又擴充四十件，最終共收錄五十件存放宮中、不同來源的科學儀器，成為一項門類：

西法諸器萬里來航，仰承聖裁折衷而酌用之，皆足以佐參稽，供步算，于是推筭之法，益詳且備。臣等于《皇朝禮器圖式》舊文儀器十件，敬謹勘定外，恭檢內廷天文測量儀器三十七件，并御製地球儀及鐘表，通為四十件，增入編帙。¹⁶⁹

儀器門類首列康熙十二年（1673）敕造的西洋天文儀器：欽定天體儀、赤道經緯儀、黃道經緯儀、地平經儀、象限儀和紀限儀等六件天文儀器，以及康熙五十四年（1715）欽定地平經緯儀，合地平、象限二儀而為一器，連同後來乾隆九年御製衡撫辰儀，共八件置於觀象台。御製璣衡撫辰儀雖是西洋儀器，其圖說卻強調於傳統經史根據：「《尚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云：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臯陶謨〉：撫於五辰；孔傳云：撫順五行之時。」¹⁷⁰ 結合東西兩方的天文知識技術而成，儀器作為禮器，是禮經禮制之體用表現。

重視儀器主要是看重其「推筭之法」，包括中西儀器。中國傳統儀器雖是不可或缺，但除了「圭表」、「日影表」、「漏壺」三件中國傳統計時儀器，其餘全部是西方體系的觀測、計時和演示儀器。¹⁷¹ 《皇朝禮器圖式》特列儀器門類此舉非比尋常，郭福祥以「科學儀器的禮制化」詳析儀器門的形成過程，十分精闢。¹⁷² 我們仍可進一步討論儀器之於當時整體的知識系統，究竟是如何進行分類和定位，而比對《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分類定位，或可提供答案。

《御製增訂清文鑑》第七卷樂部列有樂類、樂器類二類，其後即是文學部，涵蓋了儀器。文學部的門類依序為：書類、文學類、文教類、文學什物類、儀器類、

168（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9，武功部二，軍器製造類第一至第四，冊232，頁302-309；撒袋弓韃類，頁310-311；鞍轡類第一至第二，頁312-316。

169（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目錄二，卷3，儀器，臣工案語，頁4。

170（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3，儀器，頁25-26。

171 郭福祥，〈《皇朝禮器圖式》編纂與乾隆朝科學儀器的禮制化〉，頁22。

172 郭福祥，〈《皇朝禮器圖式》編纂與乾隆朝科學儀器的禮制化〉，頁1-44。

數目類。¹⁷³ 儀器類接續在以文房用具等「文學什物類」之後，可謂是將之視為推筭之法的工具，「數目類」之前，也反映它作為精密算學、以數字表達實測結果的器具特質。另外，從目次標題及詞條、釋文，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的西洋特質，滿文釋文也著重略述該件儀器的功能，沒有提到任何有關西洋背景由來，彷彿已內化為固有的技術和知識。

到底什麼是儀器？《御製增訂清文鑑》儀器類首列「儀器」一詞，釋文說明儀器是審視天象、觀察節氣時刻、詳察遠近高低時，所用工具之總名，種類眾多，用處甚大；¹⁷⁴ 這說明它們都是工具。參考當代學者整理清宮收藏的儀器，按其功能分類，其中實用科學儀器是主要大宗，像是各種大型天文儀器、數學計算和測量儀器、繪圖器、望遠鏡等，這也等同上述《御製增訂清文鑑》對儀器的定義。其次是科學演示儀器，以形象演示測量結果，有助於一般人理解，及知識傳播，清宮也保存大量科學演示儀器，諸如太陽系儀、天球儀、地球儀、渾天儀、朔望入交儀、三辰公晷儀、月相演示儀等等；非常值得重視的現象是，除了天體儀之外，其他包括地球儀、三辰公晷儀、朔望入交儀等，均未收入《御製增訂清文鑑》中，由此也可判定這類演示儀器並非「真正的儀器」。第三，科學教育器具：例如硬木多面體模型、佛科擺模型、人體解剖模型等；也有寓教於樂，融入諸多科學成果的玩具，如洋鐵小飛機模型、木柄手搖風扇等等，有助於西洋科學在宮廷的傳播，曾伴隨著皇帝們對西洋科學的學習和認知。這類教育器具也未收入《御製增訂清文鑑》，原因同上。¹⁷⁵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儀器門類目錄的臣工案語，特別提到「地球儀」，此科學演示性質的地球儀，乃因應平定西域而來的製作，一如新繪製的輿圖。¹⁷⁶ 在討論此御製地球儀的重要性之前，得先從儀器門類五十種器具之首，天體儀，開始談起。天體儀也稱天球儀、渾儀，它的性質、地位正如圖說所述：「蓋渾天之全象，而諸

173(清) 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目錄，冊 232，頁 6-7。

174(清) 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 232，卷 7，文學部，儀器類，頁 236，滿文釋文：durungga tetun，儀器，abkai arbun be cincilara（審視天象），sukdun ton erin kemu be tuwara（觀察節氣時刻），goro hanci den fankala be kimcire de（詳察遠近高低時）baitalara agūra i uheri gebu（所用工具之總名），hacin geren（種類眾多），baitalan umesi amba（用處甚大）。

175 郭福祥，〈清前期宮廷西洋科學儀器的種類和來源〉，《Asian Studies》，3 卷 2 期（2015.12），頁 124-125。

176 御製地球儀見《皇朝禮器圖式》，卷 3，儀器，頁 27；清朝疆域擴張和輿圖繪製的關係研究，參見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郭福祥，〈《皇朝禮器圖式》編纂與乾隆朝科學儀器的禮制化〉，頁 25。

儀之用所統宗也」，¹⁷⁷ 換句話說，使用其他儀器所測的成果，都應整合由天體儀統攝呈現。(圖 41)

從《御製增訂清文鑑》的詞彙序列看來，儀器一詞之後是「周天球」，這顆球有什麼重要性，可做為第一個器具專有詞？它正是天體儀的核心球體；它的特色是：銅製器形圓，正中約六尺，外表仿天象，開列星宿，刻赤、黃道宮度。凡星宿所在之宮度，不需仰上審視，看此器即可知曉。¹⁷⁸ 有意思的是，《御製增訂清文鑑》的詞彙排序，把周天球置於天體儀之前，而《皇朝禮器圖式》並未將之獨立繪圖說明。由此亦可見，二書所收的儀器專詞考量不同，又如許多欽定、御製儀器，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均未說明其欽定、御製性質，僅純粹介紹器具的功能特色；所以，《皇朝禮器圖式》顯然著重欽定、御製禮器的地位。若問天體儀一詞它是否確指哪一件天體儀，則應該是指連同其他一起安置在觀象臺上的，包括康熙年間製作的赤道經緯儀、黃道經緯儀、地平經儀、象限儀、紀限儀、地平經緯儀，以及乾隆年間的璣衡撫辰儀等八件天文重器，此八件也全部收入《御製增訂清文鑑》；其滿文釋文說明器型、功能，但並未對於製作的概念、欽定的由來和地位多做說明，這或許是考慮這些儀器還可以複製。

參考《皇朝禮器圖式》欽定天體儀的圖說，可知當時如何看待古稱渾象，清代稱之天體儀、天球儀的特色：

謹按，《春秋文曜鉤》唐堯即位，義和立渾儀；《尚書·舜典·疏》云《揚子法言》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康熙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命監臣製天體儀，即古渾象也。鑄銅為球，以象天體。圍一丈八尺，兩端中心為南北極，貫以銅軸，刻黃赤二道，平分十二宮，布列星漢。其外為子午圈，週圍各浮天體球五分，兩面刻去極度數，東西兩極合成圓孔，以受天體之軸。其下為地平圈，週與子午圈同面，濶八寸，環渠為

177(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3，儀器，頁1。

178(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冊232，卷7，文學部，儀器類，頁236。gubci abkai muheliyen durunga tetun，周天球，滿文釋文：teišun i arahangge（銅製）durun muheliyen（器形圓）tondo ici ninggun jusuru（正中約六尺）oilo abkai arbun be dursukileme（外表仿天象），usiha tokdon be faidame（開列星宿），fulgiyan suwayan jugūn i gurung dulefun be folohobi（刻赤道、黃道宮度），yaya usiha tokdon i bisire ba i gurung dulefun be（凡星宿所在之宮度），wesihun cincilara be baiburakū（不需仰上審視），ere tetun be tuwame（看此器）saci ombi（可知），erebe gubci abkai muheliyen durunga tetun sembi（將此稱之周天球）。

界，外刻四象限度，及地平時刻方位，下施四足承以圓座。高四尺七寸，設螺柱以取平，子午正對處向西少闕，以受子午圈，半入地平下，半出地平上，自天頂設高弧帶，地平遊表以察諸曜，地平經緯度以時盤定於子午圈，設遊表於北極樞，令自轉以定日度，又能隨天體旋轉以指時，座下設機輪，使北極能高下。蓋渾天之全象，而諸儀之用所統宗也。

圖說提到的「鑄銅為球，以象天體。圍一丈八尺，兩端中心為南北極，貫以銅軸，面刻黃赤二道，平分十二宮，布列星漢」，這段指的即是上述「周天球」。整合了周天球、子午圈、地平圈，即合為天體儀，全面展示渾天之全象。北京故宮博物院現藏金嵌珍珠天球儀，約製作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黃金做的模型、天球球體則使用珍珠鑲嵌 28 星宿、300 個星座和 2200 多顆星，如此奢華的手筆也足以顯示乾隆皇帝對天球儀的重視。¹⁷⁹（圖 42）

再回到地球儀（圖 43），雖然在《御製增訂清文鑑》顯示的儀器知識系統裡沒有地球儀，但它確實是《皇朝禮器圖式》儀器門類的一大特點。關於清宮收藏的地球儀，至少順治、康熙年間都有製作並留存至今，¹⁸⁰ 地球儀圖說並沒有特別追溯清宮之前的製作與收藏，直接以「皇上御製」切入，這位皇上當然是乾隆皇帝：

謹按，地球儀為皇上御製，規木為球，以象地體。圍四尺五寸，兩端中心為南北極，貫以銅軸；腰帶赤道，斜帶黃道，平分三十六分，每分占十度。布列中國及蒙古、準、回諸部落，海外諸國，靡不咸具。外正立為子午圈，面刻三百六十度；座面為地平圈，列地平度外列十二時九十六刻，皆鑄銅為之。承以圓座，高二尺四寸七分，北極上加時盤，以京師為準，旋之知各處時刻，及日出入地平度，所以配天體儀，益足驗聖朝聲教訖於無外云。¹⁸¹

圖說沒有引述任何經典。使用有限的字數仔細描述此器的材質、尺寸，以及球體、銅軸、地平圈、子午圈等組成結構。此外，最重要的訊息是，凸顯天下地表之萬國

179 北京故宮博物院，鐘錶儀器，<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clocks.html>；金嵌珍珠天球儀，<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clock/232514.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楊鳴濤，〈清乾隆金嵌珍珠天球儀的天文學考察〉，《文物天地》，2016 年 1 期，頁 84-87。

180 順治朝地球儀，高 19 公分，座徑 34 公分，球徑 10 公分；康熙朝地球儀，通高 135 公分，球徑 70 公分，清宮舊藏，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參見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clock/233806.html>、<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clock/228931.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8 日）。

181（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卷 3，儀器，頁 27。

成員的文句，「布列中國及蒙古、準、回諸部落，海外諸國，靡不咸具」。中國和海外諸國並稱，蒙古、準部、回部則是特別被標舉的部落，他們此時可以列入清朝的藩部系統。

再者，此地球儀還有什麼特殊功用呢？圖說末段提到，「以京師為準，旋之知各處時刻，及日出入地平度」，也就是以帝都京師的時間做為全球唯一的標準時間，透過此地球儀可以測知地球上任何角落的時間和地平座標，雖然同樣是以中國、帝都做為天下中心，卻具體以精準數字展現，超越傳統想像的新天下觀。據此意圖，《時憲書》裡原已納入朝鮮、琉球、安南等屬國，復添加回部各城之職貢新成員，¹⁸² 未來似乎還有機會再度擴張；故臣工進表結語「瀛海方州之內，遵律度于無疆」，亦十分合理。另據郭福祥分析將儀器列入禮器範疇的歷程，此舉與傳統整理禮器的成果不同，「但也反映出乾隆朝君臣面對新的歷史變化和世界格局所做出的回應。」¹⁸³ 從儀器到禮器，確實反映新天下觀的形成。

圖說最後提到的是，此地球儀的製作和存在目的，正是為了要搭配「天體儀」。而結合二者要呈現什麼景象？思考此處頗有新意的說法，答案很可能是正因為如此結合，即掌握住「地球」和「天球」，如此一來「益足驗聖朝聲教，訖於無外云」，此處的無外無別已非單指「天下」的國境內外，也包括有關「天上」的領域。

儀器與武備分別對應於西洋和西域因素，這二類成為乾隆年間新式禮器的新門類，然而並置西洋與西域於一部著作，並非沒有其他例子。進一步對比《皇清職貢圖》，也有助於理解《皇朝禮器圖式》收入儀器、武備的意義。《皇清職貢圖》其實也有著和儀器、武備可對應用的西洋與西域內容。

（三）儀器與武備、西洋與西域

職貢是指交納地方土特產貢物，藉以維繫清代中國官方和沒有直接管裡的外國屬邦及境內邊民之關係。清代中國的職貢關係網絡包括了西洋歐洲，而西洋不僅是成員，也是重要的「因素」，於諸多領域層次扮演重要角色。關於《皇清職貢圖》的西洋因素，據賴毓芝的研究，我們已經可以得到充分的認識，包括男女一組成對的構圖、重視細緻質感和光影效果的西洋折衷畫法，所帶來前所未有的視覺效果；

182 參見王元崇，〈清代時憲書與中國現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5期，頁185-203。

183 郭福祥，〈《皇朝禮器圖式》編纂與乾隆朝科學儀器的禮制化〉，頁22。

又，其西洋已不再是明代所指的南中國海周圍的國家，而是現代意義下的歐洲各國；觀察卷本《皇清職貢圖》第一卷裡共計七十對組員，包括五十四個外邦藩屬，西洋部分即佔有十二組對（圖 44），而他們更化為和〈皇清職貢圖〉同時繪製的數種〈萬國來朝圖〉裡的集體朝貢國（圖 45），這些表現可說是歐洲各國進入中國所建構的世界體系的里程碑，這個新世界相較之前的職貢圖像，在數量與精確度上，都有一個「西洋的轉向」，的確是不同於傳統職貢主題圖像的創新。¹⁸⁴ 具體表現從傳統的天下到「萬國」林立的新天下。¹⁸⁵

〈皇清職貢圖〉的西洋人以冠上大西洋、小西洋區域名稱的群組，及英、法、俄、荷蘭、喘國等名稱出現，圖說多是拼湊片段資訊而成的內容，其中一組「大西洋國夷僧女尼」，對象相對明確，指的是教皇管理的天主教教士、修女，該組圖說：「凡通曉天官家言曾遊京師者，皆留髭鬚，解華語，能制儀器。」（圖 46）¹⁸⁶ 此處所謂的「天官家言」，意即天文之道，這便也解釋清宮中大部分西洋儀器的由來。

卷本〈皇清職貢圖〉第一卷裡的外邦屬國，除了亞洲、歐洲以外的，即是包括西藏、伊犁、回部、中亞等二十八組廣義的西域群體，他們同樣被挑選畫入〈萬國來朝圖〉。如此一來，西洋和成員更多的西域，作為絕對性多數的主體，加上傳統職貢圖的亞洲部分，成為當時所認知的職貢體系的全部，這是一種和傳統十分不同的「新」天下的表現。一如《圖式》裡的西洋儀器，它們被運用於天文曆算及地理繪測，乃至於「新」天下、地球世界裡清朝中國的位置，同時也界定有關皇朝的天時現象和地理空間的許多規範。

〈皇清職貢圖〉所表現的西洋、西域觀點的形成特徵，值得進一步比較，限於本文主題，此處只能略述重點，就繪製〈皇清職貢圖〉以徵實和親睹其人為方法來

184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 期（2012.3），頁 1-76。卷本卷一之七十對組員，圖次清單參見莊吉發，〈謝遂滿漢文《職貢圖》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頁 2-4，「清代謝遂職貢圖畫卷、皇清職貢圖卷次對照表」；七十組員整併一國多組的現象後，合計得五十四個外邦藩屬及十二組對西洋人，參見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頁 45-47，「《職貢圖》絹本與《萬國來朝圖》諸本國名對應表」。

185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 67-91。該書專章處理利瑪竇來華前後中國人關於異域的知識資源及變化。

186 莊吉發，〈謝遂滿漢文《職貢圖》圖說校注〉，頁 77。「凡通曉天官家言曾遊京師者，皆留髭鬚，解華語，能制儀器。」對應的滿文圖說：yaya（凡）abkai šu i doro be（將天文之道）ulhire（通曉）gemun hecen de jihe urse（前來京師之人）gemu（皆）salu sulabumbi（蓄鬚），dulimbai gurun i gisun be（將中國之語言）ulhimbi（通曉），durungga tetun（儀器）be weileme bahanambi（會製作）。

說，相較於清朝和西洋各國的直接接觸十分有限，¹⁸⁷對於西域則以武力及朝覲形式的直接接觸則較為頻繁，因此前述的賜冠服現象，一直施用於來自西域的使臣。

而《皇朝禮器圖式》儀器門類其西洋因素突出，西洋儀器數量上相對龐大，部分是清宮審酌自製，又兼容少量中國傳統儀器，做為六門禮器之一，獨立的門類尤其完全表現了西洋的分量。

清朝的西域如何形成？〈皇清職貢圖〉是否也有西域因素？這裡從其成員組成觀察，就製作緣起以及繪製過程中擴編而顯見的決定性因素略加說明，更完整的論述則需要另文處理。據《四庫全書總目》的簡要介紹可知〈皇清職貢圖〉是歷經數次擴編、補繪而成：

乾隆十六年奉勅撰。以朝鮮以下諸外藩為首，其餘諸藩、諸蠻，各以所隸之省為次。會聖武遠揚，勘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河源月窟之外，梯航鱗集，琛賁旅來，乃增繪伊犁（按：此伊犁不等同於厄魯特、準噶爾）、哈薩克、布魯特、烏什、巴達克山、安集延諸部。共為三百餘種，分圖系說，共為七卷（按：最終刻本為九卷），告成于乾隆二十二年。

迨乾隆二十八年以後，愛烏罕、霍罕、啟齊玉蘇、烏爾根齊諸部咸奉表入覲；土爾扈特全部自俄羅斯來歸；雲南整欠、景海諸土目又相繼內附，乃廣為續圖一卷。每圖各繪其男女之狀，及其諸部長屬眾衣冠之……。¹⁸⁸

由此可知〈皇清職貢圖〉的擴編是因應「勘定西域」而來的結果，原來已經準備要結案的職貢圖像蒐集計畫，因為平定準噶爾汗國、回部而決意進行擴編。

上述提到的《皇清職貢圖》勅纂於乾隆十六年（1751），是個籠統的說法，據前輩學者的研究，正式執行計畫應為乾隆十五年，之後清宮檔案中出現記錄為「番圖」、「職方會覽」之稱的圖像，一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後才固定以〈職貢圖〉稱之。¹⁸⁹乾隆二十八年是上述中亞各藩屬愛烏罕、霍罕、啟齊玉蘇、烏爾根齊等諸部入覲來朝的時間點，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因為西域因素，使這個長期執行的、十分龐大的皇朝職貢體系成員的蒐集計畫，正式將完成的圖譜作品定名為「職貢圖」。此一成立歷程除了時間點接近，也和《皇朝禮器圖式》從各別門類蒐集繪

187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頁 36-37。

188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皇清職貢圖九卷》，冊 2，卷 71，史部，地理類四，頁 539-540。

189 相關學者包括莊吉發、畏冬、賴毓芝等人的研究，參見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頁 6-16。

編，到彙為一帙，以冊頁形式及刊印出版一致。

值得追問的問題還有如果沒有此舉，卷本〈皇清職貢圖〉第一卷的成員除了歐亞外國藩屬之外，其最後的成員究竟為何？十分可能是西藏，最多包括哈密回人，最確實的可能成員雖不能再此細論，可以確定的是，一如《皇朝禮器圖式》重視乾隆二十至二十四年二次平定準部及回部的武功所表現的西域因素，才擴編了一倍左右的職貢成員，使得西域成為新天下、萬國來朝訴求所不可或缺的重點。

又從內府刻本〈皇清職貢圖〉全書卷次來看，刻本分作九卷，其中第一、第二卷對應卷本第一卷，刻本卷一是由亞洲東部、東南亞及歐洲成員組成，而第二卷成員包括西藏、伊犁、回民及周邊屬邦部族，共同組合成一個數量龐大的「大西域群體」，將之獨立成卷。也顯示了這個大西域群體是個能夠和全部的東亞、歐洲各國加總，而具有同等分量的群體。如此一來，西洋和成員更多的西域，構成絕對性多數的主體，加上傳統職貢的亞洲成員，總合為當時所認知的職貢體系的全部，換言之，新天下、地球萬國幾乎是可以和職貢體系重合。

將〈皇清職貢圖〉與乾隆年間繪製多次的〈萬國來朝圖〉其中的西域成員相對照，除了哈薩克、布魯特、烏什、庫車、阿克蘇、拔達克山、安集延等，是二者共通的西域成員，前者還把到伊犁貿易的各地回人也列為一個組對，¹⁹⁰內文描述包括阿克素、庫車、葉爾奇木（葉爾羌）、喀什噶爾、呼騰（和闐）等五種回人，他們是從天山南路往北到伊犁地區的貿易商人，後者在朝貢者的旗幟上顯示的部族，還包括葉爾羌（葉爾奇木）、喀什噶爾（喀什噶爾）、和闐、哈爾沙（哈爾沙爾、哈爾沙國）。¹⁹¹總之，二者的西域成員幾乎是重覆的。

若據《皇清職貢圖》臣工跋語，該計畫構想應可追溯到乾隆十三年，第一次金川之役期間：

乾隆歲戊辰（乾隆十三年）王師平定金川，皇上念列朝服屬，外臣式增式擴，爰敕所司，繪職貢圖，以詔方來，而資治鏡。¹⁹²

雖然，時至乾隆十四年第一次金川之役才結束，此計畫也應是乾隆十五年才實際執

190 莊吉發，《謝遂滿漢文《職貢圖》圖說校注》，頁135，伊犁塔勒奇察干烏蘇等處回人。

191 北京故宮博物院物現存四軸〈萬國來朝圖〉，圖中顯示的諸多朝貢屬邦名單，見參見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頁45-47，「《職貢圖》絹本與《萬國來朝圖》諸本國名對應表」。哈爾沙（哈爾沙爾、哈爾沙國）應即喀喇沙爾（今焉耆縣）；喀什哈爾（喀什噶爾）應即喀什噶爾（今喀什市）。

192 《皇清職貢圖》，〈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94，頁727。

行。但是，乾隆皇帝想進一步認識這些包括後來收入《皇清職貢圖》內的外邦藩屬、境內邊民成員的強烈意欲，仍可以追到乾隆十三年。當時，曾諭令四譯館進行境內域外各種語言文字的廣泛採訪計畫：

諭：朕閱四譯館所存外裔番字諸書，雖分類音譯名物，朕所識者，西番一種，已不無訛缺。因思象胥靺譯，職在周官；輶軒問奇，載於漢史。我朝聲教四訖，文軌大同，既有成編，宜廣為搜輯，加之核正。悉準重考西番書例，分門別類，彙為全書。

所有西天，及西洋各書，於咸安宮就近查辦；其暹羅、百夷、緬甸、八百、回回、高昌等書，著交與該國附近省分之督撫，令其採集補正。此外，如海外諸夷，並苗疆等處，有各成書體者，一併訪錄，亦照西番體例，將字音與字義，用漢文注於本字之下，繕寫進呈，交館勘校，以昭同文盛治。著傳恒、陳大受、那延泰總理其事。¹⁹³

上諭同樣以經史為據，要求將蒐得各種譯語「分門別類，彙為全書」，此成果可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會同四譯館譯語》42種71冊（圖47），¹⁹⁴ 但是否已是「全書」，目前不得而知，乾隆年間終究沒有出版過上諭所提到諸多外國譯書詞書。這個針對境內邊民和域外諸夷之語文的蒐集計畫，似可對應稍後不久的職貢計畫，其實「分門別類，彙為全書」也可說是《皇清職貢圖》和《皇朝禮器圖式》成立的歷程簡稱。雖然這時的西域還未入版圖，但因為對西番（西藏）存有特別情感，基於宗教信仰，同時也是乾隆皇帝有興趣學習、可識讀的非滿非漢之「外語」，故以校訂後的西番譯語為整理標準，「照西番體例，將字音與字義用漢文注於本字之下，繕寫進呈，交館勘校」。無論如何，此舉可顯見的西域因素已十分強烈，且同時關注了西天印度、及西洋各國。但最後落實出版的，只有滿、蒙、漢、藏文《御製四體清文鑑》。¹⁹⁵（圖48）更多語文種類的出版品是在四體之上，加入回部文字

193《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324，乾隆十三年九月上壬戌（十一日），頁352-353。

194《會同四譯館譯語》，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原存軍機處方略館。此譯語也屬分類詞典，42種譯語包括：1. 英、法、拉丁、意、葡、德及西天（梵文）譯語7種28冊，每種收字730至2094個。2. 緬甸、暹羅、蘇祿、琉球譯語4種8冊，每種收字282至1232個。3. 西番譯語（藏語）1種5冊，收字2123個。4. 川番譯語9種9冊，每種收字700多個，均系四川省松番、龍安、茂州等地西番語種。5. 保羅譯語5種5冊，每種收字280至740個。6. 雲南耿馬、焚夷、車裡、猛麻等17個地區民族譯語13種13冊，每種收字338至806個。7. 廣西省慶遠府、鎮安府、太平府屬地民族譯語3種3冊，每種收字71至170個。見<https://www.dpm.org.cn/ancient/nation/120753.html>（檢索日期：2020年6月1日）。

195目前所知《御製四體清文鑑》（乾隆五十九年）版本至少尚存乾隆年間武英殿刻本、嵩祝寺天清番經局刻本，後者題名為《四體合璧文鑑》，參見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

和托忒蒙文的《西域同文志》，¹⁹⁶也反映了相較於「西洋」文字，「西域」文字在乾隆朝受到更多的關注。

七、結論

乾隆朝君臣對於甫校勘完成的《皇朝禮器圖式》有如是定位：「稽古史志所莫臻，更說禮諸家之未有」，¹⁹⁷意思是說這部書超越了過去所有典制史書的記載，同時更新歷代禮經學者所沒有說明清楚的部分。具有如此地位的新圖式與圖說內容，很大一部分應該就是其中的滿、蒙、西域、西洋等因素，可用非漢因素概括之。這一點乾隆朝君臣也不曾隱諱，只是隨著時間流逝，後代已未必完全知曉。乾隆初年的大閱、木蘭秋獮、首次東巡盛京祭祖等等大規模活動，都是滿洲特色的儀式活動，也都需要滿洲特色的禮儀、禮器。而現實中的滿洲統治特色，也就反映在當時各種禮制改革中的非漢因素，見諸於《皇朝禮器圖式》。而既然《皇朝禮器圖式》還可以代表滿洲傳統、滿洲精神，這些非漢因素在清朝官方的整合下，似乎正通往、過渡到所謂的滿洲文化的內涵，企圖以滿洲之名涵攝多元文化。對於滿洲文化的重整也幾乎是貫串乾隆朝政治文化的特徵，在乾隆十三年正式改革祭器行動之前，落實滿洲祭器典制的《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已經出版，即便其中也有不少非滿因素，尤其後來還譯成典雅的漢文本收入《四庫全書》，也都無損於把它視為滿洲文化發展的新里程碑。

回顧有關《皇朝禮器圖式》計畫和成書的過程，其中的關鍵年代，乾隆十三

滿文編輯部編，《北京地區滿文圖書總目》（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頁78。《御製四體清文鑑》是在先前的《御製清文鑑》（康熙四十七年，1708）、《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康熙五十六年，1717）、《御製滿蒙文鑑（蒙古清文鑑）》（乾隆八年，1743）、《御製增訂清文鑑》（乾隆三十六年，1771）、《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乾隆四十五年，1780）等等字書的基礎上，再加入藏文，但清文鑑系列的官方出版品也止於此；此外，尚有加入回部文字的《御製五體清文鑑》（乾隆五十六年，1791），並未刻印出版。諸本清文鑑概況參見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頁156-168。乾隆年間編印的包括了藏文的多語種詞書，還有《五譯合璧集要》，是一部對照滿、蒙、漢、藏、梵音（以藏文經咒字母標注）的佛教類詞書，版本參見《北京地區滿文圖書總目》，頁62-63。

196《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冊1，卷41，小學類二，頁858-859。提要說明該書於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是一部分門別類的譯語對照詞書，「其部族之別，曰天山北路，曰天山南路，曰青海，曰西番。其門目之別，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其文字之別，首列國書，以為樞紐；次以漢書詳註其名義；次以三合切音取其音聲；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連綴，各註其譯語、對音……。」

197（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福隆安、于敏中、王際華進表，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初五日，頁3。

年無疑是最重要的時間點，除了祭器，這一年在諸多領域，像是滿蒙漢藏等多元語言文字、璽印用的滿漢篆字等大規模的規制化，成為時代方針；乾隆十五年，設立武英殿禮器館，從祭器改革通向六大門類的禮器定制，繪圖工作成為主要業務；乾隆二十四年宣諭平定回部之役，西域新疆納入版圖，西域因素也成為時代重要因素；乾隆二十九年校勘彙編一帙的《皇朝禮器圖式》於乾隆三十一年完竣，而諸本彩繪本仍持續作業。固然前代前朝的祭器有其影響作用，康、乾年間長時期、不間斷進行禮經研究其實至為重要。康、乾年間如何掌握古典禮制？有何特殊處理？其一是疏解歷代禮制典籍，其二是翻譯滿文。乾隆皇帝充分掌握禮經禮制的體用原則，各種改革皆依據經典理論，以簡化的「夏收殷尋，本不相襲」做為理論依據，除了更新、規範滿洲傳統祭禮，面對漢文化，則堅持滿洲的衣冠特色。又如將武備、儀器二門類納入禮器系統，也諸如祭天匏爵、木質俎、玉質白璧等等，乃至於有關表達新天下、地球萬國的天體儀、璣衡撫辰儀等等新制禮器，都訴求經典依據。他的〈御製繙譯禮記序〉依循「禮之體，以敬為本；禮之用，以和為貴」，反映他把握依據經典而來的體用原則，乾隆十三年之後各種圖像蒐集及繪圖工作差不多同時展開，也是表現經典的實用性功能。長時期、階段性的滿文《五經四書》翻譯，也就是解經性質的學術工作。事實上，乾隆朝君臣也曾認為，《五經四書》的滿文譯本是中國向域外傳播聖學義理的機會所在，一如佛經譯本之東傳。¹⁹⁸

從禮制知識系統，從滿洲的角度來看，祭祀和其器用可具體分成兩個系統，其一是所謂的三代以降的禮制傳統，其次則是滿洲薩滿祭祀傳統，乾隆年間先處理了滿洲系統祭器。《皇朝禮器圖式》以及《滿洲祭神祭天典禮》選用的滿洲因素，顯然不全是原生態、入關前的女真滿洲文化禮制形態，而是以滿洲為考量的態度與取向。在乾隆朝的禮制改革過程中，不間斷地以滿洲之名，滿洲文化的內容也更新了。

《皇朝禮器圖式》重視滿洲、蒙古因素還進而發展為強調西域新疆因素。四庫提要說明《皇朝禮器圖式》於乾隆二十四年奉敕纂，尤其御製序的題寫時間也在同年，這固然是過度簡化的說法，但也可視為刻意之舉，刻意造成和是年武功告成、宣諭中外連結一體的歷史記憶。如果不是學者們梳理史料，比較版本，進行多視角的考察，以還原整個禮器革新的複雜過程，還會是以乾隆二十四年做為《皇朝禮器

198《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繙譯五經五十八卷 四書二十九卷》，冊1，卷33，經部，五經總義類，頁673-674。

圖式》完成時間點。《皇朝禮器圖式》特載中和韶樂所用的特製鑄鐘、特磬，都在平定西域之後執行，更有許多凸顯平定回部使用的諸多軍用旗幟、槍炮火器等令人頗為尷尬的新式禮器，成為記錄的重點。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乾隆皇帝御製的地球儀，所要特別標注的是甫入版圖的準噶爾部、回部新疆，此地球儀是乾隆二十四年征服回部，將新疆西域收入版圖後的傑作。冠服賞與準噶爾和西域屬邦使臣等，即將禮制推及新疆西域，儀器代表西洋，儀器的功能是在利用武備平定西域之後，代表渾天全象的天球儀也有了連結應用的新對象，同時進行展現新版圖的地圖繪製，並且以地球儀進行展示，西洋儀器其實和西域因素關係密切。西域加上西洋，一如彩繪卷本《皇清職貢圖》卷一的成員集合，如此才能夠真正表現萬國來朝的盛況。因為，在前朝已建立關係的外國群體基礎上，惟有加入了西洋各組成員，尤其是甫入版圖、受賜冠服的一大批西域屬邦各部，大清才是居於地球萬國的中央之國，而這才是名實相符的「中國」。

差不多時間成立的「皇清職貢圖」計畫，無論是外國屬邦或境內邊民，均以圖像圖說具體呈現他們和清朝的聯繫，《皇朝禮器圖式》也呈現一如《皇清職貢圖》的新天下觀，可謂非常有企圖心。且看現存《皇清職貢圖》各長卷本卷一的引首御題，「蘿圖式廓」，蘿圖意指羅列圖籍、疆域版圖，式廓意指規模，這裡的疆字規模，直接針對甫入版圖的西域新疆，而對於圖中於當時沒有正式官方往來的日本，或歐洲各國，所謂的入版圖雖然沒有實質意義，卻也反映欲接收過去有著職貢事實的成員，以及當前絕對不可或缺의 西洋。至於未來呢？前引四庫提要說明《皇清職貢圖》：「自今以往，占風驗海而至者，當又不知其凡幾。珥筆之臣，且翹企新圖之更續矣。」這表示寄望於往後和萬國接觸的過程中，未來的《皇清職貢圖》還會續編。因此，基於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流動，也基於大清到當下為止的經驗，未來還是可能建立關係，使之成為某種架構裡的內部成員。

我們是否可以認為，《皇朝禮器圖式》也是一部試圖利用圖像展示清朝和外邦部族已經建立某種形式的職貢關係的作品，進而傳達將這些職貢成員禮制化、內部化的企圖呢？例如，《皇朝禮器圖式》的宴樂樂器，在刻本出版後，仍增補若干外國樂器，並及時收入四庫本《皇朝禮器圖式》，這是對境內、體制內部的成員而言。對於境外，目前沒有看到《皇朝禮器圖式》賞賜給外邦的記錄，《皇清職貢圖》還有事例可尋。¹⁹⁹

199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1991），冊4，卷98，志

是否因為西域因素的影響過於立即與強烈，致使西洋因素固然絕對不可或缺，但卻沒有更多成果？即便在乾隆十三年早已進行四裔族群語言材料的蒐集整理，但是這些語料並沒有成為《皇清職貢圖》圖說內容的重點描述面向，也只有很少數的族群，例如在帝國的東西兩端，東北地區的族群和西域的巴達克山，被提到了他們說的是什麼土語。²⁰⁰相較於清朝懷有強烈情感的西域西藏語文出版品，西洋語言似乎不在官方的視線內，就在乾隆皇帝的八旬慶典裡，英吉利代表馬戛爾尼一行人萬里而來，仍苦於翻譯溝通之障礙，使得乾隆皇帝失去觀察西洋人的耐心。²⁰¹

《皇朝禮器圖式》的規範如果說有對外施用的現象，也許只有將衣冠賞賜於外邦，但也只及於西域，雖然是清朝的強勢作為，主要利用朝覲賞賜的機會進行，至於為何所謂滿洲風格的衣冠是西域可以接受的，也應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因為對於繼承明朝以來衣冠傳統的各國，如朝鮮、琉球、安南等，清朝也同樣謹守一貫性的衣冠不可變異的原則，不要求外邦使臣前來朝覲時改用清朝衣冠，因此，據葛兆光的研究，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乾隆皇帝八十壽辰的慶典裡諸多外邦使臣，十分受到乾隆皇帝重視的安南新政權阮光平君臣，一改傳統明代以來的漢制衣冠，欲使用在內地購製的蟒袍，以應朝覲服儀之需，這引起乾隆皇帝的強烈關切，反覆確認其意圖及所謂蟒袍體式，安南此舉也引起朝鮮使臣的鄙視批評。²⁰²乾隆皇帝最在意的，其實是憂慮被安南及其他屬國誤會為強令更換服式，²⁰³免除了這層疑慮，才同意安南國王換上新衣，在慶典場域內外穿搭新樣衣冠，反映清方和外國均存在彈性處理的空間。²⁰⁴但現實的情況是，進入後乾隆時代，〈皇清職貢圖〉僅在

七一三，禮十（賓禮），頁2839。「初，琉球、安南、暹羅諸使來，議政大臣咸會集，賜坐及茶。乾隆初元，諭停止。時屬國陪臣增擴，敕所司給皇清職貢圖，以詔方來。」《清史稿》此說所據又有何根據，尚待進一步考察。筆者初識此筆史料見於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頁24；惟引文中的「諭停止」是否確是不再賜坐及茶，又是否與議政王大臣有關，亦有待討論。

200 鄂倫綽、奇楞、庫野、費雅喀、恰喀拉、赫哲、七姓等關東七族中只有鄂倫綽、費雅喀沒有說明其語言，見林士鉉，〈極東邊民：《皇清職貢圖》裡的庫野〉，《民族學界》，45期（2020.4），頁107-158。莊吉發，〈謝遂滿漢文《職貢圖》圖說校注〉，拔達克山回目，頁143。

201 王志宏，〈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3期（2019.3），頁97-145。

202 葛兆光，〈朝貢、禮儀與衣冠——從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國王熱河祝壽及請改易服色說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2期，頁1-11。

203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53，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下甲戌（二十四日），頁127。

204 例如，乾隆皇帝對於照例賞給親王品級之外，還可由他自己決定加恩給予皇子品級的冠服，並非有一個絕對的準則，在反覆確認國王阮光平改用清朝衣冠的意願之後，「該國王若果實有此意，朕必格外加恩，錫之章服，不但照親王品級，給予紅寶石帽頂，四圍龍褂，並當如阿哥服色，賞給金黃蟒袍，用示優異，該國王聞之，自必倍加欣躍。」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49，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下戊寅（二十七日），頁61。同時也容許安南君臣使團或安南或大清「兩用」其服儀，「諭軍機大臣曰……，朕意其國俗尚沿漢制，衣服及蓄髮，斷不

嘉慶八年（1803）因應安南亡國，阮映福新政權請求清朝封號，乃改安南國為越南國，²⁰⁵ 故稍後於嘉慶年間的繪本、刻本〈皇清職貢圖〉亦增補了這一個新成員，也是最後一個。²⁰⁶ 對外擴展新的職貢成員，並且推廣《皇朝禮器圖式》的影響力，之於清代中國終究是一個沒有完全實現的文化理想。

無論如何，乾隆時代統合諸多族群因素的禮樂政治文化，其規模手筆、動員能力，及複雜的連結和影響層面還是值得多加深究。

〔後記〕本文初稿發表於 2019 年 8 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別感謝馬雅貞教授的評論建議，以及與會學者無論就個別專題或整體《皇朝禮器圖式》之理解，提出許多專業性及啟發性意見，筆者獲益甚多。感謝兩位審稿人細心校正，提供修訂建議。惟文中如有任何錯誤，筆者當自負全責。

可改，若兩用之，實亦無妨，著福康安酌量情形……。」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49，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下戊寅（二十七日），頁 59。

205《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111，嘉慶八年四月上庚午（六日），頁 480-481，上諭軍機大臣，有關改名越南的考量；卷 115，嘉慶八年六月下己丑（二十六日），頁 528，上諭內閣，詔告改安南國為越南國，封阮福映為國王。

206 參見畏冬，〈嘉慶時期《皇清職貢圖》的再次增補〉，《紫禁城》，1993 年 1 期，頁 44-46。對於嘉慶年間《皇清職貢圖》僅增收入越南一國的官民的現象評論，參見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頁 44。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宋) 聶崇義集注,《新定三禮圖》,通志堂藏板,康熙丙辰(十五年)納蘭成德序,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本。
- (明) 徐一夔等奉敕撰,《大明集禮》,嘉靖九年六月望日御製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刻本。
- (清) 允祿、蔣溥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656。
- (清) 允祿、蔣溥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 (清) 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657。
- (清) 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內府滿文刻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清) 允祿等奉敕纂,《御製律呂正義後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216。
- (清) 屯圖,《一學三貫清文鑑》,乾隆十一年,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本。
- (清) 弘晝、鄂爾泰等奉敕纂,《日講禮記解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123。
- (清) 永瑤、紀昀等奉敕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2。
- (清) 沈啟亮,《大清全書》,康熙二十二年,京師宛羽齋刻本,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 (清) 崑岡、徐桐等修,《(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
- (清) 張玉書奉敕纂,《御定康熙字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229-231。
- (清) 清高宗,《御製盛京賦》,中央民族大學藏滿文刻本。
- (清) 清高宗敕纂,《五體清文鑑》,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 (清) 清高宗敕纂,《筳吹番部合奏樂章滿漢合譜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冊 728。
- (清) 清高宗敕譯,《欽定繙譯五經四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185-189。
- (清) 清聖祖敕纂,《御製清文鑑》,康熙四十七年,柏林國家圖書館藏。
- (清) 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185-189。

- 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232-233。
- （清）嵇璜奉敕撰，《皇朝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642-643。
- （清）嵇璜奉敕撰，《欽定續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639-641。
- （清）劉順、桑格編，《廣彙全書》，康熙四十一年，柏林國家圖書館藏。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閣全宗》。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軍機處全宗》。

近代論著

- 王元崇，〈清代時憲書與中國現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 5 期，頁 185-203。
- 王志宏，〈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3 期，2019 年 3 月，頁 97-145。
-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滿文編輯部編，《北京地區滿文圖書總目》，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 安雙成，《滿漢大辭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
- 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 余慧君，〈遵律度於無疆：《皇朝禮器圖式》樂器卷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3 期，2020 年 5 月，頁 95-134。
- 吳曉筠，〈孔廟與乾隆朝祭器的設置〉，《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2 期，2020 年 4 月，頁 93-134。
- 李訓詳，〈納兵於禮——中國古代軍禮的形成〉，收入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編，《溝通與協作：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成立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學術出版部，2020，頁 341-372。
- 林士鉉，《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
- 林士鉉，〈清乾隆年間厄魯特降人在內地——兼述琿春的厄魯特〉，收入藍美華主編，《邊民在內地》，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頁 135-188。
- 林士鉉，〈極東邊民：《皇清職貢圖》裡的庫野〉，《民族學界》，45 期，2020 年 4 月，頁 107-158。
- 林存陽，《三禮館：清代學術與政治互動的鏈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 邱源媛，《清前期宮廷禮樂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畏冬，〈嘉慶時期《皇清職貢圖》的再次增補〉，《紫禁城》，1993年1期，頁44-46。
- 胡增益，《新滿漢大辭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 張德澤，《清代國家機構考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
-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注》，臺北：國史館，1986-1991。
-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 莊吉發，《謝遂滿漢文《職貢圖》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
- 莊吉發，〈繙譯四書——四書滿文譯本與清代考證學的發展〉，《故宮文物月刊》，412期，2017年7月，頁18-27。
- 郭福祥，〈清前期宮廷西洋科學儀器的種類和來源〉，《Asian Studies》，3卷2期，2015年12月，頁119-138。
- 郭福祥，〈《皇朝禮器圖式》編纂與乾隆朝科學儀器的禮制化〉，《故宮學術季刊》，37卷3期，2020年5月，頁1-44。
- 陳芳妹，〈雍正帝贈送曲阜孔廟的祭器——畫珪瑯五供與銅簠簋〉，《故宮學術季刊》，37卷1期，2020年3月，頁73-142。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故宮博物院清代新疆文物珍藏展》，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
- 楊久盛主編，《清代盛京宮廷樂舞研究》，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13。
- 楊自平，〈從《日講易經解義》論康熙殿堂《易》學的特色〉，《臺大中文學報》，28期，2008年6月，頁93-138。
- 楊鳴濤，〈清乾隆金嵌珍珠天球儀的天文學考察〉，《文物天地》，2016年1期，頁84-87。
- 葉高樹，〈滿漢合璧《欽定繙譯五經四書》的文化意涵：從「因國書以通經義」到「因經義以通國書」〉，《經學研究論叢》，13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頁1-42。
- 葉高樹，〈乾隆皇帝與滿洲傳統的重建——以薩滿祭祀儀式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8期，2017年11月，頁43-94。
- 葉高樹，《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
-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 葛兆光，〈朝貢、禮儀與衣冠——從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國王熱河祝壽及請改易服色說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2期，頁1-11。
- 鄧秋華，〈清代索倫部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 蔡玫芬，《皇權與佛法：藏傳佛教法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

- 賴惠敏，〈崇慶皇太后萬壽盛典〉，《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8期，2016年12月，頁1-52。
- 賴惠敏，〈乾隆皇帝製作金屬祭器的意義〉，37卷3期，2020年5月，頁45-94。
- 賴毓芝，〈圖版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期，2012年3月，頁1-76。
- 賴毓芝，〈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版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0期，2013年6月，頁1-75。
- 賴毓芝，〈「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故宮學術季刊》，37卷2期，2020年4月，頁1-56。
- 簡承禾，〈康熙日講書經解議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 羅文華，《龍袍與袈裟（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網路資料

- 「《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明清研究通訊》，75期，2019年10月，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780，檢索日期：2020年5月1日。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login.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1日。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資料庫：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檢索日期：2020年6月30日。
- 中研院近史所藏內務府奏銷檔案全文資料庫：<http://www.ihp.sinica.edu.tw/ttscgi/ttsweb?@0:0:1:thii@@0.19986416792556017>，檢索日期：2020年6月30日。
- 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站「《備物昭誠·祭器圖》」，<https://img.dpm.org.cn/ancient/mingqing/158682.html?hl=%E7%A5%AD%E5%99%A8>，檢索日期：2020年8月1日。
- 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站「鐘錶儀器」：<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clocks.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1日。
-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https://antiquities.npm.gov.tw>，檢索日期：2020年8月1日。

圖版出處

- 圖 1 堂子饗殿內陳設供器、堂子亭式殿內陳設供器。圖版取自（清）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657，卷 6，頁 736。
- 圖 2-1 還願神杆，《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圖版取自（清）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657，卷 6，頁 750。
- 圖 2-2 還願神杆，《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圖版取自（清）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卷 6，頁 33。
- 圖 3-1 亭式殿內供香鑪饌酒楠木高案、獻酒楠木低桌，《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圖版取自（清）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7，卷 6，頁 742。
- 圖 3-2 亭式殿內供香鑪饌酒楠木高案、獻酒楠木低桌，《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圖版取自（清）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卷 6，頁 20。
- 圖 4 《御製增訂清文鑑》，祭祀類第一至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圖版取自（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232，卷 6，禮部，祭祀類第一至二，頁 190-193。
- 圖 5 《御製增訂清文鑑》，祭祀器用類第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圖版取自（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232，卷 6，禮部，祭祀器用類第一至二，頁 193-197。
- 圖 6-1 獻酒銀瓊，《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圖版取自（清）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7，卷 6，頁 756。
- 圖 6-2 獻酒銀瓊，《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圖版取自（清）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卷 6，頁 45。
- 圖 7 夕月壇正位瓊，（清）冷鑒、門應兆等合畫，《皇朝禮器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故宮出版社網頁，<https://m.weibo.cn/5380750460/4420693107913129>，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 圖 8-1 盛清酒大藍花磁罇、盛清酒小黃磁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圖版取自（清）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7，卷 6，頁 764。
- 圖 8-2 盛清酒大藍花磁罇、盛清酒小黃磁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圖版取自（清）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卷 6，頁 60。
- 圖 9 天壇正位俎、太廟西廡俎，《皇朝禮器圖式》，卷一，祭器，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圖版取自（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卷 1，頁 10、23。
- 圖 10-1 房俎、棋、巖俎、梘俎。圖版取自（宋）聶崇義集注，《新定三禮圖》，通志堂藏板康熙丙辰（十五年）納蘭成德序，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本，卷 13，頁 7-8。
- 圖 10-2 俎。圖版取自明，徐一夔等奉勅撰，《大明集禮》，嘉靖九年六月望日御製序，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刻本，卷 7，頁 18-19。
- 圖 11-1 供肉銀裏楠木大槽盆、盛血銀裏楠木小槽盆，《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圖版取自（清）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7，卷 6，頁 752-753。
- 圖 11-2 供肉銀裏楠木大槽盆、盛血銀裏楠木小槽盆，《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圖版取自（清）允祿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卷 6，頁 37-38。
- 圖 12 天壇正位匏爵，《皇朝禮器圖式》，卷一，祭器，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圖版取自（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卷 1，頁 2。
- 圖 13 清，乾隆，匏爵，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藏。圖版取自吳曉筠，〈孔廟與乾隆朝祭器的設置〉，《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2 期，2020 年 4 月，頁 129，圖 14。
- 圖 14 清人撰，《備物昭誠·祭器圖》，清乾隆年內府彩繪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頁：<https://img.dpm.org.cn/ancient/mingqing/158682.html?hl=%E7%A5%AD%E5%99%A8>，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 圖 15-1 椰殼高腳杯，Coconut Cup, ca., 1650, by Johannes Fridericus Benedick, Hungarian, Nagyszeben，大都會博物館藏。圖版取自賴毓芝〈「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2 期，2020 年 4 月，頁 53，圖 33。
- 圖 15-2 Welcome Goblet for the “Neuer Stall” (new stables), c. 1586-1588, Dresden. 圖版取自賴毓芝，〈「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2 期，2020 年 4 月，頁 53，圖 33。
- 圖 16 椰子雕雲蝠鑲金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頁：<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bamboo/232042.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圖 17 清，椰子念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 「器用陶匏 以象天地之性也」。圖版取自《御製繙譯禮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186，卷 11，郊特牲，頁 323。

圖 19 椰子，hotoci。圖版取自（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233，卷 28，果品類第三，頁 174。

圖 20 清，鍍金七政寶、寶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 嘎布拉供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 朝日壇（陶）爵，清人撰，《備物昭誠·祭器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年內府彩繪本。圖版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頁：<https://img.dpm.org.cn/ancient/mingqing/158682.html?hl=%E7%A5%AD%E5%99%A8>，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圖 23 朝日壇陶爵。圖版取自（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卷 1，頁 41。

圖 24 月白，guweciheri。圖版取自（清）傅恆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本，卷 23，布帛部，采色類第三，頁 785。

圖 25 白琥。圖版取自（宋）聶崇義集注，《新定三禮圖》，通志堂藏板康熙丙辰（十五年）納蘭成德序，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本，卷 11，頁 2。

圖 26 夕月壇正位玉白璧，清人撰，《備物昭誠·祭器圖》，清乾隆年內府彩繪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頁：<https://img.dpm.org.cn/ancient/mingqing/158682.html?hl=%E7%A5%AD%E5%99%A8>，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圖 27 郎世寧等繪，〈萬樹園賜宴圖〉軸，絹本，設色，縱 221.2 公分，橫 419.6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頁：<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33333.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圖 28 《筳吹樂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圖版取自《御製律呂正義後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216，卷 47，頁 380-419。

圖 29 《番部合奏樂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圖版取自《御製律呂正義後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216，卷 48，頁 439-420。

圖 30-1 巡幸饒吹樂蒙古角。圖版取自（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卷 9，樂器，頁 14。

圖 30-2 銅製蒙古角及測繪圖。圖版取自楊久盛主編，《清代盛京宮廷樂舞研究》，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13，頁 70-71。

- 圖 31 銅號角、長號角。圖版取自哈斯巴特爾編繪，《蒙古族傳統文化圖鑑》，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頁 193。
- 圖 32-1 明黃色緞繡雲金龍戲珠紋三角纛，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https://digicol.dpm.org.cn/list?page=1&keyWord=%E7%BA%9B>，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 圖 32-2 皇帝行營吉爾丹纛。圖版取自（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卷 17，武備五，旗纛，頁 5。
- 圖 32-3 八旗護軍統領纛。圖版取自（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卷 17，武備五，旗纛，頁 23。
- 圖 32-4 皇帝行圍纛。圖版取自（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卷 17，武備五，旗纛，頁 7。
- 圖 32-5 皇帝行圍蒙古纛。圖版取自（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卷 17，武備五，旗纛，頁 8。
- 圖 33 回部樂巴拉滿、安南國樂巧鼓、緬甸國樂接內塔兜呼、廓爾喀部樂達拉，《皇朝禮器圖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圖版取自（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565，頁 515、521、525、527。
- 圖 34 〈緬甸獻琛抒悃樂章〉，茄鼓〔筳吹〕樂章（三）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5 〈安南國王阮光平恭進獻琛抒悃樂章〉，茄鼓〔筳吹〕樂章（五）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6 〈廓爾喀王拉特納巴都爾恭頌歌詞〉，茄鼓〔筳吹〕樂章（四）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7 厄魯特梅鉞箭、索倫鉞箭、索倫哨箭。圖版取自（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卷 14，武備二，武具一，頁 34、39、51。
- 圖 38-1 鐵簇白擋索倫長鉞箭、木牛角漆弓，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 Meng, Ding and Mae Anna Pang. *A Golden Age of China: Qianlong Emperor, 1736-1795*. Melbourne, Australia: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2015.
- 圖 38-2 皇帝大閱鉞箭。圖版取自（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卷 14，武備二，武具一，頁 11。
- 圖 39 回子鉞箭。圖版取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故宮博物院清代新疆文物珍藏展》，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頁 207。
- 圖 40 定邊將軍兆惠「得勝靈纛一」。圖版取自（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卷 17，武備五，旗纛，頁 9-10。

- 圖 41-1 天體儀。圖版取自（清）允祿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卷 3，儀器，頁 1。
- 圖 41-2 北京古觀象台天體儀。圖版取自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1/%E5%A4%A9%E4%BD%93%E4%BB%AA.jpg>，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 圖 42 金嵌珍珠天球儀，清，乾隆年間，球徑 29.5 公分，架高 61.5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頁：<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tinware/232515.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 圖 43-1 御製地球儀，圖版取自《皇朝禮器圖式》，卷 3，儀器，頁 27，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圖 43-2 御製地球儀，（清）冷鑒、門應兆等合畫，《皇朝禮器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郭福祥，〈《皇朝禮器圖式》編纂與乾隆朝科學儀器的禮制化〉，《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3 期，2020 年 5 月，頁 38，圖 10。
- 圖 44 （清）謝遂本，〈皇清職貢圖〉，卷 1，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5 （清）佚名，〈萬國來朝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a1522f842f584ecc9afe7830557d1294>，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 圖 46 大西洋國夷僧女尼，（清）謝遂本，〈皇清職貢圖〉，卷 1，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7 拉氏諾語、西番譯語書影，西洋館，川番譯語，西番譯語，清人撰，《會同四譯館譯語》，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頁：<https://www.dpm.org.cn/ancient/nation/120753.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 圖 48 《四體合璧文鑑》內頁，柏林國家圖書館藏。

A Study of the Manchu, Mongolian, Western Region, and European Elements in *Illustrat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of the Imperial Qing Dynasty*

Lin, Shih-hsu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bstract

Early in his reign, the Qianlong emperor ordered the revision and compilation of books on rites to put his respect for Confucian ideas into practice and to standardize related ceremonies and their implements. In 1748, he took personal control of revising these ceremonies and objects as well as reviewing their illustrations, eventually yielding a full group of six categories with catalogs and explanations on ritual vessels, crowns and clothing, musical instruments, astronomical apparatus, imperial insignia, and armaments. Afterwards, he further ordered each category be compiled into a single volume for a text to be printed together as *Illustrat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of the Imperial Qing Dynasty*, forming a complete set of illustrated rites that was circulated widely. Although these new rites and music at the Qianlong court were based on antiquity and textual studies,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the *Illustrat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of the Imperial Qing Dynasty* shows that not only did ceremonial objects and military armaments differ from the categories and forms of such items in classic texts on rites and ceremonies, they also included “non-Han Chinese” elements from Manchu, Mongolian, Western Region and European sources. The Qianlong emperor in particular pointed out that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be based on current dynastic practice and not revised to reflect Han-Chinese forms of clothing, making *Illustrat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of the Imperial Qing Dynasty* a practical example of Manchu traditions as well. This compilation underwent revisions and additions over the years and was also related to the proclamation of pacifying what is now the Xinjiang area in the tenth lunar month of 1759. This accounts for the large number of elements from thes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Illustrat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of the Imperial Qing Dynasty*. The main point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the *Illustrat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of the Imperial Qing*

Dynasty and the phenomenon of Manchu, Mongolian, Western Region and European elements that appear in it. Not only does the study offe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for the plurality of sources in *Illustrat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of the Imperial Qing Dynasty*, it also helps recognize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acets to court rituals and music in the Qianlong reign.

Keywords: *Illustrat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of the Imperial Qing Dynasty*, Manchu, Mongol, Western Regions(Xiyu), Europe (the West)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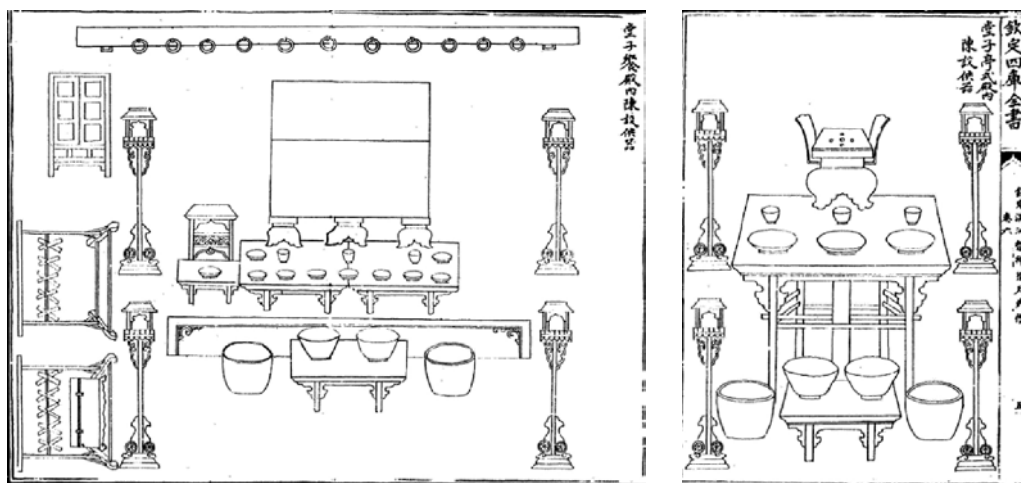


圖 1 左：堂子饗殿內陳設供器 右：堂子亭式殿內陳設供器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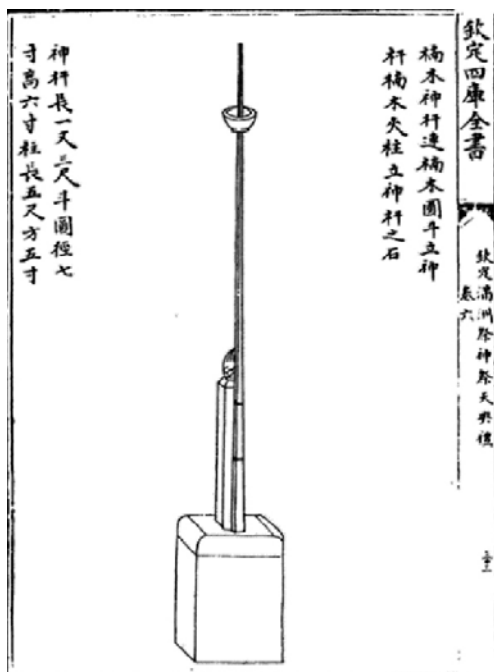


圖 2-1 還願神杆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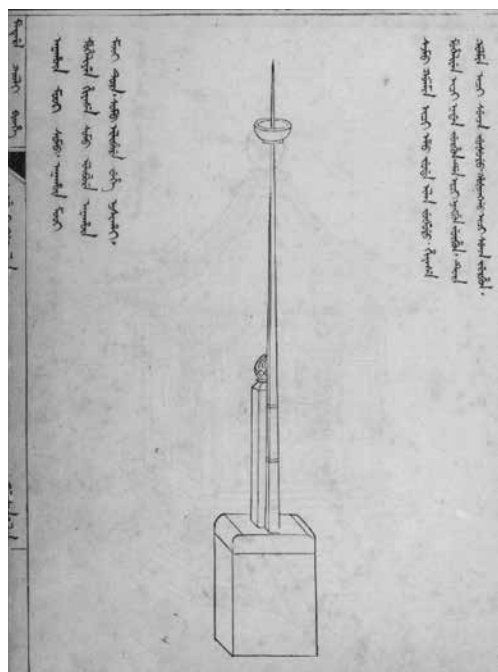


圖 2-2 還願神杆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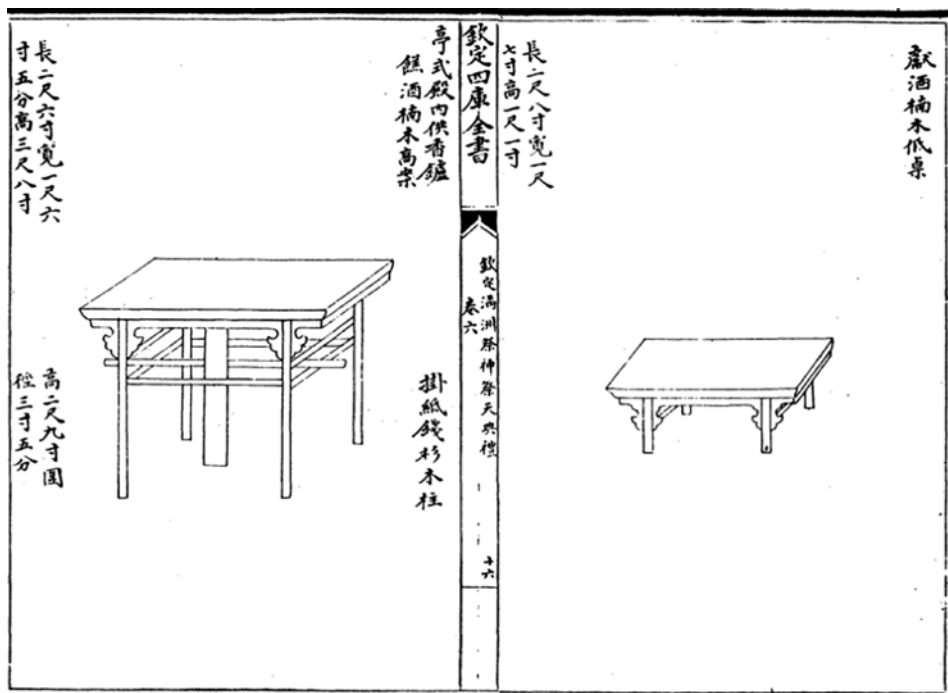


圖 3-1 左：亭式殿內供香爐饌酒楠木高桌 右：獻酒楠木低桌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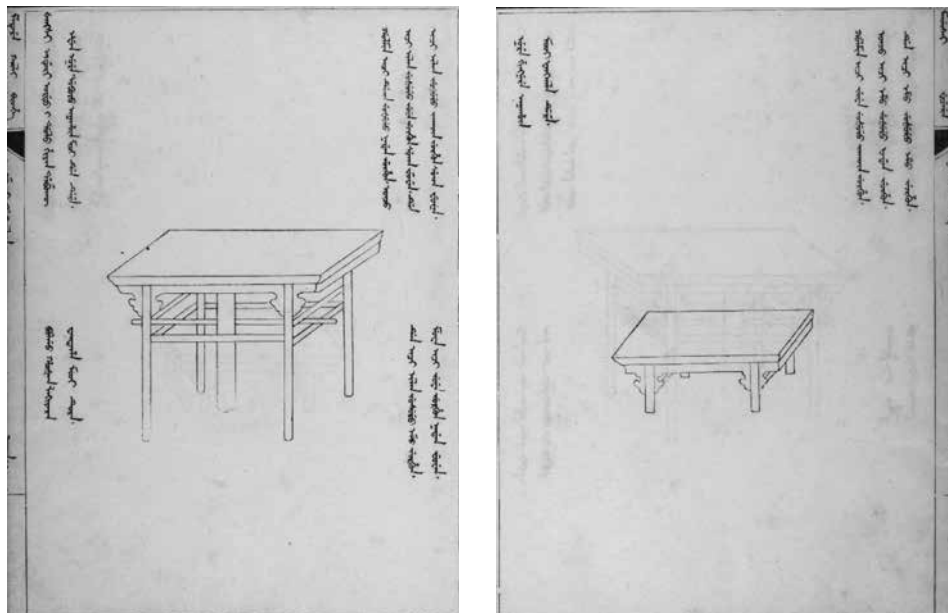


圖 3-2 左：亭式殿內供香爐饌酒楠木高桌 右：獻酒楠木低桌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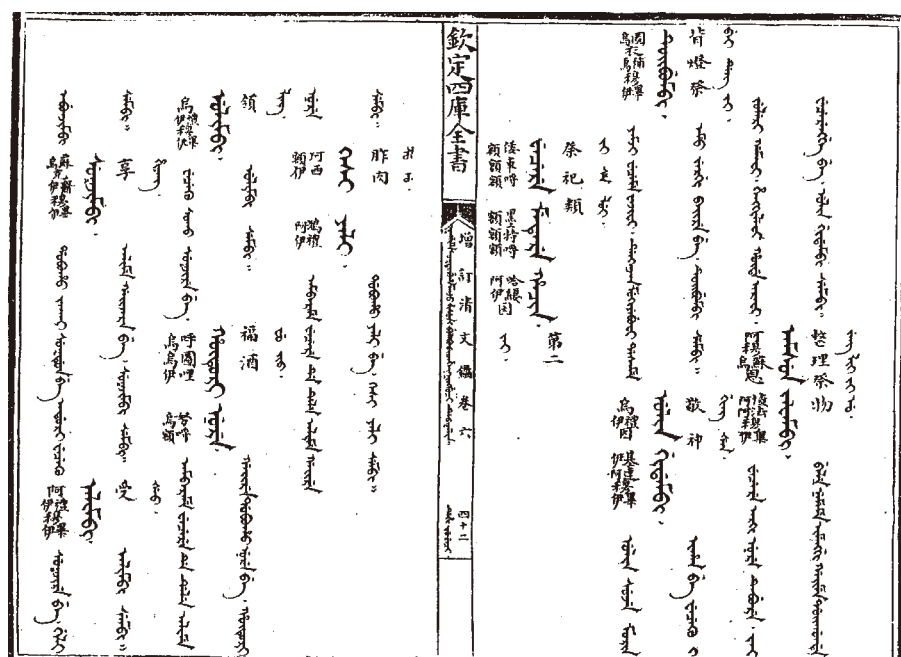


圖 4 御製增訂清文鑑 祭祀類第一至二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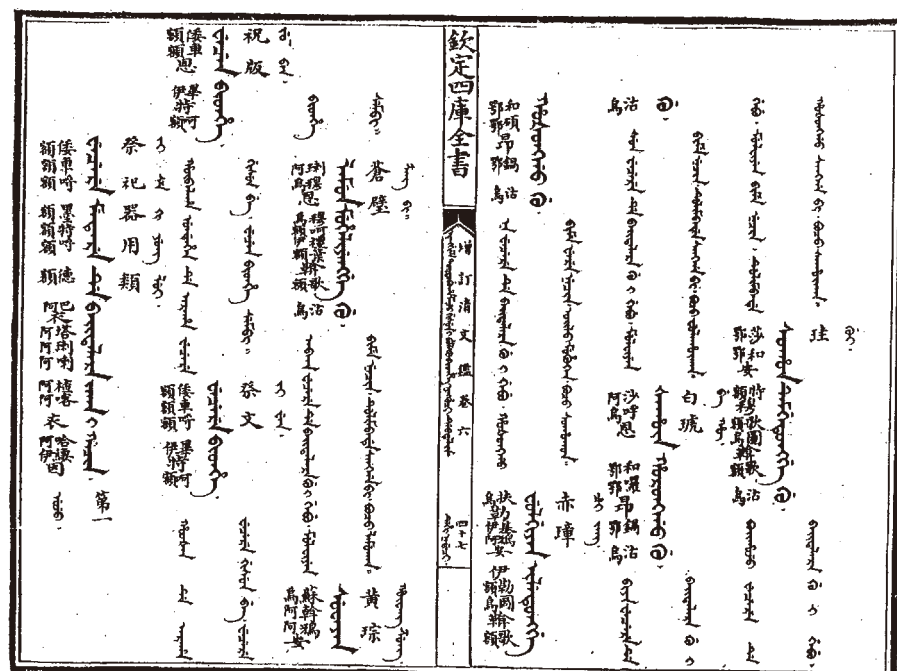


圖 5 御製增訂清文鑑 祭祀器用類第二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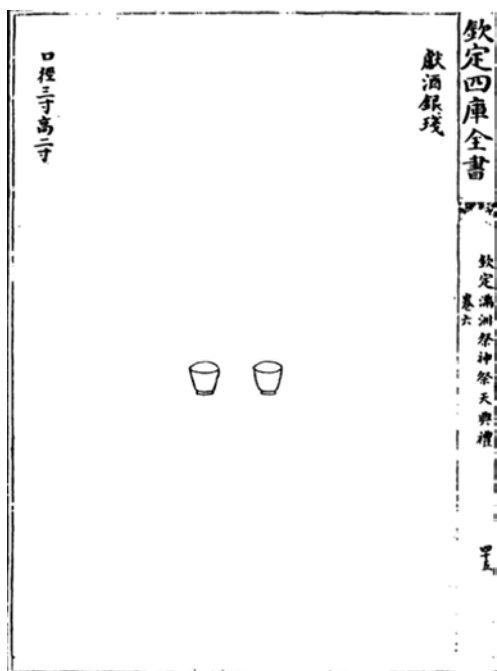


圖 6-1 獻酒銀琖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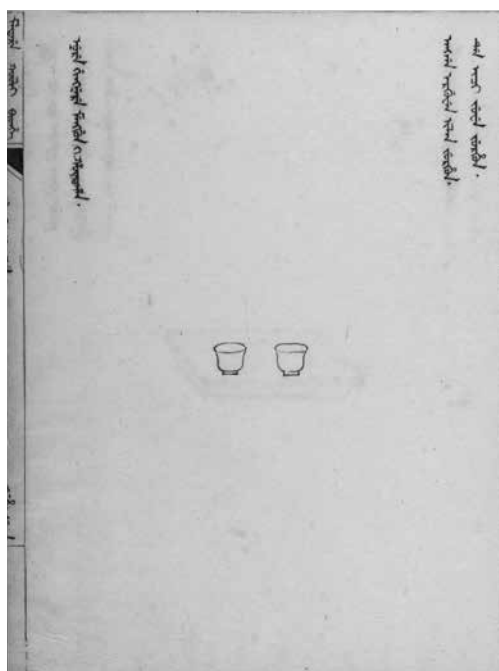


圖 6-2 獻酒銀琖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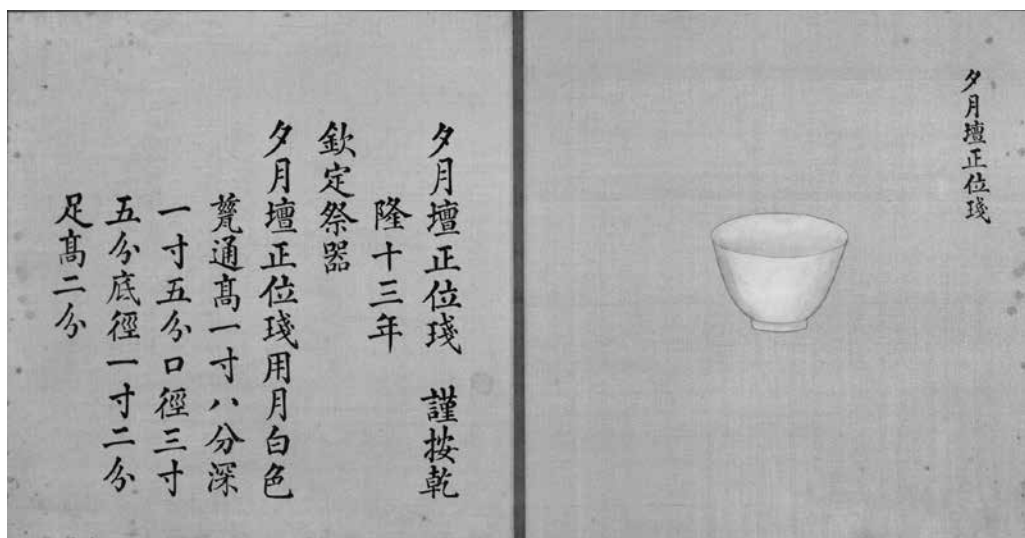


圖 7 夕月壇正位琖 清 冷鑒、門應兆等合畫 《皇朝禮器圖》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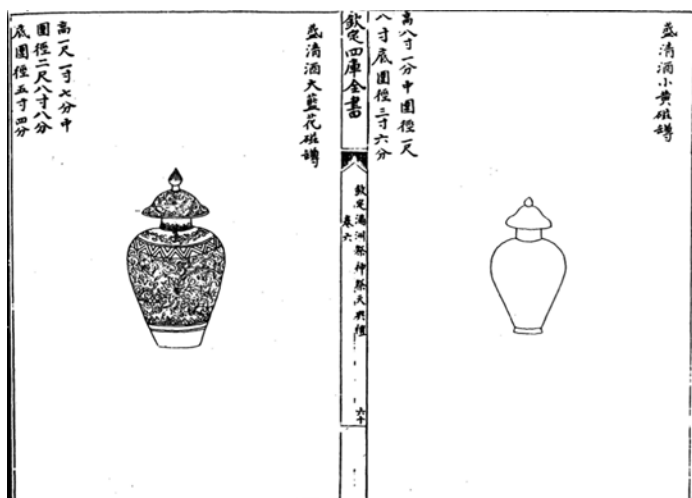


圖 8-1 左：盛清酒大藍花磁罇 右：盛清酒小黃磁罇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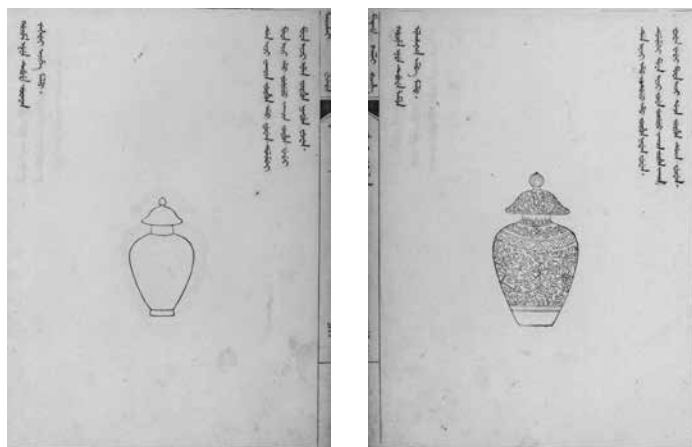


圖 8-2 左：盛清酒大藍花磁罇 右：盛清酒小黃磁罇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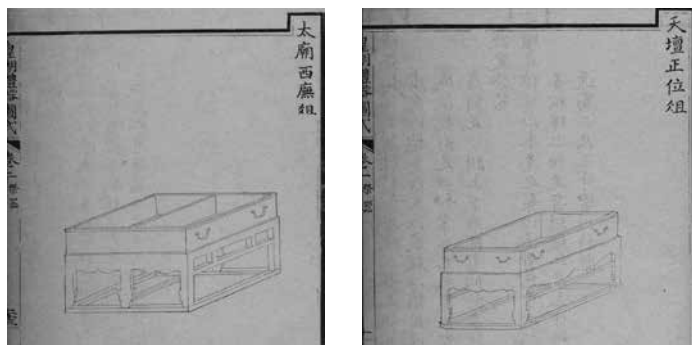


圖 9 左：天壇正位俎 右：廟西廡 皇朝禮器圖式 卷 1 祭器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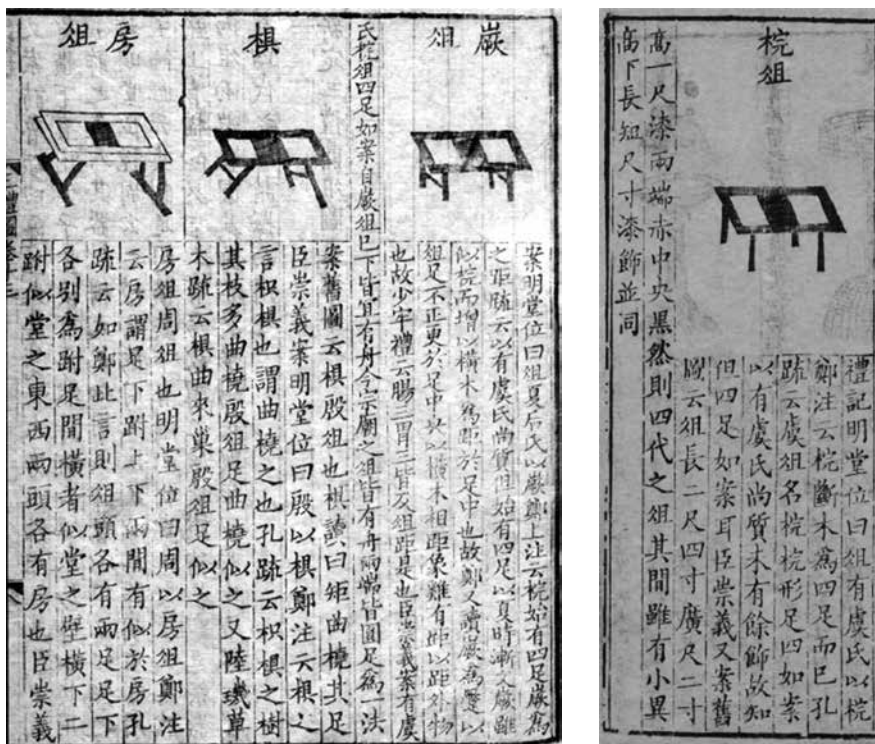


圖 10-1 左：房俎、楫、斚俎 右：斚俎 宋 聶崇義集注 新定三禮圖
通志堂藏板康熙丙辰（十五年）納蘭成德序 柏林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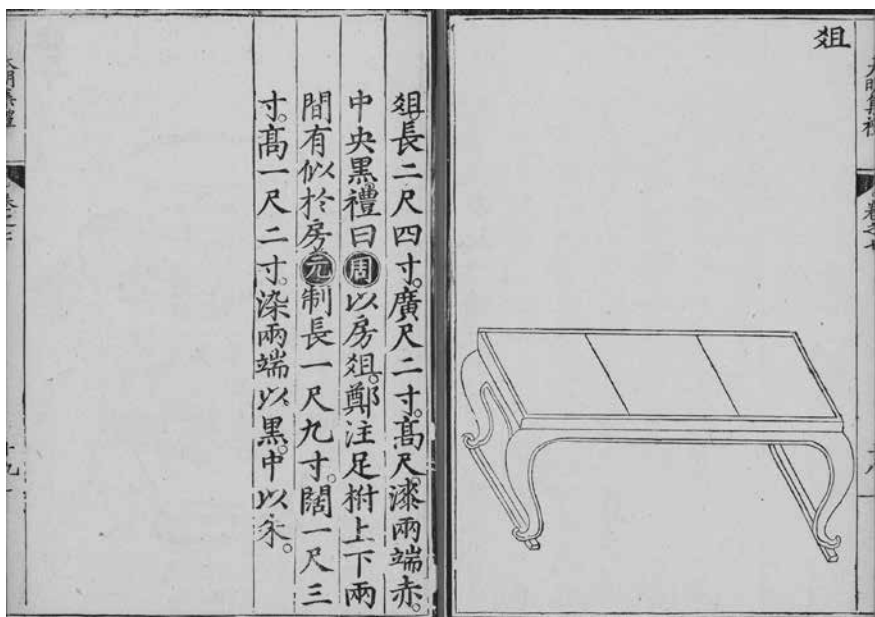


圖 10-2 俎 明 徐一夔等 大明集禮 嘉靖九年六月望日御製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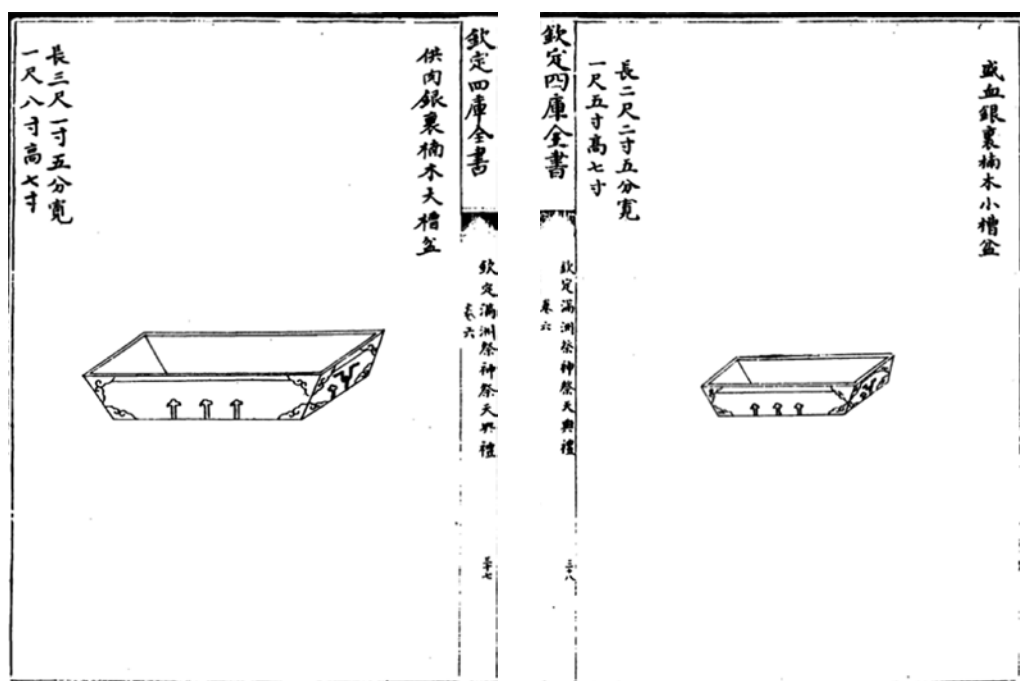


圖 11-1 左：供肉銀裏楠木大槽盆 右：盛血銀裏楠木小槽盆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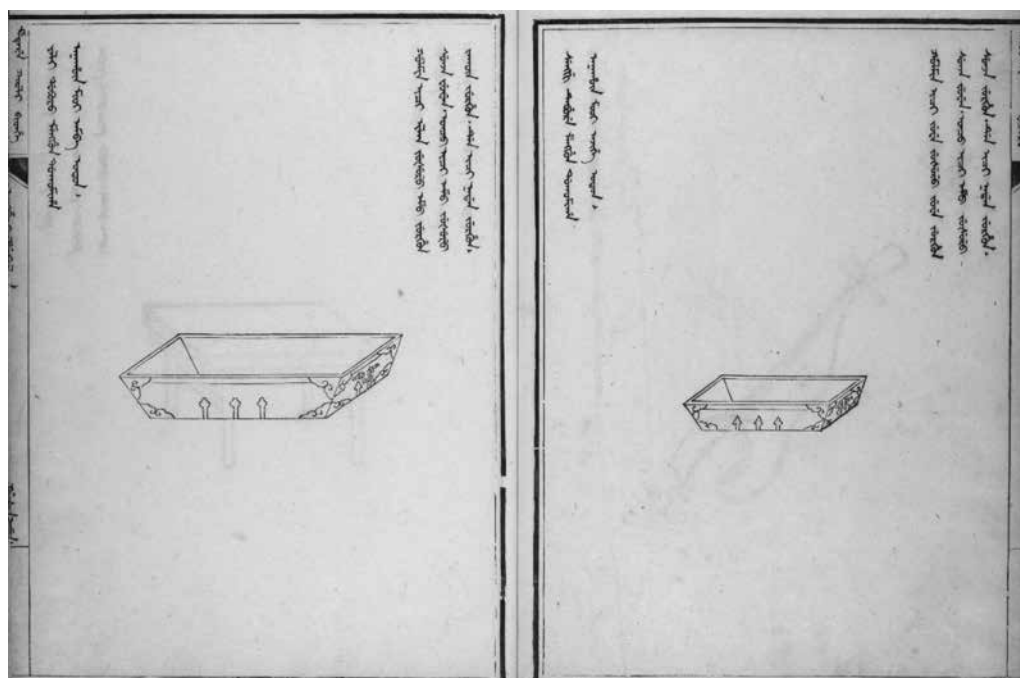


圖 11-2 左：供肉銀裏楠木大槽盆 右：盛血銀裏楠木小槽盆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內府滿文刻本



圖 12 天壇正位匏爵 皇朝禮器圖式 卷一 祭器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圖 13 清 乾隆 匏爵 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藏 圖版取自吳曉筠，〈孔廟與乾隆朝祭器的設置〉，圖 14



圖 14 地壇正位匏爵 備物昭誠·祭器圖 清乾隆年內府彩繪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1 椰殼高腳杯 Coconut Cup, ca., 1650, by Johannes Fridericus Benedick, Hungarian, Nagyszeben 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版取自賴毓芝,〈「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圖 33



圖 15-2 Welcome Goblet for the "Neuer Stall" (new stables) c. 1586-1588 Dresden 圖版取自賴毓芝,〈「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圖 33



圖 16 椰子雕雲蝠鑲金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 清 椰子念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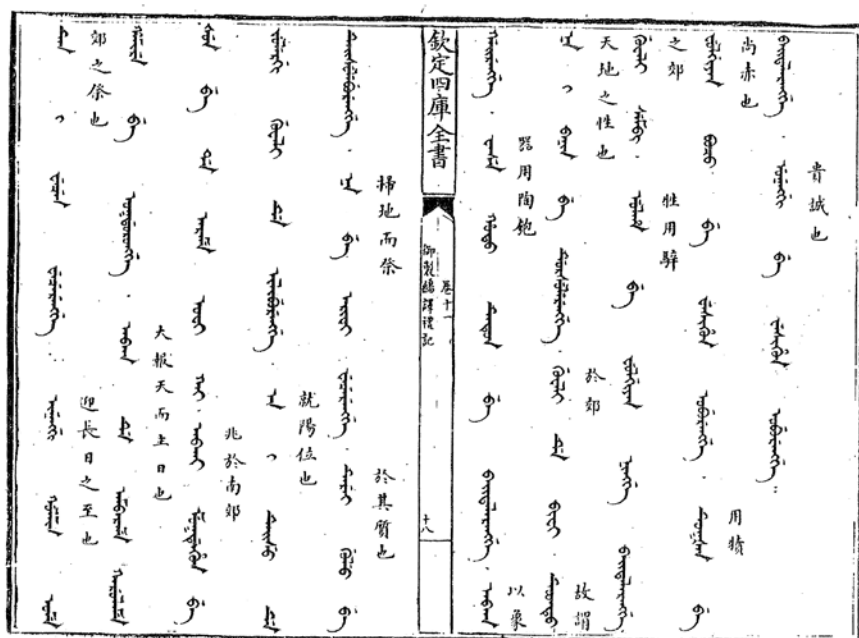


圖 18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御製繡譯禮記 卷 11 郊特牲
景印文淵冊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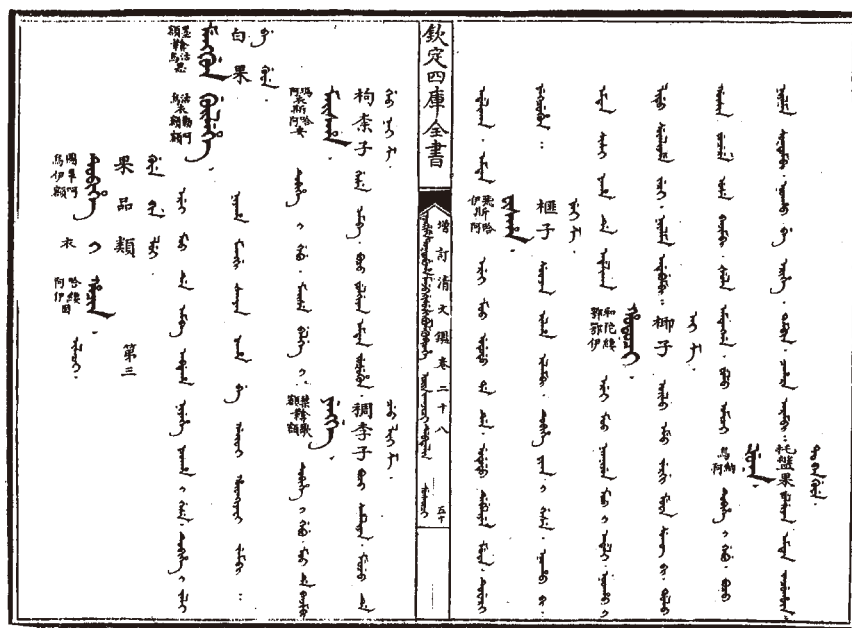


圖 19 椰子 hotoci 《御製增訂清文鑑》 卷 28 果品類第三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圖 20 清 鍍金七政寶、寶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 嘎布拉供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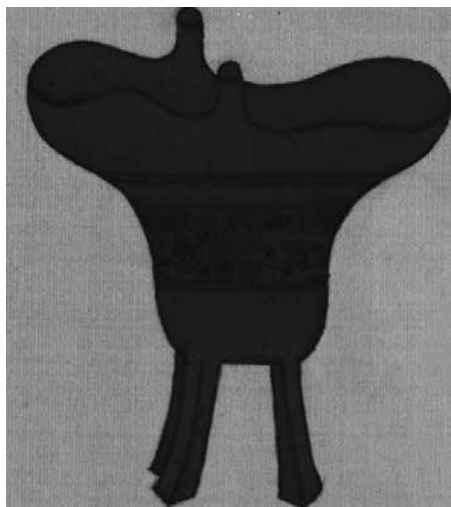


圖 22 朝日壇（陶）爵 備物昭誠·祭器圖 清乾隆年內府彩繪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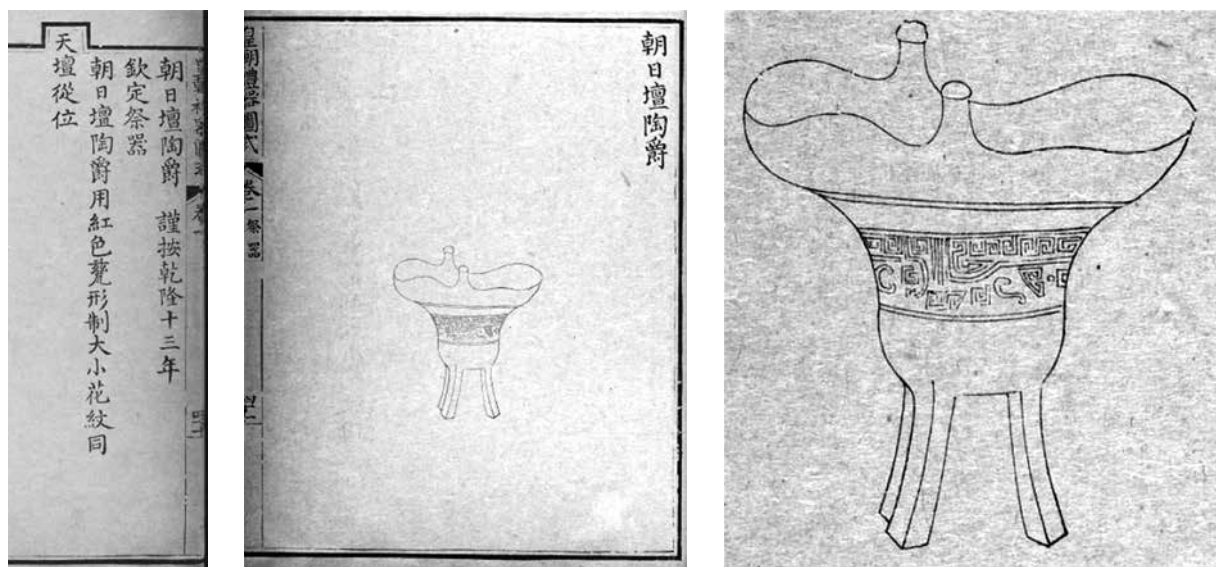


圖 23 朝日壇陶爵 皇朝禮器圖式 卷1 祭器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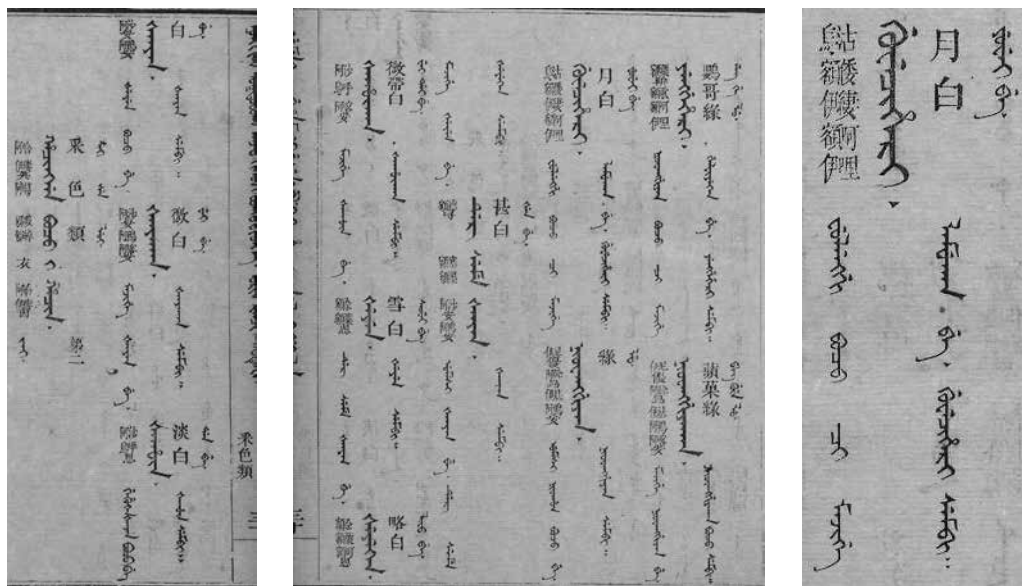


圖 24 月白 guweciheri 御製增訂清文鑑 卷 23 布帛部 采色類第三 柏林國家圖書館藏



圖 25 白琥 宋 聶崇義集注 新定三禮圖
柏林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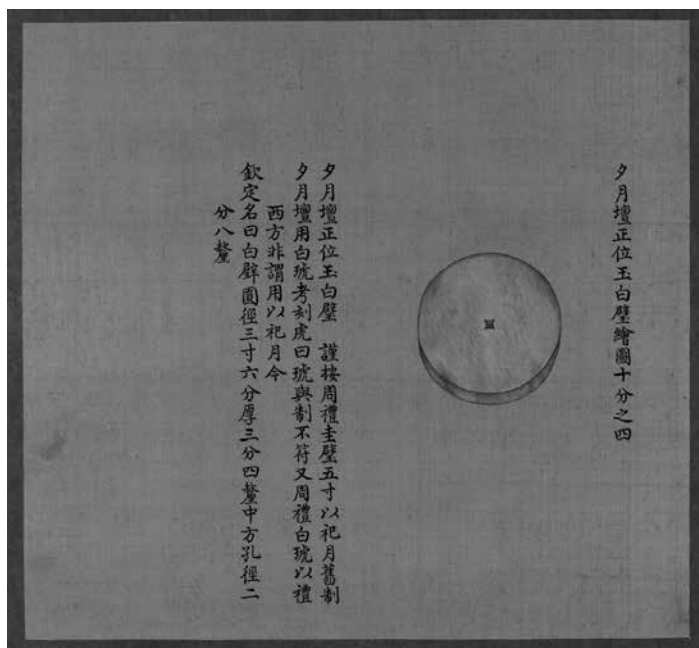


圖 26 夕月壇正位玉白璧 備物昭誠·祭器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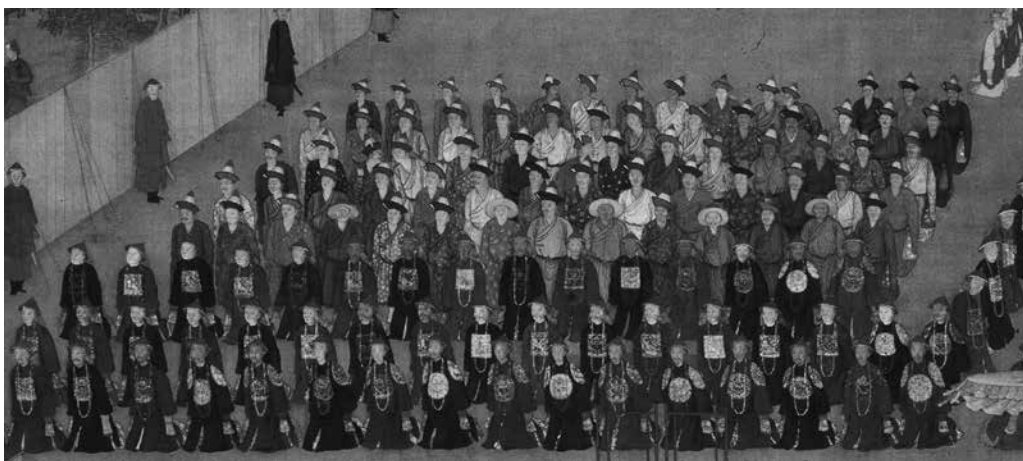


圖 27 郎世寧等 萬樹園賜宴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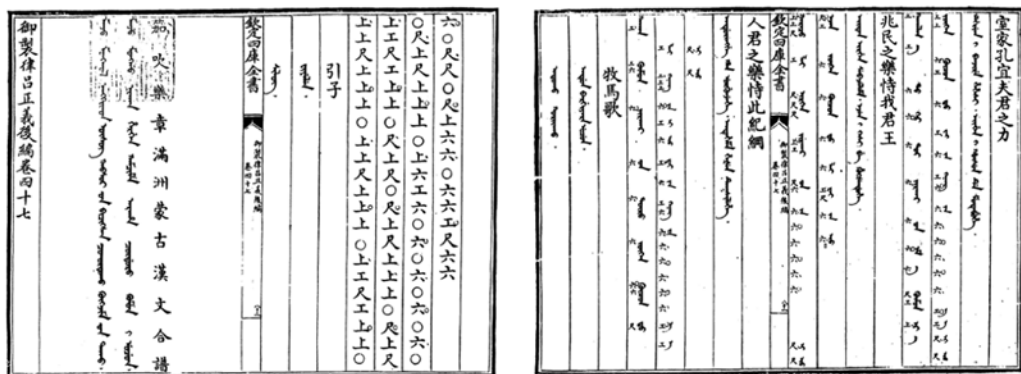


圖 28 笙吹樂章滿州蒙古漢文合譜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 卷47 景印文淵冊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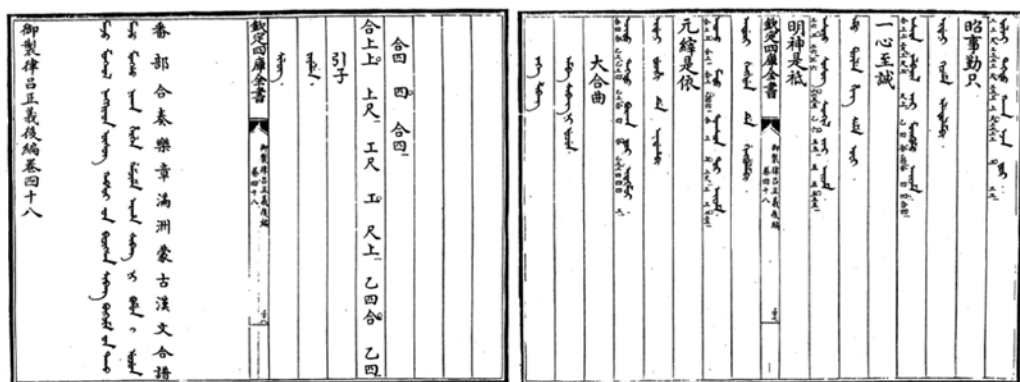


圖 29 番部合奏樂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 卷 48 景印文淵冊四庫全書本



圖 30-1 幸號吹樂蒙古角 皇朝禮器圖式 卷 9 樂器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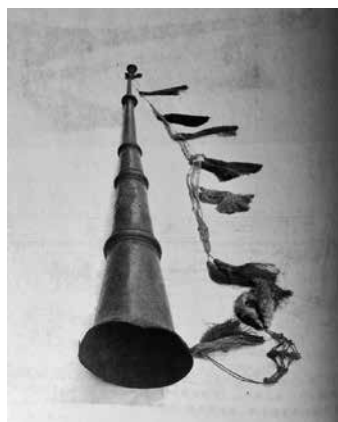


圖 30-2 銅製蒙古角及測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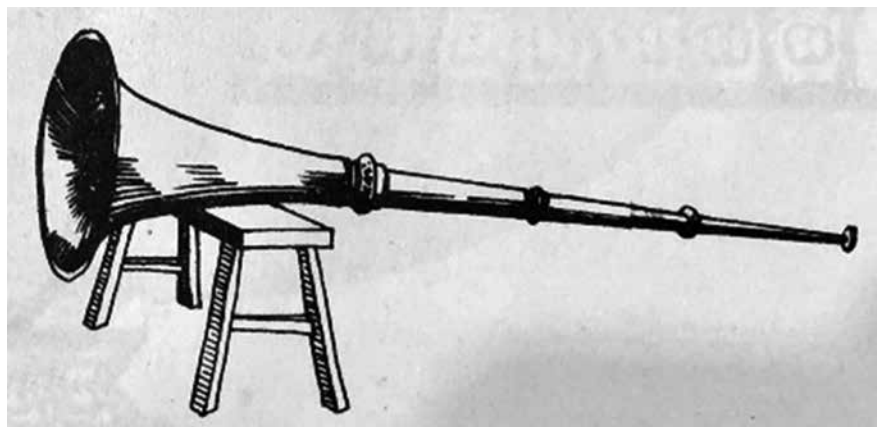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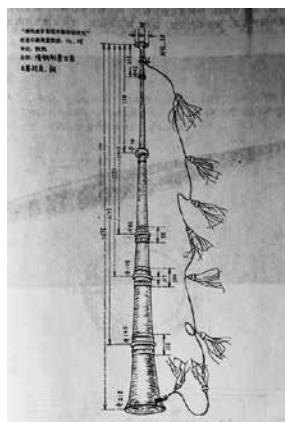


圖 31 左：銅號角 右：長號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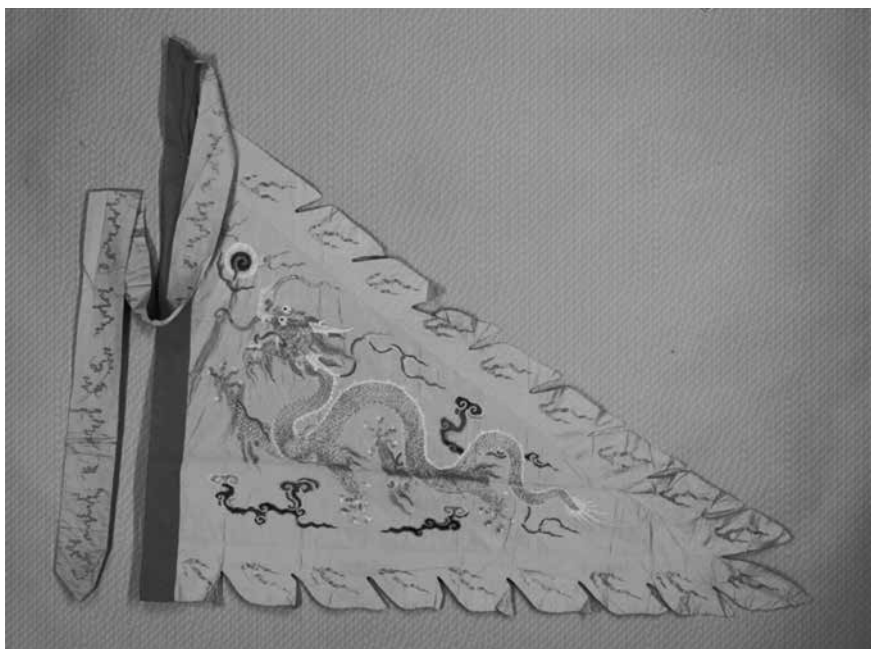


圖 32-1 明黃色緞繡雲金龍戲珠紋三角纛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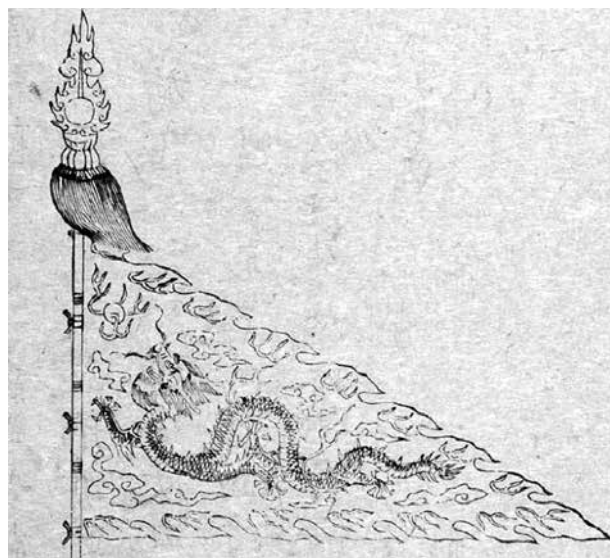


圖 32-2 皇帝行營吉爾丹纛 皇朝禮器圖式 卷 17 武備五 旗纛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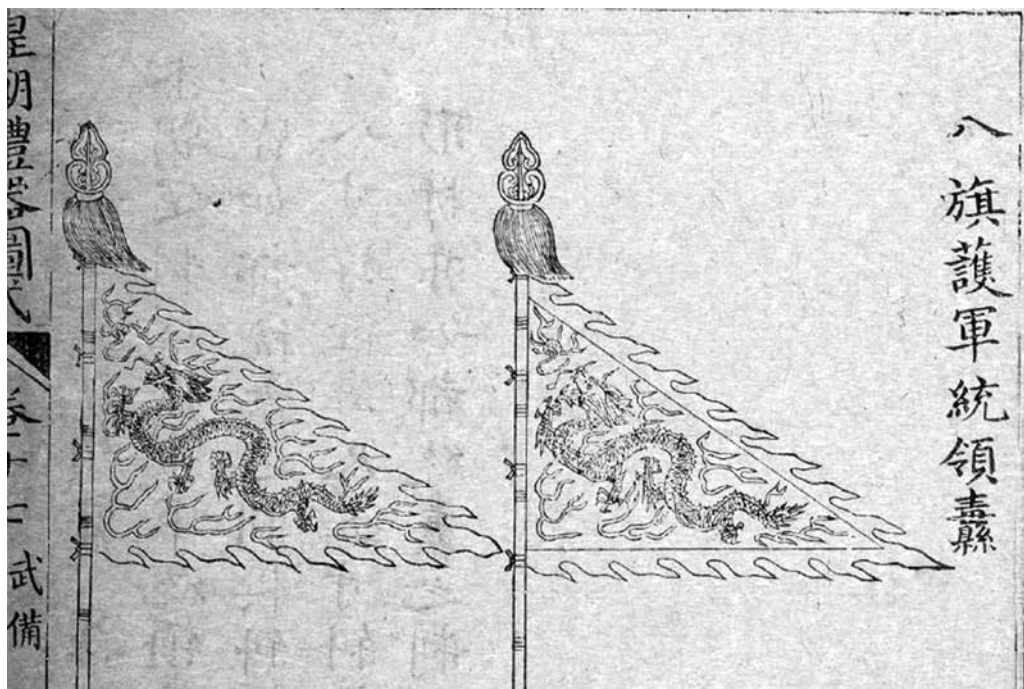


圖 32-3 八旗護軍統領纛 皇朝禮器圖式 卷 17 武備五 旗纛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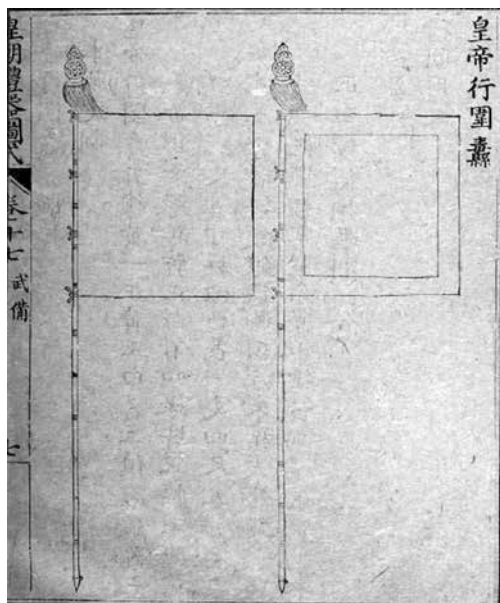


圖 32-4 皇帝行圍纛 皇朝禮器圖式 卷 17 武備五 旗纛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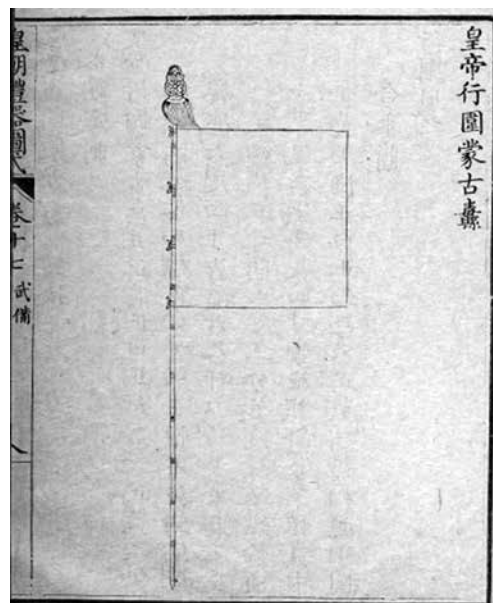


圖 32-5 皇帝行圍蒙古纛 皇朝禮器圖式 卷 17 武備五 旗纛 哈佛燕京
圖書館藏 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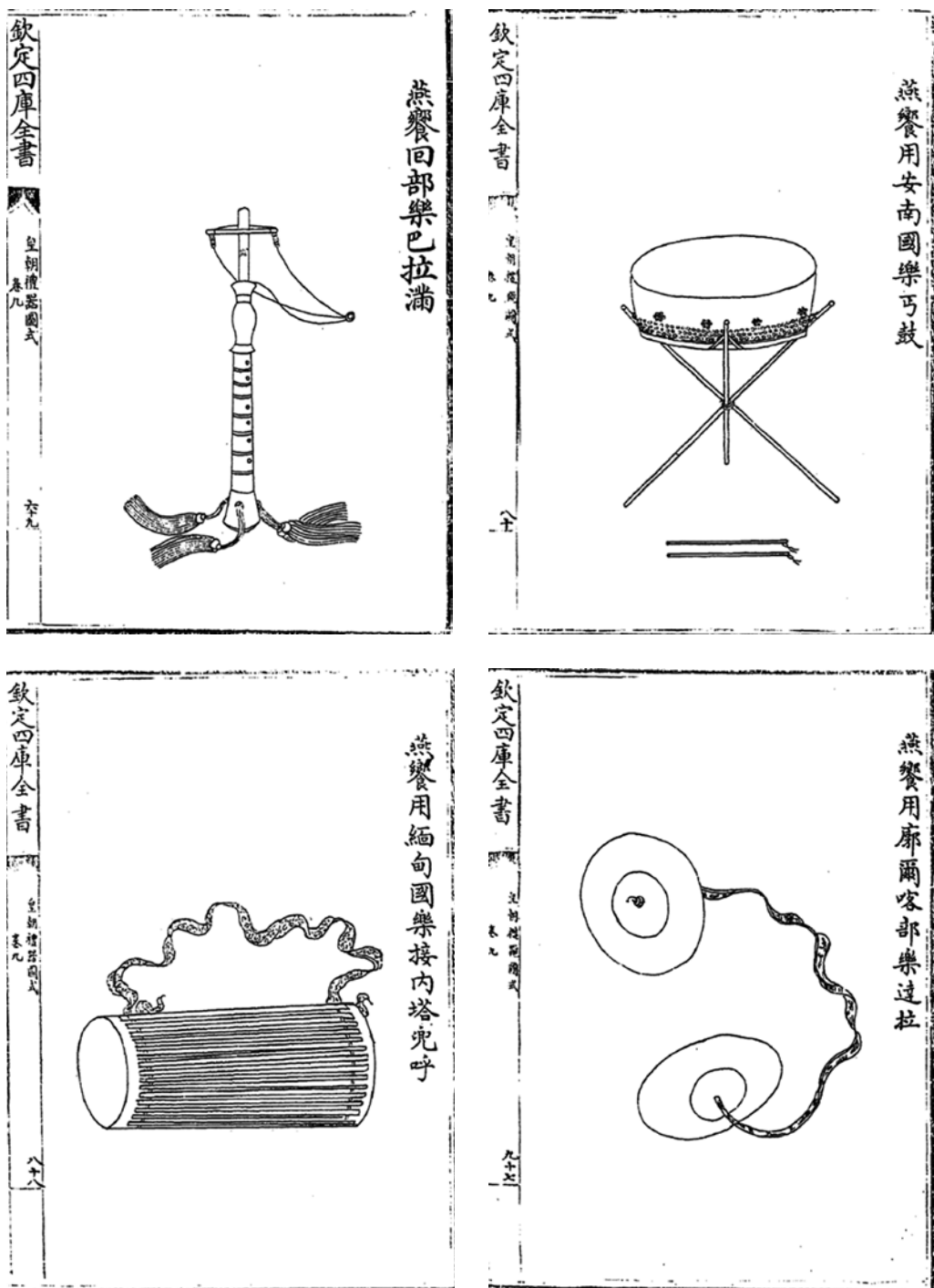


圖 33 左上：回部樂巴拉滿 右上：安南國樂巧鼓 左下：緬甸國樂接內塔兜呼 右下：廓爾喀部樂達拉 皇朝禮器圖式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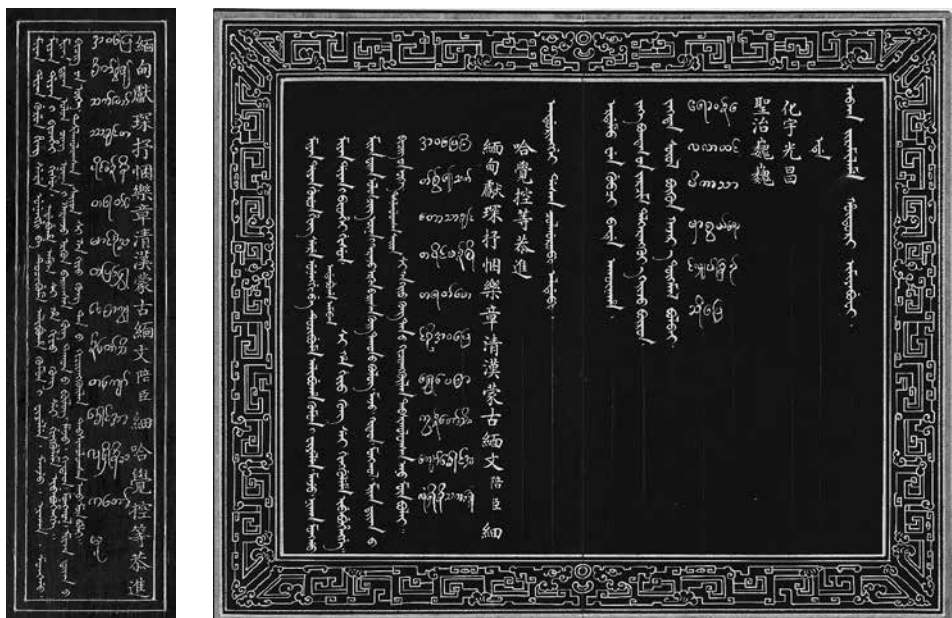


圖 34 緬甸獻琛抒悃樂章 茄鼓【笳吹】樂章（三）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5 安南國王阮光平恭進獻琛抒悃樂章 茄鼓【笳吹】樂章（五）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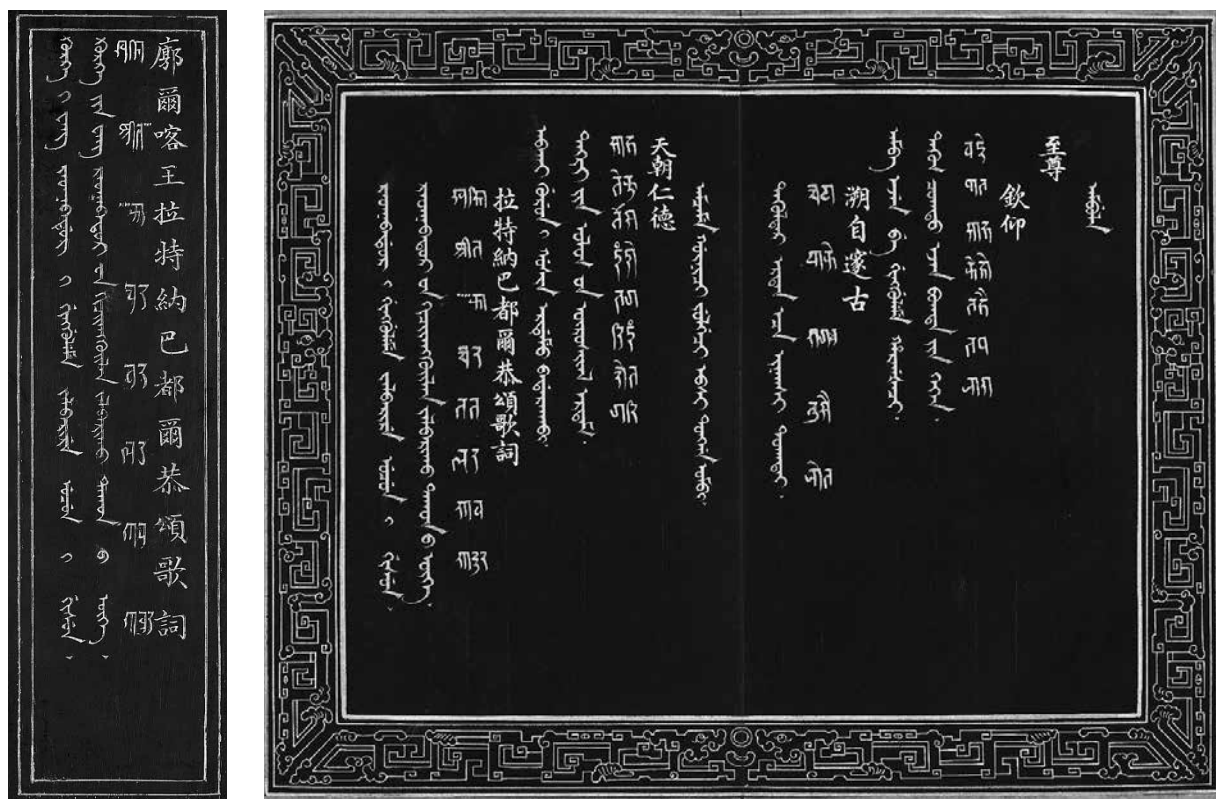


圖 36 廓爾喀王拉特納巴都爾恭頌歌詞 笳鼓【笳吹】樂章（四）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7 左：厄魯特梅鉞箭 中：索倫鈍箭 右：索倫哨箭
皇朝禮器圖式 卷 14 武備二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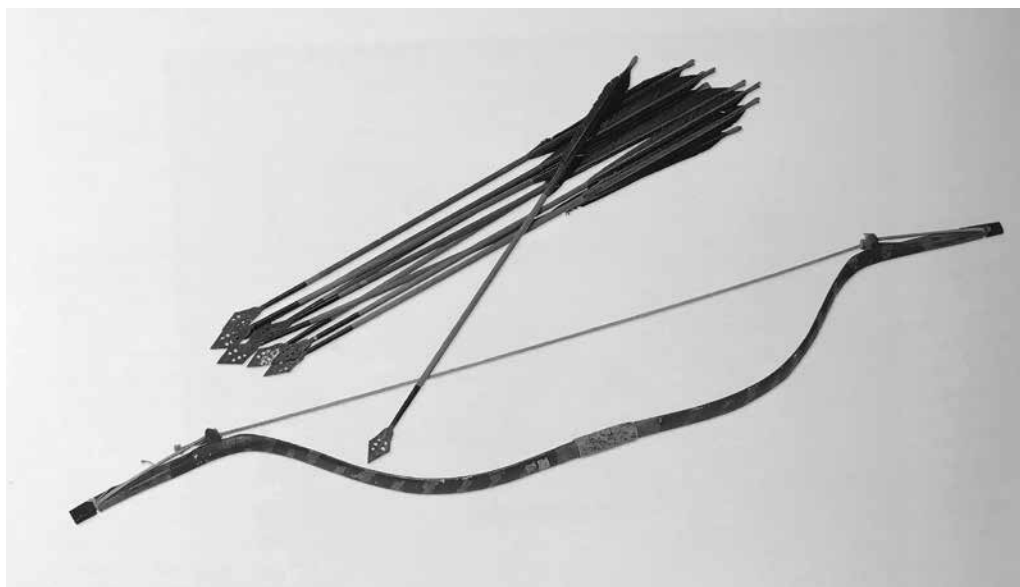


圖 38-1 鐵簇白擋索倫長鈚箭 木牛角漆弓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38-2 皇帝大閱鈚箭 皇朝禮器圖式
卷 14 武備二 哈佛燕京圖書
館藏 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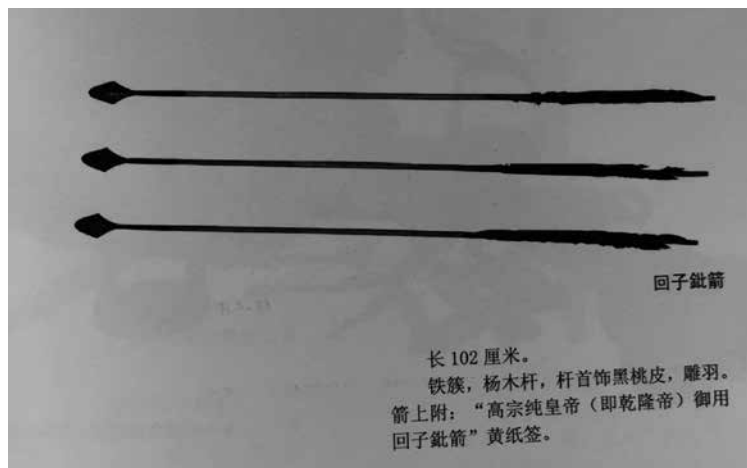


圖 39 回子鈚箭



圖 40 定邊將軍兆惠 得勝靈毒一 皇朝禮器圖式 卷 17 武備五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圖 41-1 天體儀 皇朝禮器圖式 卷 3
儀器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圖 41-2 北京古觀象台天體儀



圖 42 金嵌珍珠天球儀 清 乾隆年間
球徑 29.5 公分，架高 61.5 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43-2 御製地球儀 清 冷鑒、門應兆等合畫 皇朝禮器
圖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版取自郭福祥，〈《皇
朝禮器圖式》編纂與乾隆朝科學儀器的禮制化〉，
圖 10



圖 43-1 御製地球儀 皇朝禮器圖式 卷 3 儀器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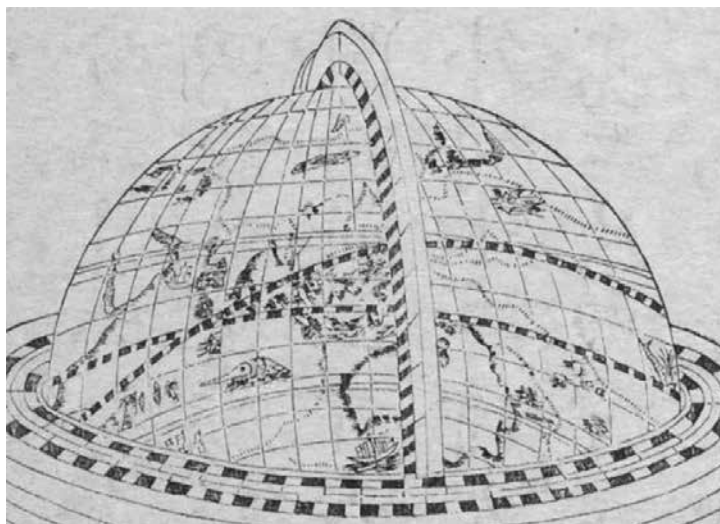




圖 44 清 謝遂本 皇清職貢圖卷 1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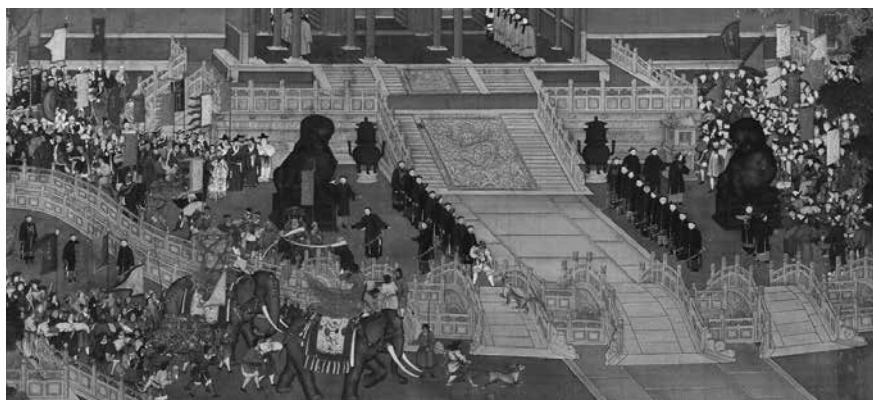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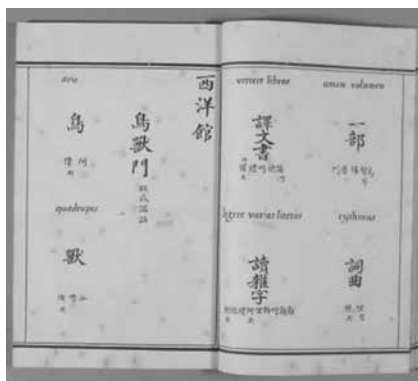
圖 45 清人 萬國來朝圖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46 大西洋國夷僧女尼 清 謝遂本 皇清職貢圖
卷 1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拉氏諾語 西番譯語 書影



西洋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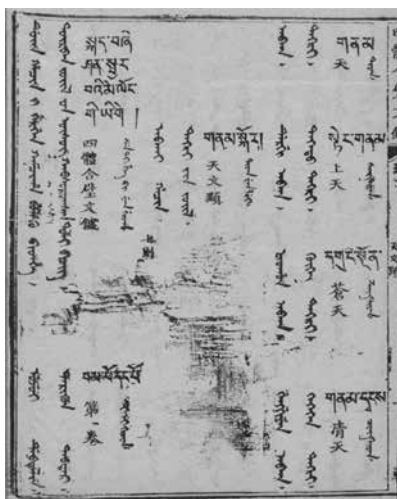


川番譯語



西番譯語

圖 47 會同四譯館譯語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48 四體合璧文鑑 內頁
柏林國家圖書館藏